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一〇五次会议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 (约旦)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乍得..... 曼加拉尔先生 智利..... 埃拉苏里斯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阿罗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尼日利亚 拉罗先生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

2014年1月14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4/3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

2014年1月14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4/30)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印度、爱尔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黑山、纳米比亚、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托马斯·迈尔-哈廷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4/30，其中载有2014年1月14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费尔特曼先生发言。

费尔特曼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邀请我今天代表秘书长就“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这一项目向安理会发言。此

时此刻，当我们举目看一下叙利亚、南苏丹或中非共和国时，本次辩论会的相关性和适时性就会一目了然。

联合国的创建者在寻求结束战祸时，心中首先想到的是致使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相斗的全球战争的惨痛经历。在距今更近的这些年，人们经常呼吁联合国为结束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作出贡献。此外，与今天的辩论会相关的一点是，虽然国家之间的冲突数量有所减少，但国家内部的冲突却经常复发。

在这两类冲突中，歪曲历史与身份认同可能是引发冲突的因素。战时言论造成分裂。帮助国内各团体超越此类零和思维而接受共同的国家叙述尤其艰难。联合国拥有帮助建立手段以解决领土争端的漫长历史，但是，调和相互矛盾的历史与身份认同的观点却远非一门发达的科学。

尽管当我们——不论是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还是作为秘书处——采取行动时，我们希望为永久和平作出贡献，但过去的危机表明，当务之急往往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而更为长远的问题往往没有得到重视，即使建设和平现在是我们管理和预防冲突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言之，尽管我们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来隔开相互敌对的军队，照顾需要帮助的民众，颁布政治路线图以及重建实际公路和政府各部，但我们却较少反思我们修复社会信任和促进真正和解的能力。我们怎样才能修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结构，使人们再次正视对手眼睛时看到的是人，而不是敌人？

在我今天探讨这一议题之时，我将谈论两个主要问题。和解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将联合国管理危机的方法同使社会能够愈合创伤这一急务结合起来？

那么，和解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我提到和解时，想到的是下列因素——查明过去包括冲突发生之前的情况并就此交换看法，以便恢复团体与团体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为使

这一点成为现实，我看到双重责任。首先是国际社会有责任协助创造条件。其次，这些条件使国家行为体能够履行它们的责任，以便重建信任和尊重，包括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行动。

要重建信任和尊重，就必须在社会所有层面而不是仅在政治和经济精英层面相互接触。领导人必须树立榜样，不仅要停止战时言论和结束有意宣扬冤情的行为，而且还要采取行动进行真正合作并诚实检讨自己在冲突中的作用。领导人还必须表明，分享权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冲突后治理并不意味着赢者通吃，而是意味着社会所有组成部分都有机会相互接触。

常言道，要克服宿怨，希望在于青年。然而，现实表明，战争刚结束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往往比他们的父母更为极端。往往由于被剥夺接触“对方”的机会，他们也被剥夺感受对方所具有的共同之处的机会。所以，当仇恨和受害感宣泄最多和表现最明显时，我们必须在冲突善后工作中找到方法，打破分裂社区的恶性循环。跟教师和家长合作与跟青年自己合作同样重要。

更广泛地说，教育和教学大纲往往传播有争议的观点。要及早从制定至少介绍对最近事件的不同解读的历史教学大纲做起，尽管这样做有困难，但却似乎至关重要。这可以成为在人们的经历和思维中形成共同叙述和建立交汇点的起点。

我现在要谈谈第二个问题。如何把联合国管理危机的方法同使社会能够愈合创伤这一急务结合起来？

过去几个月来，安理会在开展其他工作的同时，对中非共和国境内出现灾难性局势、叙利亚境内持续发生屠杀以及南苏丹境内爆发激烈敌对行动表示了震惊。尽管外界力量在这每一个冲突中都发挥作用，但这些冲突的根源、初始苗头和势头从本质上说是内部的。在所有这三个情况中，实际结束战争，尽管这样做是急需的，都不会产生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结束战斗并不会

永久结束冲突。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在没有实现和解的情况下结束的战斗，尤其是国家内部的战斗，是能够而且往往确实复发的战斗。

在中非共和国，曾经代代和平共处的宗教社区，现在不把彼此视为邻居，而是视为敌人。尽管结束战斗是困难的，但重建共同社区意识并对最近事件形成共同叙述将更为困难，但如果中非共和国公民要享有持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这样做。

在南苏丹，关于一个国家获得来之不易独立的美丽故事现在已经变为一场导致死亡、流离失所和呼吁报复的充满族裔色彩的冲突。争取独立斗争期间将不同团体联系在一起的因素已经消失。随着停火协议的签署，现在出现了一丝希望，但要使停火生根和持久，我们就必须帮助各方再次相互信任。

在叙利亚，人们对一个政教分离、多宗教和多族裔国家的共同记忆和自豪感已被近三年不堪言状的残暴和侵犯人权行为所粉碎。我们一再向安理会报告说，我们认为，军事办法解决不了这一冲突，试图用军事办法解决冲突，其代价极端高昂。我们必须集体帮助叙利亚人停止杀戮。但然后做什么？清理实际废墟和进行实际重建不足以消除冤情、仇恨以及复仇本能，而在叙利亚，毫无疑问，这些因素每一天都在成倍增长。

在所有这三个情况中，如果不全力以赴实现和解，如果每个社区不诚实检讨自己在冲突中的作用，那么任何停止敌对行动的局面都将是脆弱的，极有可能崩溃。我们可以举许多例子，但请允许我用伊拉克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

近年来，伊拉克取得了许多成功，包括在极为困难的情形下举行一系列全国选举，并重建与科威特的积极关系。我们大家都欢迎安全理事会肯定伊拉克所取得的进展——安理会有关各项决议注意到了这些进展。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看到，伊拉克各族的历史和政治表述差异极大，有碍该国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包括打击恐怖主义的迫切斗争。让更多的伊拉克人摆脱“零和”思维，形成一

个共同的伊拉克表述很难，但对伊拉克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叙利亚冲突伤口未愈，使伊拉克国内和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区域危机仍在继续加深。叙利亚战事结束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裂将更易愈合，因为叙利亚战乱恐怖加剧了这一分裂。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支持真正的和解努力，以免因为旧怨未了、各方均自称受害和“零和”观点而导致战事复发，这种“零和”观点无疑已经开始生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刻意推销。

联合国监督停火或隔离交战双方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部署在世界各地15个地点的近120 000维和人员就是明证。这些维和行动通常都有安理会授予保护平民的强有力任务规定，在有些地方发挥防止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作用，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就是其中一例；在另一些地方则部署在一个国家境内，如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合国还在塞拉利昂或莫桑比克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重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是联合国帮助结束冲突工作的重要和有形表现。但除有形表现（如派遣维和人员、监察员、重建和发展）外，联合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无形的建设和平工作。目标是促进长期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停留在帮助实现停止暴力，而停止暴力往往可能是短暂的。

我们目前在也门看到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政治过渡协定具体规定，将通过一个广泛包容的民族对话进程解决过渡司法与民族和解问题。正如安理会所知，这一对话几天前结束并取得积极成果，但需要得到扶植和支持，以完成过渡和促进也门和平。

让我声明：我们充分认识到，和解不能代替正义，后者是结束冲突的必要因素。然而，反之亦然。例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不能代替民族和解。换言之，查明真相和追究过去

行为的责任必不可少，但其本身并不是治愈破碎国家的计划。这项工作必须在现在和将来持续进行。

联合国不能垄断和解努力。人们经常提及南非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民族和解的范例，可供其他国家效仿，这很有道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组织日渐采用更加有系统的方法解决和解问题，认识到有形战斗的结束值得欢迎，但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

虽然我们不断审查联合国促进永久和平的做法，但我愿与安理会分享我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四个方面。

首先，在可能和适当的时候，和平协定本身应根据每个冲突的具体情况，提出商定的总体原则和实现和解的机制。

其次，需要仔细考虑选举和宪法审查进程的时机。如果安排过早，可能使发战争财的人合法化，从而巩固战时表述和占地。过早举行选举，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可趁机煽动怨恨，赢得选举，危及长期和平与稳定。

第三，和解必须来自内部，不能从外部强加。然而，外部因素，如会员国、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可鼓励和协助尽快实现这种民族进程。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和相关社会需要为和解提供必要的时间。重建在一夜之间被打破的信任，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

第四，虽然各国的进程显然不同，但不妨考虑其共同因素，可建立一个和解比较知识和专业知识储存库，供会员国、联合国特使和其他方面参考。

最后，我谨提出几个问题。国际社会，更具体的说，安全理事会成员和联合国能否提供鼓励实现本国自主和主导的和解的激励措施？和解进程应何时开始？如何掌握选举及广而言之过渡进程的正确时机？当预防失败，种族清洗已然发生，如何使我们重建共享社会的愿望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分裂的现实相协调？

有人或许会问，整体而言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是否应该帮助促进民族和解。我希望，叙利亚灾难的例子显示，国内冲突得不到解决，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作为一个以会员国为基础的组织，当会员国国内和平和相互之间相安无事时，联合国本身就更加强大。

我感谢约旦促使我们考虑往往可能破坏永久和平的某些最重要的方面。我希望，今天的辩论将引发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如何确保我们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做法更加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解决国内冲突时。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费尔特曼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以约旦代表的身份发言。

（以英语发言）

今年，国际社会将纪念和反思20世纪决定性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而今天这场主题为“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的公开辩论就发生在今年的第一个月。但是，今天的辩论讨论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安全理事会从六十九年结束战争的实践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这一主要经验教训就是：停止杀戮易于结束冲突，而结束冲突远远易于永久结束冲突。

十年前，安理会在智利任主席期间举行了一次题为“冲突后民族和解：联合国的作用”的重要辩论（见S/PV.4903）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主席声明（S/PRST/2004/2）。辩论在此前即2003年9月由联合国王国主持的关于法治问题的辩论（见S/PV.4833）的基础上，第一次在这种背景下揭示了真相委员会和追究司法责任对民族和解的重要价值。最重要的是，辩论着重讨论一个社区或受影响的国家如何克服各种所犯严重罪行，强调联合国解决冲突需要讲究持久性。

可悲的是，十年过去了，安理会仍然难以不仅只是有效地解决司法责任问题，而且实现永久结束

国际和非国际冲突的大目标。安理会从未单独讨论的问题是各方不同的历史表述，而这种表述往往受族裔或民族主义的歪曲，可能造成冲突，阻碍冲突后国家和国际和解。因此，我们邀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和联合国会员国更细致地考虑按顺序排列的三个解决冲突的目标，即结束战斗，结束冲突和永久结束冲突。

为了结束杀戮，我们现在仍然采用联合国在1948年至1961年期间首先制定，主要是达格·哈马舍尔德、拉尔夫·本奇和莱斯特·皮尔逊从1956年开始制定的方法：通过调解实现停火，从而导致部队脱离接触，将重型武器撤离隔离线，并通过联合委员会、联合巡逻等措施监督停火或停战。联合国业已证明有能力做到这点。为制止冲突，安全理事会从1961年起，藉由通过第161(1961)号和第169(1961)号决议，扩大了维和任务的范围。当时并没有为实现刚果停火进行多少调解——先前西奈也是这种情况——而是在一个遭受冲突折磨的国家里靠打仗打出来的。此后，联合国刚果行动通过积极的反叛行动以及通过保护平民为平息刚果部分地区局势所创造的政治空间得到了扩大——无论从字面上说，还是形象地说，都是这样。在建立新的国家机构的同时，铺设了道路，建起了楼房。

因此，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联合国维和工作第一次真正体现在1961年至1964年的刚果。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当时就做了，同样在这个方面，联合国获得了一些专门知识。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当时的很多工作只是实体层面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西欧也较普遍——没有怎么去试图解决冲突前或冲突后起作用的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行动手册上说，重建、训练和发展经济，其它东西——创伤、怨气、精神上的苦痛和愤怒——最好留待时间流逝和记忆减退时处理。

不幸的是，人的记忆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迁就他人、那么温和。除非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达成真正的协议，否则大相径庭的记忆常常会像干燥的火药长期潜伏在那里，在很多族群里从父母传给孩子。

女，只等着一位有超凡魅力的投机者的到来，用心险恶地骤然将其搅动，直至酿成暴力。

因此，尽管对于举行选举和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等等给予了重视，但脆弱的和平甚至是表面上的和平的情况仍持续列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安理会在工作中对于许多此类冲突当初何以会发生，并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对使用和误用历史记述如此敏感——因为存在争议的历史表述非常之多且种类各异——结果导致我们会员国和联合国总体来说都不想触碰这样一个可形象地称之为炸弹的东西。我们如果揭开人类文明的盖子，哪怕是稍稍揭开，往里面看，就会看到它不是由豁达与慈悲支撑，我们担心我们只会看到敌意和怨恨的交织、纠缠和涌动。我们大家都认为，最好是在不讲历史的情况下开展对话，此外，这看起来会像是已经和解了，而这已经不错了。因此，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很多会议上谈到必须开展对话与和解，这针对的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议程项目，而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这也是危险的。

要永久制止冲突，特别是族裔冲突或极端民族主义或思潮导致的冲突，安全理事会就必须处理导致战争的心理因素。它在支持萨尔瓦多、塞拉利昂和东帝汶等国成立真相委员会时，的确已开始认识到记忆的重要性，但这更多是着眼于零零碎碎的战略，而且常常是出于希望实现和平，而非旨在永久根除冲突。要是想永久根除冲突的话，这种做法早就成为安理会所有工作的重要一项了。

但即便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揭示真相以换取大赦——这是很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共同做法——也不一定就能够表明是真诚的悔过——悔过是伴随真相的基本和必要内容——因为大赦是有交换条件的，首先要作出忏悔。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时需要历史委员会来辅助其工作。

同样能够表明安理会目前不愿承认揭示真相对于在更深层次解决冲突的高度必要性——尽管安理

会先前设立了调查委员会以及特设、特别和混合法庭——的情况是，安理会对待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犹豫不决。该法院作为唯一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仍然最有希望为未来留下法院作出的事实记载。

当然，归根结底，如果对族裔战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或思潮所引发的战争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孤零零的谎言，或是有时与其它助长战争的因素如地理、气候、资源匮乏和不发达状况同在的谎言。这种谎言常常涉及历史记述，有时甚至无耻之极，长时间下去只会制造更多谎言。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点，即：只有揭示真相或是接近于揭示真相，才能实现永久和平。这里所说的真相不是指重复多次以至于人们信以为真的表态，而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它依靠广泛的佐证作为维系，狭隘和无稽的历史解释对其毫无影响，而且在其面前几乎没有可信度。当然，当证据相应较弱的时候，各种解释就会增多，因此应当欢迎辩论。

一旦确立了真相，各方就必须接受，而且最难的是，要作出让步。也就是说，各方不应指责他人的作为，而应公开正视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形成共识打下真正的基础，其后才能有真正的和解与永久和平。

安理会能够做什么呢？正如向各位成员分发的我们提交的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所述，安理会可以开始授权成立历史咨询部门，帮助各国保存某一天将成为其官方记忆的东西——使真相得以揭示、紧绷的记忆得以松弛的参照点。安理会在维和行动最早期就这么做，可有助于为一国或多国成立历史委员会——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奠定必要基础。

归根结底，约旦代表团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除了法律咨询部门之外，还应当拥有一个较大的历史咨询部门。这不仅会有助于其会员国建立各种委员会和支持司法系统，而且也有助于它们解

决许多迥异的表述，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

毕竟，我们早就拥有了了解决边境即边界争端的司法机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历史机制，帮助我们记载在历史解释方面的最大分歧，也就是说，“集体意识方面的边界冲突”，以便激励我们真正地正视过去。具体而言，我们要想摆脱极端民族主义和派系主义的有害影响，就必须这样正视这些问题。这一切当然并不容易，而且很不容易。

正视自己的行为，只要这种行为在他人看来非常可耻，是任何人都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行为越是令人感到可耻，就越难以正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实施最严重罪行的人来说，即便他们面对能够揭示真相和其罪过的最明确证据，只要检方不提出特赦，他们就基本上不会坦率承认其过错，或正视其所作所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对那些犯下最严重罪行的罪大恶极者的刑事起诉就是这样，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事实上，尽管世界各地进行了数千起审判，无论是国家审判还是国际审判，但一个人们已知犯有战争罪的个人，乃至被适当成立的法庭以毫无疑问的方式判定有罪的个人，承认罪行并正视自己的过去的例子少之又少。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倒成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事情。

那么，如果个人尚且如此，那么为了自己、为了他人也必须开始正视历史的社区、部族、民族或国家又会怎样呢？我们承认，挑战的确是惊险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奋起迎接挑战，接下来的69年我们就将继续陷于结束冲突和永久结束冲突之间。单靠水泥，加上培训、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安全部门改革、选举、权力分享、外国直接投资、和平条约和强制遗忘是不够的——的确，这永远不够。多数情况下，真理和接纳的缺失、最重要的是缺乏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将一次又一次地鞭策我们拯救子孙后代免遭战祸的集体努力。这是真理。

我们面前的障碍有可能看似非常巨大，以致于安全理事会或本组织无法跨越。但是，曾身为登山者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话值得我们铭记：“永远不要在到达顶峰前判断山的高度。否则，你将看到，它是如此之低。”我国代表团抱着最真诚的谦卑，请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确认他们戴好保险带并开始拉紧绳索攀登。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倡议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在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年的初始举行这次辩论会是及时的。我还愿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的通报。我也赞同托马斯·迈尔-哈廷大使将代表欧洲联盟所做的发言。

当枪声在冲突后停息下来时，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已经恢复。肉体暴力的结束甚或和平协定的缔结并不会把痛苦的记忆和曾经的痛苦一笔勾销。我们扪心自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这一冲突的历史？换言之，我们如何能够不仅解除战斗人员的武装，而且解除心灵的武装？

冲突后，经历暴行的记忆限制了重建社会的进程。存在这样的风险：这种记忆可受到操纵而服务于一种对抗逻辑。相反，也有例子表明，回顾过去与努力把民众团结起来齐头并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就是这种情况。

欧洲的一体化当然是和解的最佳范例之一。给数代人带来战争、对两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的那些国家为建设一个共同经济区而共同努力，现在它已成为一个政治联盟。今天，欧洲联盟成为一个独特的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完全靠法律来管辖。

欧洲一体化似乎为我们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提供了有益的教诲。第一条教诲是，历史宿命论或决定

论都不存在，曾经世代视彼此为仇敌的民众从此选择了合作与和解的道路，这证明，历史的轨迹并非一次性永久设定，运用得当的政治意愿仍是推动进展的强大引擎。

第二条教诲来源于第一条，涉及诠释过去的方式。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仍未愈合，欧洲人民却反对报复和污名的叫嚣。虽说这从来不是一个遗忘过去或强制遗忘的问题，今天，欧洲人民审视其历史时，是从60多年来合作的角度来这样做的。

第三条教诲涉及指导了欧洲建设的务实主义，援引欧洲创始人之一罗伯物·舒曼的话来说，它始于一些具体的成果，这些成果首先形成了事实上的团结。这些具体成果中的第一个是，1951年，包括我国卢森堡在内的六个国家联合生产煤炭和钢铁。

尽管存在着沉重的过去，但是，这六个国家选择向前展望共同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有经济利益的推动，但是，它始于一种培育和解的相互依存进程。欧洲的和解模式当然是其独特历史背景的产物。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然有效的方法，从当前欧洲联盟的扩大进程中就可看出。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载于提交安理会为我们今天的辩论确立框架的发人深思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的提议。该提议中说，在冲突结束时，安全理事会可考虑责成一个历史顾问小组协助受影响国家当局收集或保护那些达成对冲突历史一致理解所需的文件。

这一建议似乎对安理会目前处理的一些危机局势，如中非共和国局势相当適切。鉴于正在讨论是否可能设立一个联合国特派团以帮助中非共和国当局恢复国家机构和法治，派出一个历史顾问小组的建议可在这一框架之中加以考虑。该小组的工作还可帮助根据第2127(2013)号决议要求秘书长迅速成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以便除其它外调查中非共和国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以及践踏人权行为的报告。

收集信息和文件也可被证明有益于启动国家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我们坚信，打击有罪不罚是过渡期司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于冲突后建设和平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法起诉那些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将有助于防止未来再次犯下此类罪行。

因此，我们呼吁这个历史顾问小组让那些无声者即受害人拥有发言权，收集妇女、儿童和少数族裔等最脆弱团体的证词。这样，我们将避免以一种不切合民众实际经历的冲突的官方一致口径来讲述历史的弊端。冲突后社会要与其自身的过去达成和解，就必须披露—完全披露各种事件。对未来的希望正是由此而诞生。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约旦勇敢地召开今天关于一个很有挑战性话题的辩论会，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话题对所有会员国来说都是惊险的。

预防冲突是联合国存在的原因，然而，旧金山会议召开69年之后，我们仍在日复一日地努力“欲免后世再遭战祸”。我们目睹叙利亚、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其它地方每天发生的破坏，实现和平的目标似乎仍遥不可及。

主席先生，在召集今天的辩论会时，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如何能够帮助防止而非助长更多冲突，安理会本身如何能够协助达成这种理解。随着我们努力预防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这些问题对于安理会来说至关重要。

为预防冲突，显然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是什么引发和驱动冲突，我们必须能够识别警告信号，我们还必须牢记已发生过冲突国家特定的脆弱性。1945年和2009年间，发生过内战的国家中超过一半在冲突表面结束后再次陷入冲突。历史常常看似命中注定。

国家机制通常最具备条件确立导致冲突的原因和冲突期间所发生的情况。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可对导致冲突或冲突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给予权威

性描述，因而有力阻止那些有可能企图利用和滥用历史以酝酿更多冲突的人。安全理事会应当为这些机制提供有力的支持，就像其在关于马里的第2100（2013）号决议中所作的那样。

联合国系统的其它部分，包括政治事务部、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同样应当支持和鼓励查明真相及和解进程。问罪追责进程在帮助揭示真相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被认为合法的司法部门可以追究罪犯的责任和给予受害人话语权，从而帮助社会度过过去的痛苦。不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的刑事法院可以通过其审案结论给予否则有争议的事实以合法性，使社会更难以否认过去的错误。

严重罪行实施者不论其背景如何，必须被追究责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司法不会久远，终将是破坏性的。联合国的建树之一是，传播了作为被接受准则的普遍权利，即我们不论对他人有怎样的相对权力但都负有义务的理念。这是安理会总是要不断强调这一点。

安全理事会还应当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工具，尽管这些工具本身并非完善。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三十四条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已被证明是有益的机制。安理会最近通过第2127（2013）号决议，决定设立调查委员会以调查中非共和国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此举是处理该冲突的基本组成部分。

当然，其它联合国机构也可发挥作用。人权理事会授权组建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确立该冲突严重事实方面发挥了令人信服的作用。

区域组织也可发挥作用。非洲联盟最近决定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南苏丹境内目前冲突相关事件，便为一例。在我们自己所处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与联合国合作，记录整理通过东盟的斡旋、调解和调和作用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并分享有效开展和平进程和谈判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些工具能够有助于各社会了解导致冲突和在冲突中发

生的事件。包容、透明的进程能有助于确保听取了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因而全面掌握冲突的来龙去脉。在这些进程中加入妇女的声音十分重要。培养敞开胸怀、听取他人意见的教养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对最终达到对历史有共同看法的目标须持现实态度。常常发生的是，不会对冲突的来龙去脉有单一的看法或对事件有单一的认识，或说，这甚至不一定是人们所期望的。对事件有不同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关这些事件的事实应当是无法逃避的。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立这些事实，将证据记录在案。然后，我们应当能够确保，不会由胜者来独断历史。联合国在这方面可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工作中正视这一作用。

仅仅是倡导和解和对历史性事件的共同理解是不够的。必须实际做出努力，以确保分歧不会被利用来煽动新的冲突。这一努力的核心在于，确保冲突后社会能够有效调解分歧和处理不满情绪。正是在这方面，真正的长期建设和平工作应当发挥作用，将重点放在法治、尊重人权、享有有效的司法或其它机构的服务以及参与性民主治理。但愿其结果将是机构合法性和社会凝聚。最终，我们寻求建设包容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族裔、种族、宗教、政治或社群等的分歧得到容忍，国家保护给予所有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诉诸暴力和恢复冲突不仅是不被接受的，而且是想都不要想的。只有到那时，遭冲突蹂躏的国家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欢迎约旦倡议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所作的通报。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战争与冲突带来重大浩劫，造成无数生灵涂炭，许多文明断绝，长期困扰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如何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寻求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一直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命题。20世纪短短30年间爆发两次世界大

战，更给各国人民带来空前劫难，也带给我们很多深刻而重要的启示。

第一、寻求持久和平，需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面对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我们要转变传统安全观念，充分尊重和照顾各国正当合理的安全关切，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成为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通过对话消除分歧，通过合作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共赢实现普遍安全。

第二、寻求持久和平，需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互相交织，命运相互依存，和平是众望所归，战争不得人心。历史已反复证明，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有效途径。国际社会应大力推动冲突当事方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与矛盾，预防冲突发生，防止冲突升级，将战争阴影消弥在萌芽之中。

第三、寻求持久和平，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巩固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联合国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安理会应根据《宪章》赋予的神圣职责，进一步增强权威和效力，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承担起更大责任，为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寻求持久和平，需要树立互利共赢的新发展观。各国实现互利合作与普遍发展，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已形成命运共同体。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努力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不断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发展。要通过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消除冲突滋生的土壤，遏制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为持久和平与安全打下坚实基础，共同建

设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近70年，但围绕这场人类空前浩劫的反思远未结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在这里总结战争教训，目的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深刻反思和汲取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消除战争创伤，实现未来的持久和平。那些不正视历史真相，甚至篡改历史、否认和掩盖侵略罪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为，不仅构成地区和平稳定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对人类和平事业的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不顾包括邻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反对，公然参拜供奉有二战众多甲级战犯和其他战犯的靖国神社，向那些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被侵略国家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表达所谓“敬意”和“尊崇”。靖国神社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直到今天，仍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战争罪犯供奉为“神灵”，并歪曲侵略历史，宣扬与国际公论格格不入的错误史观，企图颠覆对侵略战争性质和责任的定论。安倍向法西斯战犯顶礼膜拜，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是爱好和平、接受《宪章》义务的国家。安倍所作所为的实质，就是要为侵略翻案，为战犯张目。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对此都绝不会接受。这是关乎日本领导人究竟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接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与战争罪犯为伍的重大原则问题。日本领导人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并以实际行动尽快纠正错误，真正取信于包括邻国在内的广大国际社会。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任何拒不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企图否定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企图挑战《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行径，必定是徒劳的，必将被历史抛弃。中国愿与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推动世界朝着共同安全、持久和平的方向不断前进。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约旦安排这次很适时的辩论。我也要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所作的令人深思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赞同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今天晚些时候将作的发言。

人类从战争的恐怖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常常在各种规范性和体制性举措的结合中得到体现。因此，与联合国本身一样，《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都直接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国际人道主义法源自索尔费里诺战役的血腥记忆。面对二十世纪的新现实，它不断发展演变，导致在1977年强化了关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平民属非法行为等规定，而且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了非国际性冲突。

随着当代冲突性质的变化，出现了新近的保护平民概念——人的安全概念及保护责任概念。保护平民是安理会工作的关键要素。大规模暴行引起的道义上的愤慨突出说明，迫切需要杜绝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重大战争罪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而且导致设立了国际和混合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宗旨是确保切实做到普遍追究罪责。各种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已发展成为一种记录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和危害人类罪行为的重要工具。今天，它们是安理会工作中的有用工具。

世界各地还设立了30多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便调查、记录及核实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这些委员会的建议具有很高的合理性，对于遏制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进一步发生违法行为至关重要。此外，这些委员会在受冲突影响社区的治愈创伤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公开讲述个人

所遭受痛苦和损失的经历，可帮助受害者恢复他们的尊严，给他们勇气，在记住过去的同时，继续生活下去。

在我们地区，设立了由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力求促成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了解真相和记住过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了解真相并记住所发生的暴行，能够有力地推动人们去寻找更好、更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并建立持久和平。

然而，要想产生影响，单靠真相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政治意愿，而且必须牢固地植根于尊重人权、法治、问责和民主治理的有利法律和体制框架基础之上。需要更有力地加以具体运用的一个根本教训是，应当重视预防。民怨得不到化解、遭受排斥以及边缘化现象、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无节制个人野心、领土主张和族裔紧张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之后，冲突的根源依然异常相似。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大大改进我们预测一场即将爆发冲突警讯的能力，并采取相应行动。世界上不乏给人以启发的预防性行动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一个出色的预防性思维例子就是法德和解，它把以前的两个敌人置于一个牢固的相互依存框架之中。同样在欧洲，起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已发展成为今天拥有28个成员的欧洲联盟，而仍不断有国家寻求加入欧盟，加入欧盟的目标也一直在鼓励那些希望入盟的国家实现民主变革。

区域组织具备发展预防能力方面的良好条件。立陶宛几年前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主席的经历以及我们与欧洲联盟伙伴一道为化解新危机而作的共同努力，使我们更加坚信，应当建立信任，利用斡旋以及进行调解，以此预防冲突。非洲和其他地区各次区域组织为预防冲突而作的各种努力为今后提供了一个大有希望的选择途径。

预防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我们可促进了解真相，时刻铭记战争、灭绝种族罪行、族裔清洗、宗教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

意识形态的无数受害者。受害者的种种经历对于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共同历史至关重要。我们应当以这些经历作为借鉴，以谋求建立持久的和平，使“永远不再发生”这个多次许下的诺言能够最终的确成为现实。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王国提议将“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作为安理会辩论的主题。约旦籍此提出了几个深刻的问题，即在预防和结束致命的冲突方面，问责制以及联合国可以发挥何种作用，我们负有何种个人和集体责任。

我们知道，战争的对立面不是和平；战争的对立面不是战争。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暂停战事与在接受共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建立持久和解这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前者是在爆发激烈冲突、丧失生命的关头最紧迫、也可以实现的目标，但是，如果要增加不让战事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就需要实现后一目标。为了从“不战”走向和平，各社群就必须能够知道谁采取了何种行为及其行事的方式和原因。若要摆脱归咎于基督徒、穆斯林、胡图族或图西族、什叶派或逊尼派、丁卡人或努埃尔人的做法，各社群就必须开始不要将自己的痛苦归罪于整个种族或宗教，而是追究个人的责任。

主席先生，你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十年前，你时任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政治干事，我是报道那场冲突的新闻记者。我们都看到往事会产生恶毒的作用，毒害人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人往往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至少在爆发战事之前，并不存在私人恩怨。当时流传着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这些说法表明历史在助长暴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种说法是，“无所学到，就无所遗忘”。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巴尔干人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不需要未来”。

今天我们看到，没有得到疏解的陈年怨愤重新爆发出来。缅甸已经迈出划时代的步伐走向民主，但是，整个社会中充斥着令人厌恶的深重偏见，穆

斯林继续遭受歧视。这种状况导致罗辛亚人没有国籍，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其他穆斯林民众不得不与数十年来共同相处的社群相隔离开来。事实表明，这种情绪会导致杀人事件。过去几周内，我们都看到令人震惊的报道，穆斯林成为攻击对象，在若开邦孟都镇，数十人遭杀害。去年，我们看到密铁拉也曾发生此类暴行。

过去两三年来，缅甸在开放政治体制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这种暴力行为构成重大危害，必须加以处理，以免造成更多人死亡。因此，对孟都镇发生的事件，必须进行可信、独立的调查，必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否则，暴力、冤情、惩罚性暴力、新的冤情、更多的惩罚，就会周而复始，无休止地循环，成为根深蒂固的现象，而每一轮暴力都会比上一轮更加难以制止。

对于以往是非曲直的不同看法是每个大陆都存在的，其源头可能在远古，也可能在昨夜。我们常常被对特定行为的不同看法而困扰。一方认为是侵略，另一个则认为是自卫。一方认为是公正，其对手则视为复仇。一方的爱国姿态，被邻国认为是不敬之举。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审视各个伟大宗教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兴衰、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这一问题的任何其他形态，都会涉及到不同的视角，人们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都会问：“谁对谁怎么了”

情况常常是，即便外交官知道答案，直言不讳也显得很不得体。我们常常用被动语态来描述暴力的爆发——“爆发了暴力行动”或者“出现了族群间暴力”。我们采用这种说法，是不敢责备人。抽象地谈论问责制是很容易的。实行起来，就需要有确定责任和承担责任的意愿。

如果受害者被迫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某一整个宗教、种族或政治派别，是没有助益的。犯下反人类罪的是个人，包括——而且特别是一那些下达命令、然后站在一边，由其下属伤害无辜者的人。这就是历史纪录的重要性所在。这种纪录提供了证据，可以确定个人的责任；与指控集体罪责不同的

是，追究个人责任可以愈合伤口，而不造成新的创伤。我们建立并维护历史纪录，就有助于确保不论是现在或是今后出现看法分歧时，利益攸关者至少有据可查。

我国政府认为，发现和保护这种纪录而且在不存在这种纪录的情况下创建纪录是重要措施，应该加以鼓励，适当时，联合国应提供协助。总而言之，在努力让对立各方坐到一起时，应该鼓励联合国代表提出尖锐的问题，即冲突是如何开始的，是如何进行的。联合国的使命与国家政策一样，应该力求找出根源，而不是表象。这种做法的紧迫性已经不言而喻。

我们只需要看看安理会目前处理的事项。中非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宗教划线，国家在分崩离析，尽管该国传统上并不经常发生宗派暴力。在南苏丹，即便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已经生效，但袭击行为持续不断，每个族裔都在指责他人，个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相互指责的现象。

在叙利亚，政府的种种暴行无限制扩展，而不只是酷刑、处决、狂轰滥炸、破坏医务工作中立地位、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以及对平民发动毒气攻击。恐怖团伙给叙利亚人民造成更多的痛苦，而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是为了表示支持民主，他们只不过是为自己和儿童争取基本的尊严。

正因为如此，向前推进的关键挑战是要创建一个有足够能力和信誉的过渡机构，恢复相互信任。我们只需要替那些已经遭受深重苦难的人——他们失去了生计、家园、朋友、儿女、父母、丈夫和妻子——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知道恢复信任是多么困难。如果不能追究责任，信任的缺口就只会更加扩大。

今天存在的对立看法会继续加剧并且极端化，而且对极权主义者和好战分子助纣为虐。在每个案例中——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叙利亚，国际社会都明智地启动了调查委员会来记录发生的事件，搜集目击者的证词，调查相互对立的指称。过去几年

来，美国支持下列做法，联合国系统组织了比联合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更多的调查委员会、专家小组和相关的真相调查机构，这并非偶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爆发了更多的战争——但令人遗憾的是，的确存在太多的战争，而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更加清楚地了解，调查事实真相以及最终追究责任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防止猖獗的暴力变为无休止、周期性和不可控的暴力。

那些在需要关注正义还是关注和平之间徘徊的人只需要看一下历史。大量证据表明，没有正义的和平难以持久。这并不是说实现和平只有一种模式，其实存在许多模式，但一切都始于寻求事实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审判战争罪行是如此，最近在南非、前南斯拉夫、卢旺达、萨尔瓦多和塞拉利昂等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稳定与和平始于我们有意愿采取必要行动，阻止有人试图利用暴力来侵犯他人权利。正如现在查尔斯·泰勒和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命运所表明，最有可能扑灭冲突火焰的做法是将事实载入公共纪录，将罪大恶极的罪犯投入铁窗。

在萨拉热窝响起枪声的一百年之后，安全理事会完全应该审查如何消除战争的问题，同时审查应如何实现持之以恒的和平。

过去，我们安理会已经表明具备学习的能力。我们已经学会采用比较全面的方式处理危机。我们已经更加警惕地注意灭绝种族和大规模暴行的威胁，更加意识到宗教和文化因素。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促进妇女参与维护安全和缔造和平的努力。我们已经开始赋予蓝盔部队更强有力的任务，维和人员正更有创造性地运用科技和新战术。所有这些学习都是有益的，但没有一样是万能的。

同样，确保对我们这一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准确而客观的记录并保留这些记录也是如此，这样才能尽量减轻偏见的危害，使谎言在变成神话之前大白于天下。

一位智者曾要求我们祈求上帝的保护，提防“那些自认为是真理唯一拥有者的人”。侯赛因国王知道，和平以现实为基础，而现实从不与任何一套关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看法契合得天衣无缝。安理会的任务就是把这一理解融入防止冲突和促进和解的日常活动中。这是最艰难的，也是最紧要的工作。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为今天的辩论选择了这个富有想象力的重要主题。

有效行使我们防止冲突的责任要求我们对冲突有尽可能最深入的了解。安理会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冲突的直接原因和直接诱因上。主席先生，这次辩论和你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促使我们更深入，更刨根问底地探求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根源。

对历史的了解是富有成效的外交的关键组成部分。西塞罗有一句名言：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出生以前的事情，那么你永远是一个孩子。对历史的了解深化了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所面对的挑战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正确的对策，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如果解释爱因斯坦关于疯狂的定义，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

作为我国政府的外交人员和代表，我们对历史负有重要的责任。我们民族的历史是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特性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国家都有理由因为下列因素而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民族所取得的成就；其军队所付出的牺牲；构成其文化和历史，形象出现在钞票上，塑像矗立在广场上的著名人物。

如果负责地对待历史，历史会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但我们还有责任以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处理历史，申明真相，并且承认过去的错误，从而有助于实现安全和稳定的未来。这样做很重要，其原因不仅因为历史真相本身就具有价值，也因为诚实地处

理历史使我们有了解达成共同理解、弥合分歧、实现和解和向前迈进的基础。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这方面有力的楷模，它以公开和无畏的态度对待一个国家过去痛苦的岁月。联合王国的萨维尔调查于2010年完成，提供了人称“血腥星期日”，也就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的悲剧事件的全部事实。大卫·卡梅伦首相在向议会介绍调查结果，并代表联合王国政府和国家道歉时，道出了关于历史责任更普遍的真理。他说，“以公开和坦诚的态度对待过去虽然是痛苦的，却没有使我们变得羸弱；它使我们更为坚强。”

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会有助于和平与安全；同样，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不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会破坏和平与安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各国的冲突就是一个实例，说明政治领导人篡改历史，利用歪曲的历史叙述助长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族裔或宗教团体中煽动仇恨和紧张气氛，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如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所言，巴尔干人造就了太多的历史，连他们自己都对付不了。

历史永远不应该被当成一种知识上的弹药，来煽动冲突、组织冲突或延长冲突。历史纠纷不应该永无止境，或是用作政治目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或轻视历史，但我们也应该做好从历史中继续前行的准备。

我们还有另一种重要的责任：从过去汲取适当的经验教训。联合国是这方面的典范。对两次世界大战后果的深切认识，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机能不全，形成了联合国的结构和创立原则。对过去经验教训的认识有助于形成一个持久并且有复原能力的多边组织。这个多边组织已经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但联合国也需要用批评的眼光看待其历史并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今年是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20周年。明年是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灭绝种族事件

20周年。这两起事件都给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清誉留下了可悲的污点。所以，我们现在试图在工作中纳入诸如保护平民的政策（保护的责任），并欢迎诸如“权利在先”的新方法，这样做是正确的。

今年还是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这是第一次真正全球规模的战争，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伤亡人数。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关于1914年令人注目的一点是：没有任何能阻止欧洲列强陷入战争的多边框架。当时，在国际紧张局势和国际纠纷的关头，出现的一种局面就是各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不是对话、谈判和调解。将军们大步向前，而外交官退居次席。

一百年过去了，这是我们一定不能忘却的教训。这个机构——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我们必须严格履行责任，消除分歧，形成共同目的，利用对历史最深入的认识，留意预警，积极预测冲突，使用安理会所有的工具有效地预防冲突。

埃拉苏里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约旦代表团召集了这次公开辩论，并起草这份概念文件(S/2014/30, 附件)。我还要感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的通报。

我们将不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而是从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按照《联合国宪章》要求所扮演的预防性职能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我国确信，保护平民、高效使用资源的最佳途径是开展积极的预防性外交，正如名为“和平议程”的独特文件所表述的那样。这意味着使用安全理事会的工具，采取“行动防止派别间的纠纷，防止现有纠纷升级为冲突，在冲突发生时限制冲突的蔓延”（S/24111, 第20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不忘记，冲突预防是会员国的关键职责。

预防战略包括致力于加强法治，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条约，在调停纠纷时诉诸和平手段，尊重人权

的民主机构和做法。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取得更高的发展和社会正义水平的氛围。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要强调，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按照《宪章》第八章在预防冲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将是有益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由于地理相连、文化相近，并且更了解冲突的根源以及不同当事方所关心的敏感问题，因而能够为此类努力作出宝贵贡献。因此，发展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此外，民间社会组织在找出暴力早期迹象方面的作用及其就危险局势向国家和国际当局发出警告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尤其要强调妇女的贡献及其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方面必须发挥的作用。我们要强调指出，根据第1325(2000)号决议的规定，必须让她们平等参与这些进程，并确保和增强她们在决策各级的代表性。

所提出的这类预防性外交将避免社会支离破碎，冲突重起。预防战略必须包括刚刚摆脱冲突社会中的和解进程。这是约旦提议举行本次辩论会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我国在2004年1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时，正是选择把“冲突后民族和解：联合国的作用”作为主题，约旦常驻代表引述的主席声明（S/PRST/2004/2）就是在这一主题下通过的。

我们认为，和解既是一个要力求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逐步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因此，我们认为，和解具有预防性作用，通过认识到分歧，我们能够预料和避免潜在冲突。另一方面，就既有的冲突而言，和解进程将为对抗各方恢复和睦关系创造条件。和解进程有着深远影响，既深刻又具体，而且各有不同，而且必须具有包容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既有分歧和偏见的根源。和解也是一个对各个社会来说各有区别，并且不能从外部强加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联合国的作用应当是协助、促进和支持。

和解不能也不应替代伸张正义或追究责任。事实上，和解要做到有效，就必须基于真相、正义以及赔偿。最近制订的联合国文书，例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经更新的《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E/CN.4/2005/102/Add.1(2005))，或者最近题为“了解真相的权利”的大会第68/165号决议等等，都承认必须尊重和维护这些权利，以便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且促进和保护人权。

在这方面，我们要回顾，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杜绝再犯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到了过渡司法，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司法，而应把它视作是一项战略，为的正是实现伸张正义、了解真相、获得赔偿以及杜绝再犯的权利。

智利共和国总统最近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回顾指出，去年九月，我国“纪念了影响我国民主最为深远、历时最长的动乱爆发四十周年”以及“开始和平恢复我国民主的二十五周年”(A/68/PV.5,第24页)。当时，皮涅拉·埃切尼克总统列举了汲取到的许多经验教训。第一，任何冲突，无论是外部冲突还是内部冲突，都不能成为把暴力作为政治行动方式或侵犯人权的理由。其次，民主、和平以及公民友谊这些价值观往往比我们认为的要脆弱，这意味着我们绝不应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第三，民主的质量、经济进展以及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因为它们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第四，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为确定有关在我国所发生一切的真相，我们成立了调查机构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任务是调查历史，并且确定发生了什么、提出建议，同时提出赔偿和预防模式。设立该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确认：

“只有基于真相，才有可能满足正义的基本要求，并为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创造必要条件……只有通过了解真相，才能在公众意识中

恢复受害者的尊严，失去亲人的家庭才有可能适当地纪念他们……”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受害者遭受的苦难，以防此类苦难重演。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谈一谈2012年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杜绝再犯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该报告员指出，自2000年以来，已代表76%的智利失踪和被处决受害者提出或完成起诉工作(A/67/368)。我国今天继续在和解进程中作出努力，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中认为我们的经验有所裨益的成员分享这些经验。

最后，我呼吁安全理事会支持以下具体行动：加强预防性外交倡议以及预警系统，使它们能够传递适当的预警信号并及时和有效地作出反应；在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层面促进加强和平解决冲突机制和人权保护制度；加强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活动，使它们为冲突后国家政府提供的协助包括真相与和解，把这作为其工作的主轴；以及加强维和行动中支持冲突后政治进程人员的任务授权。

阿罗先生(以法语发言)：2014年初，历史把我们带回1914年那个美丽的夏天，当时，仅仅几天功夫，世界就跌入到一场似乎永不会结束战争的恐惧之中。在法国的3 900万人口中，有140万在那场战争中丧生，此外还有80万人致残，400万人受伤，我们有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毁。

1918年11月9日，观察人士注意到，尽管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回归法国的怀抱，但巴黎的气氛没有伦敦那么欢欣。确实，与为胜利感到自豪和为战争结束而如释重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是因没有一个法国家庭在这场灾难中幸免而带来的悲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法国变成一个随处可见戴着孝纱的寡妇、战争孤儿和瘸腿者的国家。在我们甚至最小的村庄树立的死者纪念碑仍在证明这一点。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法国后来对于卷入另一场屠杀犹豫不决。在1938年前往慕尼黑之前，法国总统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凡尔登公墓沉思。该公墓位永远令人肃然起敬，其周围环境在近100年之后依然如月光般柔和宁静。那一排排无边无际的坟墓对他说，“再也不要”。1940年5月至6月，在联合王国和法国自豪地起来反对纳粹主义时，另一次入侵导致在六个星期内有9万名法国士兵战死。厄运和占领随后而来，有50万人死亡。

然而，历经磨难、在70年里三次遭到入侵的我国，决定不准备进行新一轮无穷无尽的对抗，而将和解放在报复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并被俘虏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祖国的戴高乐将军，在兰斯与康拉德·阿德诺伊尔总理一道参加了弥撒。兰斯有座大教堂，我国历代国王曾在那里加冕登基。该教堂于1914年遭到摧毁，此事成为战争野蛮性的象征。凡尔登发生过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在那次战斗中，有70多万法国和德国士兵死亡。在那里，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在死者纪念碑前手握着手。

德国和法国成功做到了1918年或1945年无人能够希望甚至想到的事情。它们实现了和解。两国人民不再自认为是宿敌，也不再相互害怕或仇恨。对双方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记忆深刻而且苦涩。偏见强烈。实现和解需要少数人的天赋，需要许多人的意愿和勇气，还需要想象力和时间。需要想象力来建立共同机构，以便两国青年学会相互了解，他们的父母学会相互合作。需要时间等待未受过战争损害的新一代出现。今天，德国人和法国人编写了共同的历史书本。尽管存在如此经常地让他们相互冲突的历史，但在这些书本中，他们讲述共同的故事。历史不是命运。德国人和法国人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有作为冲昏各国人民头脑的悲剧的历史，也有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得那个时代以来人们所叙述的更为平和的历史。这种历史反映其作者和读者的激情、偏见和无知，这种历史随着十九世纪

义务教育的出现而成为一种促使形成民族特征的手段，而这些民族特征完全通过反对邻国民族特征来自我界定。主席国约旦请我们思考的正是这种历史。

没有任何外交官会否认这种历史在我们的工作中无处不在。每当遇到冲突，我们都求助于历史，以便理解这一冲突，好像只有过去才能解释人类的劣根性——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仇恨和恐惧，而这些情感作为原罪的新化身，使我们从一出生就成为未来的该隐或未来的亚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就需要为这种历史驱邪。像法国和德国的教师一样，我们需要清除历史书本中所包含的仇恨和恐惧。像法国和德国的青年一样，我们需要在休假期间互访。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历史永恒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状况？让我们看一下十九世纪的法国。俄罗斯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和波兰的压迫者于1891年在挥手之间成为我们最亲近的盟友和朋友。同样，1890年，法国的宿敌不是德国，而是大不列颠，在那些年里，法国与大不列颠一再濒临战争边缘。如果我们与俄罗斯结盟，我们的敌手更有可能是不列颠而不是德国。1904年，在《挚诚协定》缔结后仅几个月时间，当时的观察家们认为不可调和的仇恨和敌对便被埋葬。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而且不仅仅在法国。所谓的历史冲突并非永久必然之事。毕竟，伊朗有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以色列的盟国。换言之，不是历史引发或助长冲突，而是冲突按照它们自己的形象塑造历史。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或走到一起，是出于利益原因，而不是出于某种永恒命运。它们需要求助于过去，以便为它们的敌对或友好提供理由。它们不费很大的事就能找到这一理由，因为历史很配合的。

历史很配合，因为历史的起源模糊不清。历史自视为一门科学，而且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但历史是人写的。人有国籍。他们有宗教和激情。他

们被迫将他们的历史版本建立在可能太少或太多的文献基础之上，提出假说，并作出选择。历史是人写的，因此会有缺陷。感谢上帝，我们不再处于法国希腊学者选择雅典而德国希腊学者选择马其顿作为他们对自己以及他们国家的看法的反映的时代。感谢上帝，今天的历史学家正在同此类偏见保持距离。

但普通公民不如历史学家细微，记者不如历史学家审慎，政治人物不如历史学家博学。他们太易于在他们祖先的疯狂中为今天的疯狂找到理由。他们总会发现这样做很容易。他们的邻居将先后是最好的盟友或最坏的敌人，因为过去能为一切事情提供理由。据说，奥托·冯·俾斯麦曾经说过：“历史可以强奸，只要生出的孩子好看就行”。他知道他在谈论什么。人继续强奸历史，但生出的只是与人相像的怪物。冲突的根源不会在历史中找到，而会在人性中找到。历史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忘记这一点就是将武器与凶手混为一谈。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历史？我们将仿效德国人和法国人而毫不留情地根除我们的偏见吗？这样做是可能甚至是可取的吗？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似乎令人费解，但仍然确实的是，法德两国的经历过于具体，不能充当其他国家的楷模。一方面，这两个伙伴其中之一作为内心反省方面勇敢努力的一部分接受了它的首要责任，这种努力远远超越与其邻国关系的范畴。另一方面，这一经历要求有一个共同威胁来迫使两国将它们自杀性争吵放在一边。

如果我们将此类罕见的条件放在一边，我们就会看到，在力求使历史保持中立方面，我们遭到普通民众的本能拒绝，他们认为世界的磨难反映了一切，唯独缺少没有面貌的不可避免的状况。人需要为他所遭受的厄运立名。人需要感到他处于正义和理性的一边。他需要使他和他的同伴所付出的牺牲有意义。因此，对他来说，历史是必要的，实际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历史有所确定，有所说明，尤其是有所谴责。我们永远不会剥夺人们的这一需求。

更糟糕的是，在试图这样做时，我们可能会重新激发几乎已被遗忘的纷争，并使此类正在消失的争吵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因为我们会看到，人们拒绝放弃他们自己的信念。实际上，不存在有罪方的历史将迫使这些当事方要么承认它们对有关悲剧所应承担的责任，要么承认它们无力防止这一悲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们都会感到，这样做剥夺了它们的尊严。

不，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不是理性，而是时间。诗人说：“时间化解一切”。是的，时间在缓慢地流去，但甚至在能够记住久远事件并且发生过许多疯狂行为的欧洲，我们已经忘记圣女贞德和滑铁卢战役，而且目前正在忘记凯撒。我们将忘记我们所遭受的其他不幸。

因此，作为总结，我要提出一个悖论。法国作为一个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遭受过极有可能将它压倒的持续不断悲剧历史，但仍然能够超越由此产生的仇恨和恐惧的国家，建议将历史留给它在历史学家的辩论中所占据的适当位置，只要历史学家能够自由地说他们希望说的话，并且能够自由查阅他们所需的档案。国家不应当插手历史。这既不是它们的任务，也不是它们的义务。

然而，这并不禁止要求他们对他人的感受显示起码的尊重，在自我表达时有所克制，注意随时可能爆发的激情。一句话，他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谨慎，以确保历史不会寻求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损害进行报复。听了今天会上的一些发言并考虑了各种做法之后，这种呼吁似乎并非无用。法德和解无疑是一个独特事件，但也可激励解决其他争议。

最后，我必须回头再谈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那场灾难造成了二十世纪的无数弊端。无人希望战争，但也无人知道如何避免战争。让这种无奈状况提醒我们，我们仍然生活在危险的边缘。现在或许已经不存在任何大公，但仍在发生人类的蠢举。这正是我们必须警惕、必须驱除的，知道到它始终潜伏在那里，包括在国内或国外。正

如凡尔登公墓提醒我们的那样，和平从来不是铁定的。

吴浚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和安理会主席国约旦组织今天这次公开辩论会。我也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的全面通报。

鉴于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今天辩论会的主题既及时又切合实际，使我们能够重新反思过去冲突的祸害和经验教训。我们还要寻找办法防止冲突，巩固和平，造福子孙后代。虽然若干因素可被列为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致因，但我们不能否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各国之间不信任导致了那场战争。冲突各方之间显然缺乏谅解和宽容。在一战一百周年之际，我们认为，真正承认和忏悔过去的错误，是防止另一场战争和确保持久和平的第一步。美国哲学家和诗人乔治·桑塔亚那有一句名言，即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隔二十年，世界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说明人类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不幸的是，在我们东北亚地区，由于各国之间不信任，紧张局势空前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日本领导人歪曲在帝国主义时期发生的情况。例如在欧洲，二战后德国始终努力接受过去的错误，以此作为与其他国家真正和解的基础，为实现欧洲一体化铺平了道路，这与亚洲形成鲜明对照。然而，日本未能妥善解决或摆脱其军国主义的历史。这是本地区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最近，许多日本领导人继续表现出历史修正主义态度，他们参拜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声称侵略的定义有待确定，并通过修改教科书，向日本后代灌输歪曲历史的观点。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供奉被定为二战甲级战犯的日本战时领导人的靖国神社，直接挑战日本战后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的基础。这样的言论和行为有损本地区国家之间面向未来的关系与建设和平，也违背联合国的宗旨与精神，而这些宗旨与精神体现了

世界各国人民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可怕战争之后对和平的向往。

近来，日本政府强调说，它奉行积极促进和平的政策，对全球和平作了贡献。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实际上正在制造与本地区国家的更多麻烦，如何可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日本真的希望为区域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就不应否定历史，挑衅邻国。

一个不仅令东亚国家，而且令整个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慰安妇问题。联合国已经在妇女权利、对冲突中妇女的剥削、战争罪和防止酷刑等问题框架内讨论过该问题。事实上，1月26日是韩国人民的一个非常悲痛的日子，一位曾经被日本皇军强迫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那天去世，使仍然活着的慰安妇总数降到55人。慰安妇问题是韩日未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妇女权利问题。

由库马拉斯瓦米女士和麦克杜格尔女士在1990年代提出的联合国报告（E/CN.4/1996/56□ E/CN.4/Sub.2/1998/13）指出，慰安妇问题是一个武装冲突中的性奴役问题，要求其肇事者接受法律责任，提供赔偿，并惩罚肇事者。2007年，美国国会和欧洲联盟议会分别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接受历史或法律责任，作出道歉并提供赔偿。由此可见，强迫性奴役践踏人类良知。

日本政府迄今尚未为此承担责任。在去年联大期间，日本代表团提到日本对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的贡献，但避而不谈慰安妇问题。如果他们对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的定义不包括慰安妇，这岂不是双重标准或否认历史？日本政府应立即听取其罪行受害者和国际社会的呼吁，采取行动，正确讲述历史教训，向日本年轻一代灌输和平与和解的精神。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历史应当向前发展，我们需要继续前进。但

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应该面对历史，汲取历史的教训。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约旦代表团选择“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为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主题，将标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思想家们几百年，如今仍有现实意义。今天的讨论不乏坚实起点，可作为现有历史参照系统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正在纪念两大事件，它们对汲取战争教训和寻求持久和平至关重要。

七十年前，我们见证了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得到解除，法西斯侵略者始终没能攻克该城市，但有数十万当地居民为此付出生命。1月27日是红军解放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日，我们悼念大屠杀受害者，这是纳粹犯下的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纽伦堡法庭所重申的历史的裁判，与苏联领导的反希特勒同盟的胜利同样坚定，与纳粹德国的投降一样地无条件。纳粹组织、做法和意识形态是犯罪。正是这种认识使战胜国组建了联合国，并启迪了本组织《宪章》。

这一真相不容篡改。有人认为如今无需打击纳粹主义的各种表现，因为健康的社会自己就会反对这些想法，这种观念不仅无视该现象的邪恶本质，而且也无视今天令人震惊的现实情况。为什么就连在一些具有深厚、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仇恨人类的书籍《我的奋斗》仍是互联网上的畅销书？新纳粹和右翼政党和组织为何变得强大？出于种族动机的攻击和杀害为何时有发生？曾获得纳粹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原党卫军成员为何受到国葬礼遇？为何有人企图通过粗暴篡改历史，将纳粹帮凶说成是民族解放运动英雄？相关国际机构对于直接煽动杀人的、具有法西斯思想的恶棍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为什么没有作出有原则的反应？所谓的“政治正确”何以使一些人不支持谴责新形式种族主义和美化纳粹的大会年度决议，而另一些人则昧着良心对其投反对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诚实的回

答。否则，我们大家都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而这种未来将与永久和平的设想以及普遍宣称的民主原则相去甚远。

今天，追求持久和平所不可替代的基础在于国际法及其基石，即《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特性，尊重安全理事会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所具有的特权，是避免危险的、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动荡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为证实该结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过去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安全理事会担负着《联合国宪章》赋予其的崇高责任，应当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采取行动，而不是为了个别会员的利益，因为它们可能受到本国地缘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动机的诱导。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必须在文字和精神上得到完全的遵守。

只要爆发危机，包括各国发生国内危机，就首先必须推动有关各方的建设性对话。

此外，绝不能忘记，任何人都没有废除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开出各种药方，特别是更换政权这样的猛药，只会导致局势不稳，同时造成冲突恶化和恐怖主义威胁蔓延。

只要不克服兵戎相见的习惯，就哪怕是最严重的问题达成支持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的有力共识，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就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尽管现今国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我们看到一些领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我是指“五常加一”与伊朗就伊朗核计划达成的首个协议、决定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库，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倡议下召开解决叙利亚破坏性冲突的会议。必须圆满、全面地落实这些工作。

此类努力将是实现永久和平的重要步骤，而只有通过国际社会开展更艰苦的工作，发掘现有合作潜力，才能实现永久和平。

曼加拉尔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讨论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这样一个重要议题。我还要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的通报。

每天，我们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都会看到或听到很多国家如何遭受冲突蹂躏，其中很多国家位于非洲或中东。可以在很多方面感受到这些战争和冲突的后果。除了生命损失以及机构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遭受破坏之外，我们还看到冲突社会的凝聚力受到影响，受这些冲突影响的国家的生存受到影响。

当今冲突对妇女和儿童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表现为武装团体杀戮、伤害、强行监禁和拘留妇女和儿童，以及出于各种目的对其实施剥削，其中包括遭受性暴力和贩运人口活动之害。冲突使家庭骨肉分离、毁坏社会结构，长期消耗国家资源。

面对全球普遍发生冲突的情况，联合国在防止冲突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富国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常常成为各类冲突发生地的穷国更好地应对冲突以及恢复有利于所有人的持久和平？一些冲突可以预见到，一些则无法预见。国际社会必须致力于开展预防外交。在国家政权薄弱、存在各种族裔争执的困扰以及缺乏必要资源来满足民众基本需要的地区，当然存在冲突风险，特别是在并非所有阶层的民众都能够关心或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情况下。

几年前，科特迪瓦曾被视为最稳定的国家之一，然而却爆发了战争。在中非共和国，据称各族群都幸福地相邻而居，但却出现了宗教分歧，令所有人感到意外。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是另外的例子，在整个非洲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叙利亚和中东其它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容乐观。

很多南方国家因为不具备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而未能幸免于战争。贫困、失业、不发达、社

会经济脆弱、不公正和边缘化是导致冲突的因素。当今世界的战争没有赢家和输家。所有参战方都是输家，因为战争造成破坏并留下大量严重问题，特别是物质和心理问题。预防外交大有希望，因为它是避免冲突的划算办法。为了恢复和平，一些人要求伸张正义——易言之，基于对错之分的和平——另一些人则特别重视和解。

必须将这两种做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严重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追究，针对所有其它情况必须开展和解。在南非为所有人树立为榜样的和解做法表明，国家能够扮演调解人角色。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更大努力，在南方国家宣传和和平文化，提高民众对于战争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战争罪行所负有的集体和个人责任的认识。

拉罗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并为指导我们的讨论提交出色的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我也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向我们介绍他对本议题的想法。

《联合国宪章》序言第一句强调，必须“免后世再遭战祸”，但这仍是一项艰巨任务。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次数大幅减少，国家内部战争的次数却显著增加。寻求永久和平是成立联合国的主要原因。战争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给我们留下令人厌恶的后患。因此，寻求永久和平的使命应该令我们思考过去的做法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不再是那些自称为保护主权或领土完整而武装自己的国家的辩词，而是准备发动战争的有意之举。我们依然相信这一格言：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

令人称道的是，联合国为防止冲突爆发采取了行动，但是，在这方面它所能做的不过如此。国家的利益有可能偏离联合国的原则，有时，它们与这些原则公然抵触，不可避免地导致《宪章》遭到违反，爆发各种形式的冲突。联合国表现出韧性和维

持和平、分离交战者的坚定意愿，还常常接到派遣部队以发挥这些作用的请求，过去六十年来，它一直令人钦佩地这样做。通过执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安全理事会在防止战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为我们各个国家的代表，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致力于把和平及杜绝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争端与分歧的手段。杜绝战争不应只是希望一种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种公正和平的状态，在这里，没有压迫行为来践踏人民的尊严，或剥夺其权利和自由。在权利遭到剥夺、有罪不罚被容许泛滥的地方，就会播下冲突和战争的种子，而仇恨、极端主义和不容忍则为其提供养料。在声明必需实现公正和平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求结束所有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和解决人类事务的手段。

战争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因此，无论是理性还是智慧都无法为其辩护。作为明白是非的理性人，我们必须知道，战争是错误的，而和平—公正的和平—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渴望结束战争并在全球各地迎来和平的景象。

忠实维护《联合国宪章》将意味着，首先，永久摒弃付诸战争的特权，接受和平地、包括以调解、仲裁和司法等手段解决一切争端的精神。第二，它意味着会员国尽一切力量，确保不允许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受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的责任就变成了预防的责任。

对于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其实还存在其它可行的备选状态。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做出防止战争的选择。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查我们外交政策的哲理基础与假设。我们必须确保不制订成为战争和冲突工具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我们需超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狭隘的所谓国家利益，进行重新思考。国家间关系的基础应该是包容而不是排斥，应该是同情而不是压迫。只有当我们强调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而非导致我们隔阂的因素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消除战祸面临看似令人生畏的挑战，但是，除了继续努力寻求永久和平之外别无选择。因此，我们坚信，使用预防性外交工具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可行的选择。联合国总部的街对面树立着一块推进和平事业的纪念碑，碑上刻着的是“铸剑为犁”。它提醒我们必需结束战争，拥抱和平。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我还愿感谢你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

约旦为今天辩论会提出的建议导致我们就如何能够落实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进行了一场讨论，本组织的成立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和创痛经历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禁止使用武装部队来促进和平。正如概念文件所述，今天存在各种冲突和局势，虽然它们并非传统概念上的战争，但仍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威胁。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内冲突几乎完全占据主导的时代，我们看到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灭绝种族行为。

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如果这样，我们是指没有像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那种二十世纪国家间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凶残战争。然而，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冲突或对抗或没有利益斗争的世界里。我们认为，实现一个没有传统意义上战争的世界，其原因是开发出了具有可怕破坏力的军事技术。的确，当代武器能够几十次地毁灭人类，所以大国之间的战争已变得不合情理和可能性不大，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

然而，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时代描绘为这样一个时代：它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其特点是滥杀滥伤的暴力泛滥，它们袭击、恐吓和杀害无辜男女、青年和儿童，违反不应利用他人自己谋利的道义原则。我为什么这样说？显然，今天，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上，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权力中心的利益以及为控制或调节某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发

展中国家命运而随机结成灵活同盟的不同大国的目标，与需要、期盼和渴望有尊严生活及和平世界的各国人民和社区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可从冲突中的平民受害者人数激增看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增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0%再增至当代武装冲突中的80%或90%，从而破坏了个人责任和不对作为现代生活一部分的外部因素负责的基本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出现了新情况、新行为体和新层面，围绕强大但却久已有之的经济和军事统治和纪律架构出现新形式的暴力，或非国家行为体行动带来的新威胁。我们指的是恐怖主义行径、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化、对自然资源的野蛮和掠夺性争抢以及各种形式的极权原教旨主义。但是，我们指的也是道德和政治暴力，它们产生并加剧饥饿、排斥、歧视和不平等现象，旨在保护有权或富裕的少数派特权，而多数人却受到贫困和不确定性的煎熬。例如，全球化金融权力中心的举动和决策就表明，今天能够以其它手段发起战争。

在《联合国宪章》之前，就存在战争方面的人道主义规范，如1907年的《海牙公约》，但是，只是通过联合国，和平的原则才成为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的一条最高准则。然而，我们知道，在《宪章》所载内容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我们知道，我们在本组织中，为遏制冲突加深与扩大的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防止冲突方面并不十分协调一致和有效。

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法治、各国人民在平等条件下有效行使可持续发展权和通过加强国家能力和国际刑事法院等打击有罪不罚的国际机制，使伸张正义和实现和平的目标和谐一致，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些最重要挑战。

最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落实防止暴行的区域和普遍预警机制，在这方面，在区域和国家范畴开展合作与对话从而加强法治至关重要。我要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致力于

奉行和加强法治，特别是凭借通过民主文书来这样做。

我们面临诸多挑战——经济、社会、环境、政治以及文化等性质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要求抛弃旧的帝国主义余毒影响，作为不合时宜的殖民主义，这种遗留影响在21世纪继续存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加强本组织消除殖民主义的努力——这是联合国的创始目标之一——并且考虑各个局势的具体情况。

我国认为，应强调指出的是，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以便有助于和平解决冲突。本组织及其会员国能够利用的和平解决手段之一是本组织可以赋予秘书长的斡旋作用。如果冲突各方在这些进程中有诚意地履行其责任，斡旋任务或任何其它和平解决冲突手段都将取得期望的结果。

确保和平是本组织创始人的明确宗旨，但要确保和平是持久的，不仅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而且也需要所有联合国机关以及各个会员国采取行动，以便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完全平等地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有创新意义的重要公开辩论会，讨论“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这一主题。也请允许我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为本次讨论所作的宝贵贡献。

首先，请允许我申明，这里是进行此类辩论的适当场合。我们都知道，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之所以成立，是为了解决国际联盟的无效之处，因为国际联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设立联合国为的是应对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巨大威胁，也再一次表明国际社会拯救后世后代免遭战祸的集体决心。尽管在联合国存在的近69年中没有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但发生了数百次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尤其是在非洲大陆上。

遗憾的是，联合国与其前身一样，未能预防冲突，至少就1994年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灭绝种族屠杀而言如此。我们都知道，这一事件是可以预防的。当时，安全理事会选择对当地人民的呼吁充耳不闻，部队派遣国则撤出它们的维和人员和外侨，某些情况下把在其营地中寻求庇护的手无寸铁的人留给联攻派民兵。结果是，100多万人在仅仅100天中遭到无情的杀戮。在我们纪念1994年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灭绝种族屠杀二十周年之际，我们不断想起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我们的家人被屠杀时袖手旁观的场景。

尽管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低谷，但主要问题是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是否从中汲取到了任何经验教训，以推动它在今后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了一些进展，包括通过了“保护的责任”原则，但达尔富尔、利比亚、叙利亚或中非共和国的冲突都提醒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做更多工作。

主席先生，你在发言中提及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我认为，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作用很好地说明，它未能在该国实现持久和平。主席先生，如你所言，通过联刚行动，联合国自刚果独立之后就一直驻留在当地。但遗憾的是，54年之后，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深陷冲突，不仅是在东部，在该国其它地区也如此。在努力弥补联合国在那里的失败的时候，让我们努力避免走捷径，不要去寻找刚果民主共和国危机的替罪羊，相反，我们应深挖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确实有意愿，如果我们确实想帮助刚果人民，我们就应这样做。这对我们的未来可能非常重要。

对卢旺达人民来说，过去20年的记忆形成了我们的谅解，也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成功恢复了对国家机构的信心，让卢旺达人参与重建可持续的和解，建设有竞争力的经济，促进发展和恢复性司法，并且克服族裔隔阂。我们认为，这些是任何国家一级预防性努力的基础，继而或许可以形成寻求永久和平的区域和国际办法。正

如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所概括的那样，有必要分享有意义和解的经验以及巩固持久和平的最佳做法。

卢旺达开展了许多进程，以求使我们国家的需求与我们的国情相符，并且采取了许多本土解决办法，例如加卡卡法院，这是恢复性司法的一种基层形式。对卢旺达来说，冲突后社会中的正义与和解二者密不可分。卢旺达人民已经接受把这一本土制度作为和解司法机制。加卡卡法院于2012年6月关闭，10年间处理了约200万起案件，与此同时，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尽管建立了惩处灭绝种族罪及其它战争罪方面的有益判例，但在17年中只处理了75起案件，而且耗资巨大。如果结合背景来谈问题，那么，尽管冲突的原因数量众多，但社区和利益攸关方在制订解决办法时必须更加明确具体，不仅考虑冲突的具体情况，也要考虑寻求恢复的社区的具体情况。今天，我们能够与其它冲突后社区分享这一独特经验，它是促进和解和防止进一步冲突的一种手段。

卢旺达走向稳固团结与和解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是，我们通过了所谓的“Ndi Umunyarwanda”方案，从字面上翻译，意为“我是卢旺达人”。这一方案是我们愈合创伤进程的一部分。卢旺达人认识到，如果我们真地需要建设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上这样做，消除任何不信任。因此，“Ndi Umunyarwanda”这一倡议旨在把眼光放长看远，超越造成卢旺达人隔阂的问题，以便通过公开对话、讲述真相、忏悔、谅解和愈合创伤，建立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国家，加强问责制文化，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且确保和解与团结。

主席先生，你与我们分享的概念文件强调历史和档案在冲突善后工作中的作用以及联合国如何能够帮助将历史现实变为对过去的共同理解。由此，我要谈谈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档案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些档案移交给卢旺达，因为这些档案是我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们对于保存对灭绝种族

事件的记忆至关重要，并将在教育后代防范有人为灭绝种族事件翻案和修正历史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卢旺达永久和平作出贡献。

鉴于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不得不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由于现代冲突和战争不断演变，各国和广大国际社会一直在制定应对冲突的新办法。联合国已经确认国家和区域行为体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这方面的高度相关性见诸于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国际社会现在正将它们的工作重心转向处理冲突的根源，同时提高合理安排和执行其努力的能力，以便在平民面临危险时介入。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们去年4月在卢旺达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发出的呼吁，那就是安全理事会应当作出更多努力，以便防止冲突而不是管理冲突（见S/PV.6946）。在我们为使民众免遭灭绝种族的政府侵害而履行我们的保护责任之时，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加强预警系统，而且还要部署重要工具，例如建设和平委员会、预防性外交和其他斡旋努力。同样重要的是，必需投资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级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以便为基于法治、民主原则与价值观以及问责的善治奠定基础。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建设能够抵御暴力和战争的社会。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感谢法国大使、我们的朋友热拉尔。

（以法语发言）

他的发言极为出色。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一发言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法国的经验扩大到若干其他国家。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通知各位成员，由于有众多发言者，午饭期间我们将继续进行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现在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陶拉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非常赞赏提出举行本次辩论会的倡议。安理会成员不得不经常应对眼前的危机。太少有机会后退一步，审视较大范围的情景，而要有机会看一下形成目前安全环境的历史因素，那甚至更稀罕了。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视历史的人往往会重复历史。

今年我们不仅将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且还将反思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事件的爆发。在这样的时候举行本次辩论会是适时的。1993年，如果安理会成员更多地反思卢旺达的历史，它们也许本能够作出更好的准备，以识别和处理潜在的紧张，从而防止随后于1994年爆发的危机和全都未能作出反应这种可悲局面。

然而，向历史学习不应当仅限于从过去几十年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最近的历史中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对马里危机，在经历一番拖延之后，终于采取了行动；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本应当使安理会在更知情的情况下就中非共和国局势采取行动。

可悲的是，过去冲突往往是未来冲突太长见的一种标识。安全理事会近年来所举行的许多专题辩论会都凸显了安理会在预防冲突与和平解决冲突方面作用的重要性，但专题叙述的执行往往不得力。安全理事会为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制定了许多工具，但对根据《宪章》第六章采取和平行动则远非那么适应。使安理会的工作适应这一目的至关重要。

新西兰敦促安理会采用更灵活的工作方法，这样它在审议存在冲突风险的局势方面就能更加敏捷，在参与方面就会更具包容性。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留出时间，以使安理会成员以及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或能够提供帮助的人能够更好地评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在哪里出现，以及早期反应可以有什么助益。

处理导致冲突的历史根源并不只是一个迅速查明潜在问题的方法。它对制定可持续解决办法也至关重要。持久和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民族和解。因此，主席先生，十分可喜的是，你今天让和解进程受到人们的关注。

新西兰确认，安理会过去经常申明民族和解的重要性，但任务授权中却往往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热烈欢迎约旦所提出的创新建议，并支持安理会制订适当的机制。

像安理会所有的工具一样，这类机制必须符合各国的需要和情况。在我们太平洋地区，近些年来，新西兰和我们的区域伙伴在所罗门群岛帮助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环境，以使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能调查那里发生冲突的各种原因，从而促进民族团结。这一进程确认了地方自主的重要性。

安理会应当更多利用和解进程。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安理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可以通过密切合作发挥有助益的作用。它们可以帮助安理会理解可能导致冲突的特定历史风险因素，并支持地方建立和解机制，以处理支撑紧张和分裂的因素。

新西兰期待进一步开展后续工作，以了解历史能够为安理会在查明和日后避免冲突风险方面的工作做什么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阿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和鼓励反思这一重要问题。巴西欢迎贵国代表团所散发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并欢迎其中所载各项建议。我还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的通报。

人类已懂得，战争意味着死亡、毁灭、灾难和长期痛苦。然而，历史已经表明，单靠法律和道德说教不足以消除战祸。永久和平不可捉摸，应当

导致我们认清从过去吸取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而这应当成为我们集体参与的一部分，以便发挥我们在这一最紧迫事项中的作用。

首先，必须捍卫外交、合作和多边主义，把它们作为否定战争不可避免论的支柱。多边集体安全体系，特别是安理会，仍然是人们寄予最大希望之所在，以便将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可持续和平的未来服务。为此，必须将普遍性和合法性视为这一体系的最大强项。对于普遍适用的规则和承诺，不应当允许有例外或自行免于遵守的余地。国际社会在力求表明它已从以往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正确地提醒着自己，它未能防止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事件和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但这方面的记录还有种种污点，例如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和历时几十年未能有效解决巴以和平挑战。

在我们探讨教训寻求永久和平时，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联合国宪章》及其有关使用武力的重要规定，代表着国际社会防止重蹈二次世界大战覆辙的最重要成就，这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篇章。安全理事会作为维护这些规定的主要机构，仍然是这方面的核心权威，要让安理会具有实效，它就必须被视为合法并具有代表性。

在一个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改组的多极世界里，必须带着紧迫感解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要求，否则我们将面临削弱这一制度的风险，这一制度尽管有缺陷，但限制了冲突的危害，并确保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合作促进和平。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教训是，必须进一步优先突出预防冲突。安理会若能更好地预测对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原可避免几场战争。我深信，安全理事会可在这方面更有所作为。平民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孕育中的危机不会升级成为公开冲突。保护平民的最有效办法是预防武装冲突，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应认真承诺用和平办法加以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年后，我们在重新回顾其恐怖时应当记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最严重的局势产生于武装力量最强的世界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审视时下的安全理事会议程可能导致有人想象贫困与战争的相互关联，但事实是，历史上军事上最先进的国家造成的破坏规模最大。今天，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继续来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和拥有，以及最强大的国家有时可选择将自己置于国际法之上的观念。

在考虑历史对于和解的重要性时，安全理事会不妨听取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在其最新报告（A/68/296）中提出的意见。沙希德女士着重历史的编写和教学问题。让我提及她对历史表述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不断重新诠释历史的正当做法和为了狭隘的政治目的而操纵历史的做法作出区分的挑战。在冲突后国家，强调敌对身份的文化表述经常融入历史叙述，从而巩固各群体之间的敌意，可能导致今后冲突复发。

在冲突后局势中，特别是在塑造稳定社会的基础时，理解对方而不是延续对抗的态度极为重要，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和平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开展这项工作。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谨回顾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在建设和平方面强调多元化的呼吁。他在探讨身份与暴力的问题时，触及到一个与今天辩论尤为相关的问题，即允许个人多重身份并存的重要性。他强调，按照单一特性或身份分类，会加剧不信任，产生暴力。用森先生的话说，

“当今世界和平的前景，很可能就在于承认我们属性的多重性，在于我们作为广阔世界的共同居民发挥理性，而不是使我们成为被僵硬地禁锢各种小团体之内的囚犯。”

因此，文化多元性可被视为是防止巩固助长仇恨而不是促进谅解的霸权主义或狭隘意识形态的必要因素。与此同时，对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表述，不是因为强加解释的结果，而是双方共同接受的表述

同样重要，可打破因为偏见和使他方非法化而散布谣言和扭曲事实的模式。

在安全理事会内谈论文化和教育可能看似不寻常，但鲜有作家能象黎巴嫩旅法作家阿敏·马卢夫在其杰作《无序世界》中为21世纪提出路线蓝图，雄辩地勾画我们现在寻求和平的处境。他提醒我们，

“地球上所有人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处在同一个风暴中，不论贫富、傲慢、潦倒、占领者或被占领者”。

为此原因，他认为，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只能突出文化和教育。圣人的笔墨价值超过烈士的鲜血，伊斯兰教的先知如是说。在《犹太经传》中有一个动人的说法，即世界是靠读书学习的孩子的呼吸支持的。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罗森塔尔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专题辩论，并祝贺你在几乎没有时间提前准备的情况下如此成功地履行安理会主席的工作。我们还要感谢你今天上午的雄辩发言，感谢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十分清晰的通报。

我们赞赏令人感兴趣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和其中所载非常具体的建议。它是我今天发言的基础。我的参考点是，文件邀请我们思考如何防止战争，维护和平，这是安全理事会存在的理由，也是安理会每天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将要讨论安理会开展工作的效率。

我国代表团刚刚完成作为安理会成员的两年任期，曾经认真思考安理会应当如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的工作。很难在四分钟时间内适当地谈论这个议题。我谨非常简单地谈以下几点。

首先，安理会尽管存在严重缺陷，但过去二十年来，在维持和平方面比较成功，即使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也能比较成功地遏制和管理冲突。但有少数例外，其中首先是叙利亚。

其次，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会员国、秘书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学习和累积。如果把现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做法与十年前的做法相比，我们注意到有重大创新，其效力不断增强，更注重解决冲突的根源。安理会专题议程逐渐扩大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无须赘述，但要强调主席先生的观点，即实现和平是一码事，实现牢固和持久和平又是另一码事。

第三，我国本身曾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因此赞成概念文件强调宽容与和解的文化。然而，我们必须持现实态度，认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完美。我们应当始终强调预防冲突，但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然失败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遏制冲突，并运用我们所拥有的正在不断增加的一切手段，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代价迅速制止冲突。

第四，不存在如何维护和平的现成答案。在每个局势中，情况乃至个性都各不相同，而它们起到关键作用。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使其授权符合每一种特定局势。

第五，安全理事会可对实地事态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但归根结底，只有冲突当事方——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才能维护或恢复和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国际社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国内行为体才是其命运的最终决定者。还必须认识到并处理日益增多的派系和部族冲突，特别是国家内部的此类冲突。这要求我们必须评估调整安理会所拥有的工具及其使用办法。

最后，事态是变化的，趋势并非一成不变。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是，局势恶化——就像我们今天在非洲和中东各国看到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大灾难。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可以针对事态和趋

势采取行动。安理会对各种政策妥善并举，可以防止冲突和扭转趋势。主席先生，实际上，这正是安全理事会主动积极开展工作的意义所在。安理会在过去67年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在各种情况下，是能够在你的概念说明所提到的坚实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普罗索尔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以一个目睹和经历过战争的人的身份——以一个士兵、一个外交官和子女被送往前线的父亲的身份——站在安理会面前。我今天在安理会发言，会着眼于这些经历，着眼于为了逃避消灭犹太人的暴行而逃离纳粹德国的我父亲的经历。

两天前，联合国纪念了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缅怀了遭受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150多万儿童。

大屠杀的惨绝人寰或许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达到了极致，但将要发生这一灾难的迹象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看到。犹太人蓄意地妖魔化，被剥夺了尊严，然后被剥夺了财产，最终被剥夺了生命。

在上个世纪，这种诽谤、贬低人格和流血现象一直是将要发生暴行的标志。尽管作出了“永远不再重演”的承诺——即便是在这个议事厅里作出了这一承诺——但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一再重演。

战争并非始于动用武器或部署部队。战争始于在普通人心中播下仇恨和不宽容的种子之时。

今年4月将是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20周年——该事件不仅残暴绝伦，而且也是完全可以防止的。在灭绝种族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联合国卢旺达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将军曾警告，胡图族极端分子正在策划一场消灭图西族的行动。

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为警示预兆已经十分明显。电台言论中充满了不堪入目的内容，将图西人称作妖魔，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社会弱势成员成为目标，儿童被征召参军，妇女遭到攻击。有人制定了一个名单，详细列出了将要杀死的人的姓名。达赖尔将军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但他的警告被置若罔闻。

当描述灭绝种族罪行的照片和故事出现的时候，世界为未能阻止这一暴行而感到不安，于是再次承诺“永远不再重演”。就在几年后，它无视历史教训，达尔富尔又出现了诽谤、贬低人格和流血的周期循环。

从柬埔寨到波斯尼亚再到索马里，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未能防止无辜民众遭受屠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争取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容忍政府对其人民施暴。在桶爆弹降落在叙利亚公民身上、伊朗死刑增多、中非共和国性暴力现象猖獗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必须打破沉默。我们必须消除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主张什么，并捍卫我们的信仰，那就是永远都不纵容种族主义；永远都不能无视煽动行为；面对发生战争的迹象，绝不保持沉默。

整个中东的学校、清真寺和媒体都在教导人们仇恨和丑化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教人们不把他们当作人。就在此时此刻，有人正在教导一代巴勒斯坦儿童，杀人是符合道德的，种族主义是正义的，恐怖是可以容忍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媒体援引希特勒的话，把犹太人说成不是人，并展示抹杀以色列存在的地图。

今天，我们在伊朗看到受到国家许可的煽动行为。在那里，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英语进行糟蹋，将以色列称为“癌瘤”，并要求把我国“从地球表面上”抹去。该政权就坐在这个机构里，威胁要消灭以色列。对于那些认为“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的所有人，我要回应的是，就在两个月前，数万人

走上德黑兰街头，高呼“美国去死”和“以色列去死”的口号。

即便在埃及，在35年的和平之后，政府仍未能推行反对煽动的教育。1979年，萨达特总统勇敢地站在以色列议会，达成了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但今天，从开罗的每个角落到亚历山大的每一道拱门，仇恨情绪无处不在。官方媒体宣扬反犹太主义，电影院将以色列形容为敌人，在地图上则是把以色列抹掉。

在政府之间建立和平还不够，我们需要人民之间真正和解。各国政府有责任教育本国公民力行宽容、公正和相互尊重。

宣称不能容忍战争还不够。承诺“永远不再重演”还不够，我们必须注意警示预兆并采取行动，首先是根除煽动和仇恨行为。人们对历史上的恐怖行为常常报之以沉默。在这个称为联合国的机构中，很多成员未能以一致的声音说话，未能集体谴责要求消灭其它会员国的国家。

我想在这个会议厅警示世人不要对他们身边的暴行视而不见，不要对随之而来的仇恨置之不理。我们有责任清楚和明确地反对仇恨。让我们为下一代提供话语而非武器；向他们传播思想而非激进的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力行宽容，而非实施恐怖主义。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它不是自然的不可抗力。它也非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战争可以防止，但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摒弃冷漠，捍卫和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托马斯·迈尔-哈廷先生阁下发言。

迈尔-哈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举行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

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黑山和塞尔维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均赞同本发言。

主席先生，在你的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中，你提醒我们注意《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第一段，它表达了联合国各国人民“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

在20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整整100年和阿道夫·希特勒把欧洲卷入第二次全球性战火后75年，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安理会发言，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两次世界大战均起源于欧洲。仅仅两天前，在大会堂进行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仪式再次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欧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

但是，今天我是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正是我发言所代表的这个组织可能体现出我们这个饱受战乱大陆历史中最突出的经验教训。的确，诸如让-雅克·卢梭、伊曼努尔·康德、朱塞佩·马志尼和维克多·雨果等伟大的欧洲人在欧洲一体进程开始之前就制订了永久和平及欧洲统一的战略。但是，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冲突之后带来了真正的变化。

1951年5月，罗伯特·舒曼宣布成立煤钢共同体时曾预测，这种资源的集合将使法德交战变得“不仅无法想象，而且没有实际可能性。”正如卢森堡常驻代表在本次辩论会一开始提醒我们的那样，舒曼还坚定认为

“欧洲不会一次性或按照单一计划建成。它的建设将有赖于具体的成果，首先是达成事实上的团结。”

那些关注我们在布鲁塞尔和纽约这里所作努力的人都非常清楚，即使在舒曼所作宣布过去60多年之后，“建设欧洲”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是，他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加入该进程的欧洲国家来

说，这六十年是它们整个历史中历时最长、不间断的共同和平期。

主席先生，在本次辩论会之前，你强调了和解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欧洲的经验表明，和解是有可能实现的，即使是在那些世代彼此视为敌人的国家之间也是可能的。但是，和解不能靠发布指令来实现。国家间的和解需要领导魄力，但是，它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促进和解最实际的一个方式可能是侧重于舒曼谈到的共同具体成果。

主席先生，你还强调，有效和解需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基础之上。你还提出了这方面和关于如何推动这种和解进程的有意思的若干切实建议。我们赞同你的基本评估，但是，我们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是一种巨大挑战，即使在我们欧洲框架内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在这方面，主要在双边一级，在单个成员国之间，各方已做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努力，包括在编制学校统一教育材料方面。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确保冲突后形势下的民众尤其是青年更好地了解历史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冲突期间继续开展教育活动，或者至少在交战结束后立即恢复这些活动。如果冲突区域的整个一代儿童没有机会上学，那么要赢得他们的拥护将难上加难，和解工作也将面临更大挑战。这是欧洲联盟如此大力强调支持为那些受世界各地冲突以及最近遭受叙利亚境内冲突影响的千百万儿童提供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请允许我强调，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完全赞同你在概念说明中所表达的看法：如果不追究那些犯下最严重罪行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主要战争罪的个人的刑事责任，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解。这是我们欧洲共同经历中的另一个部分。确保以此种方式追究责任，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具体职责。在这方面，安理会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尤其重要。

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坚信，区域一体化这个概念可大大推动包括目前欧洲联盟边界之外的

和平与持久和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我们为西巴尔干各国提供了加入欧洲联盟的前景。我们相信，欧洲一体化也为它们提供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在欧洲集体大家庭中建设更光明未来的最佳机会。

同样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致力于支持世界其它地方所有寻求实现一体化目标的国家。我们与非洲联盟的密切和密集合作尤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安全理事会一再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可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重要贡献。长久以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坚定地致力于包括通过欧洲联盟牵头的军事和警察特派团等方式来参加国际维和及建设和平活动。因此，在安理会一致授权在中非共和国部署一个欧盟行动仪一天后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非常合适。

奥地利作家英格伯格·巴赫曼曾写道，历史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它却找不到学生。我认为，我们欧洲的经验以及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全球各地许许多多其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经验证明，国家、民族以及整个国际社会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不断给予鼓励。主席先生，你今天决定召开的会议就提供了这种鼓励。再次感谢你的倡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穆阿利米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举行本次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更具体地说是关于“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这一主题的公开辩论会。这使安全理事会能深入审议触及本组织工作之根本核心的事项，而尽管它既复杂又重要，但是尚未得到应有的分析和了解。

我还要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先生所做的通报。认识到历史性叙述在冲突后民族和解与预防性外交方面的实质性作用，这本身就体现

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根本改变。这是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人为方式愈合着伤口。这有争议的历史性叙述蕴藏着未来内战的种子，是世界许多地方经受过苦难的核心所在，它使战争长期存在，而且破坏种种和平进程。

历史性叙述是身份特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是认为它并不受当前事态发展的影响，那是错误的。它对于当下和未来事件的前景有着具体的影响。

不论是否正确，这个历史命题不止步于过去，而是延伸至眼前与未来。未能为找到一个处理冲突后局势的共同历史视角建立一种有利的环境，可能是十分严重的事，而且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这方面，安全超越但并不废弃以传统方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民主转型和经济活动。它与基本的历史事件牢牢地联系在一起。除了有必要界定这样一个共同的历史命题外，至关重要的是，解决争端的努力要经受正义的锤炼；如果没有，那它们可能危及未来。要解决某些争端可能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但是解决这些争端应该基于可信的建议。

沙特阿拉伯一直寻求通过让当事各方言归于好，为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作出贡献。我们采取过一些主动行动，包括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公正与全面和平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对该倡议内容的任何减损——诸如未能承认在1967年6月4日边界内建立以圣城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对巴勒斯坦难民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享有的回返权利提出质疑；或者采取旨在削弱巴勒斯坦国完全主权的种种行动——都将削弱作为最终解决办法之依托的正义与平等这一基础。

任何公正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办法，其切入点都应该是，让那些使叙利亚人流血并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离开。他们不应该在确定新叙利亚的

未来方面发挥任何作用。沙特阿拉伯一直在认真地听取也门、黎巴嫩、索马里和其他地方各冲突当事方的要求，并力求在他们之间达成一种解决办法，包括在终结了黎巴嫩内战的塔伊夫会议上和通过帮助也门从冲突向和平过渡的海湾倡议。我们也与索马里的一些长老理事会举行了会晤。

在所有这些举措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一直充分认识到各种冲突的历史背景。我们始终力求采用一种使我们能从其经验教训中受益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倘若解决办法中包含赦免或豁免的内容，那也应该征得当事各方的同意才行。避免流血必须优先于复仇。可以在不偏离历史现实的情况下通过赦免和容忍来伸张正义。这一原则是由沙特阿拉伯王国创始人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国王正式提出，并得到南非曼德拉总统的支持。

沙特阿拉伯王国力求通过对话避免冲突。为此，我们已经提出了两圣寺护法、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国王陛下一些意在联络各宗教和派系的倡议，包括在2008年的八国集团会议以及在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与西班牙和奥地利合作的全球对话论坛。对话包括专家和知名人士以及政治领袖，以便在文化与宗教多样性方面增进并倡导和平共处，从而导致持久和平。

我谨与安理会分享一些想法，希望这些想法将在与它们对历史性叙述的概念及其追求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相当的层面展开讨论。达成一种共同的历史性叙述，既披露真相和揭示违反人权的行为，是正义的各个主要支柱之一，而且还巩固稳定与和平。但凡以导致达成共识并避免重犯过去各种错误的方式努力在有着共同家园的公民中实现和平的，都迫切需要在披露真相与伸张正义和实现民族和解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

每一种局势都是独具一格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他人的经验中受益。这不过是强调一概而论有种种危险，也强调把不适当的设想强加于人

可能使实现和平的机会复杂化。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参与不应该忽视利益攸关者的意愿。它应该有助于当地各方根据其自身的心愿、文化和历史解决其争端。这其中包含着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对于预防冲突恶化和实现可持续和平负有道义的责任。我们欣见约旦提出富有创意的想法，并特别支持建立一个旨在配合冲突中各国当局的联合国历史咨询小组，以恢复和保护重要的档案、记录目击者的证言证词、收集数据资料并建立国家档案委员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德国代表发言。

汤姆斯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今年，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75年前，德国使人类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深重苦难和数百万人死亡—今天依然让我们无法言喻。这就加强了我们从过去的冲突中吸取适当的教训而不是重犯昔日可怕错误的决心。

欧洲100年前不稳定的力量均势被打破也是外交手段的重大失败。不仅七月危机期间的情况如此；早在以前数年间，外交官和政客们都未能构建建立信任及和平地平衡邻国间利益的机构和手段。当时，外交政策所依据的模式已经过时，无法跟上二十世纪初期密切相关和快速变化的世界。当灾难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外交界缺乏防止灾难的意愿和手段。100年后，这应当大力鞭策我们了解昔日战争的起因，为未来吸取经验教训。

2014年也是铁幕倒塌25周年。在德国，我们认为这是提醒我们，依靠外交和政治努力以及相互谅解，的确可以实现和解与持久和平。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现已从20世纪上半叶的大灾难中汲取两大经验教训。首先是要与全世界的伙伴一道，争取建立一个立足于共同规则和共有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联合国本身就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作为第二个教训，欧洲

人决定以立足于新的法律秩序的社会取代欧洲大陆列强脆弱的均势。欧洲联盟就是在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联的日益密切的邻国网络基础之上建立的。如今，战争在欧洲联盟内是不可思议的。

克服法德两国的敌意是这一成就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绝佳实例，说明对历史的共识和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能够促进持久和平和长久的友谊。这一理念是两国1963年签署的《爱丽舍条约》的核心。它没有把和平交给政客掌控，而是使其成为民间社会的一项事业。尤其强调让青年共同参与对历史事件作评判分析。如今，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学生使用相同的法德教科书了解其共同历史。

当前，关于往昔的开放性可能带来开放性创伤。德国凭借自身的经历，不能不强调必须从总体上以史为鉴，尤其是必须对冲突形成共识。共同努力，更好地了解某些冲突缘何发生和如何发生，可以成为促进双方和解的强有力催化剂和坚实基础。对于联合国而言，尽力参与支持这些进程是一项光荣的事业。安理会主席编写的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为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切中肯綮的要点。

但是，这项任务可能听起来简单，但其实不然。冲突，无论是国家间的战争抑或是内战，都留下深刻的创伤。因种族或其他文化背景爆发的冲突造成的创伤特别深。谋求和平与真正和解的意愿只能来自先前的敌对方自身。因此，第三方能够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在这些进程中，外来援助固然宝贵，但是，在设计这种进程时应当铭记这些因素。然而，2014年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教育我们以史为鉴并且与邻国分享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为此做出一切努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祝贺约旦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并祝贺你本月指

导本机构工作的方式。你知道西班牙人民对约旦人民的深深尊重和敬意，也知道我们两国王室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因此，参加约旦主持的本次公开辩论会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这不足为奇。我也要表示我国对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的感谢。

今天审议的主题——我们可以而且我敢说我们应该从战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是至为重要的主题之一。托尔斯泰闻名于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勾勒出一部人类史，但没有提出其周期性延续的解决之道。放眼整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伊曼努尔·康德等光辉思想家进行了大量思考，但在人类历史上，和平遇到的困难永不间断。相反，和平是在武装冲突之间的短暂间隔期显现的。充其量，和平只具备休战的不完美特性。这种以纷争为标志的永恒动态澄清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即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在这种纷争中，人类群体间关系的特点是对权力的勃勃野心。

我们的责任就是反对这种倾向。在本次辩论会上所作出的发言无论多么简短，都必须清楚地表明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知道我们的基本义务是保护后世免遭战祸，以及我们决心采取行动，使《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宣告的意图变为现实。我们必须做出承诺，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危险地高悬于我们头顶的世界上，我们不可再止步不前。

我荣幸地代表一个有过辉煌也有过暗淡的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发言。西班牙一直是宗教战争、自卫战争、干涉战争、民族生存战争、王朝战争、内战和意识形态战争的主角。西班牙也遭遇过无情的恐怖主义祸患。我们发动过国际战争，也在国内冲突中流过血。

我们凭借历史经验可以被视为这一事项上的权威。我国黄金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如弗兰西斯科·德维托里亚、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或多明戈·德索托——在战争的道义问题、战争的合法性及其在实

践中的局限性方面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诉诸战争权”和“武装冲突法”这两个概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贡献，并且在20世纪被纳入国际法中。

战争与众所周知的古话背道而驰，顾名思义，它从来就不是美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技术的进步，可以说战争已成为完全极度倒行逆施的行径。今天，西班牙十六世纪伟大的画家贝拉斯克斯不可能在画布上绘就《布雷达之降》的画面，这幅画作以描绘战斗结束后交战双方的侠义姿态而著称。现代战争呈现的是戈雅的黑色绘画或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壁画中的残酷画面，安理厅外面悬挂的挂毯上描绘了这种画面。在这个饱受种种挑战困扰的世界上，人类必须永远摒弃战争。

2014年是欧洲列强相互较量一较量的主战场是旧世界一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抑或所称的大战或欧洲大战爆发100周年。这是一场可怕的冲突，它为斯蒂芬·茨威格沉静、痛苦但清晰地回忆的“昔日世界”画上了悲惨的句号。这场冲突使我们的良知不安，这既因为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也因为人们感觉到，如果达成和平解决方法的意愿胜过将霸权主义愿景强加于人的野心，这场冲突是有可能防止的，或者至少其力度是可以减弱的。

然而，那次战争的恐怖不足以使我们彻底摒弃使用武器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法。国际联盟是一次值得赞许的尝试，但却失败了，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发生的一些情形透露出国际联盟的缺陷。正如德国代表刚才所谈到的那样，需要爆发另一场甚至更具毁灭性的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便欧洲得益于一代充满了勇气和远见的杰出政治家的贡献，为一个导致产生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进程奠定基础，这个联盟以合作代替武装冲突，以谈判和妥协代替残忍的武力。

联合国时代也没有免于战争的祸患。恰恰相反，冲突和暴行不胜枚举，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十分可怕的。

由于“涉及到人的一切都与相关”，国际社会不能对暴行保持麻木不仁。采取行动反对暴行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尤其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责任，而且根据《宪章》的授权，就是这个组织内的安全理事会的责任。西班牙支持安理会、大会和秘书长为解决冲突而开展的一切努力，这些冲突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使叙利亚、达尔富尔、南苏丹、索马里、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这里仅提几个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数十万无辜受害者丧生。

在这方面，我谨响亮而清楚地呼吁中东和平。西班牙热切盼望目前的谈判将达成协议，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有安全边界的比邻而居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奠定全面基础。世界需要这一好消息，我们无法再继续等待了。

主席先生，最后我想简单谈谈你在概念文件中提到的“表述”问题。我这么做以申明受害者相较加害者的道义优势。这一论断放诸四海而皆准——利迪泽的灭绝营、奥拉杜尔、卢旺达、斯雷布雷尼察，再举一个本国的例子，西班牙安多艾恩和吉普斯夸的街道。我们必须缅怀和纪念受害者，因为人要有尊严是公正的和必要的，因为和解这一比没有敌对行动更高级的状态，必须根植于真相和正义。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乔拉科维奇女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国约旦召开今天的主题辩论会并提交概念文件(S/2014/30, 附件)。我还要感谢副秘书长的通报。

今天的辩论是审议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机会。这次辩论或可使安理会能够通过战争的认识来吸取经验教训，这对于实现永久和平是必要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不断重申“永远不再发生”的诺言。不幸的是，即使今

天，我们仍然在世界各个地区看到冲突和战争。冲突之后是谈判和解决纠纷，产生和平协议，作为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长期进程中重要的第一步。我们今天的发言将集中于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的阶段，也就是说，是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的漫长路程。

从冲突后阶段过渡到正常运作、面向改革和现代的国家经常会受到社会中各种枝节问题、障碍和复杂情况的影响。旨在找到所有公开问题解决方法的对话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应当有助于国家完成其建设和平议程。这对于确立必要的集体优先事项，以实现社会内可持续和平是必要的。

我们重申，国家自主权和国家责任对于建立持久和平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国家自主权，确立冲突后建设和平的优先事项和战略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当局。为了避免暴力和不稳定的往复循环，体制建设和治理必不可少，因为这为公民提供了安全、正义和经济稳定。

然而，在冲突后进程中，把责任从和平进程利益攸关方之一的国际社会转移到国内行为和机构是一项非常微妙和极其重要的任务，应该以渐进和适时的方式进行。国际社会建立过渡管理机制应该与加强国内体制能力共同进行。

采取协调一致、迅速的行动，支持冲突后政府建立可信和可问责的体制对于整个建设和平进程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如果实施得当，此类行动有助于重建安全环境、合法性、问责制和有效性，从而交付明确的和平红利。

冲突后体制建设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需要在实现短期结果和长期能力发展上找到平衡。寻找最佳解决方法，在该多层面的努力中实现协同增效的努力永不停止。

冲突后社会经常苦于因为对过去的不同认识和解读而产生的深刻分歧。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强调，民族和解和信任应该被视为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和社会的额外前提条件。因此，一项必要的

共同目标就是调查所犯罪行，对罪行实施者进行恰如其分的起诉，不管他是谁。法治、现有人权文书的执行、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归和融入当地社会必须成为国家的优先事项。此外，促进区域合作对这一进程极为重要。所有这些活动与努力都被看作是实现民族和解所必需的步骤。然而，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言，即使在冲突结束二十年之后，和解进程仍在进行之中。我们的经验是，和解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它需要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有真正与长久的伙伴。请允许我向安理会简略地通报一下我们的创新举措，以便在我们冲突后发展的这一阶段促进对话与和解。

考虑到联合国在这方面具有经年累月的专门知识和比较了解情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去年向秘书长提出要求，请联合国提供援助，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主席团确定将教育和文化作为能发挥跳板作用的关键领域，以使对话与和解在我国更深地扎根。从那时以来，根据主席团的要求和倡议，制订了一个题为“为了未来的对话”的联合项目，由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负责，其组成包括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基会和教科文组织等的成员。该项目寻求通过建立对话平台，将主席团等资深决策者、公民和民间社会联系起来，以提高本地促进共处、和平解决争端与和解的能力。

该项目还设想建立一个拨款机制，以便为本地的艺术、文化和教育倡议提供资助，向年轻人倾斜，从而通过市民和文化间对话倡导共处和尊重多样性，并且制订一项沟通与外联的战略，以便增进公众对和平、和解与尊重多样性的认知。这一倡议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催化建设和平进程和诸如下列各项结果：首先，提高本国促进共处、和平解决冲突与和解的能力；第二，提高公众对共处、和平解决冲突、和解与尊重多样性的认知和改善态度；以及第三，增进公民、尤其是青年，民间社会和领导人在有关文化间对话与和平共处各项活动和倡议方面的参与程度。

我们还赞同概念说明所载的下述立场，即，必需使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能从其对战争和对实现持久和平所需条件的理解中汲取经验教训。事实是，安全理事会定期审议冲突后建设和平的种种问题。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对于它如何才能在动乱的过去有一种商定或共同的叙述和共同的记忆这一基础上帮助前战斗人员与其人民达成和解，联合国理解得不够好。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要与那些在危机和建设和平进程中有过亲身体验的会员国交换看法的原因之一。这种意见交换能有助于优化联合国建设和平机制并提高我们对当前建设和平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共同认识。

我们理解约旦在关于以“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为主题的本次专题辩论会的概念说明中所发出的信息。根据《宪章》，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之一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需要采取集体措施来预防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的建议是，授权设立一个小规模的联合国历史咨询小组或国际历史委员会；这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可以在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及其工作方法改革的谈判期间来处理。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莱昂·冈萨雷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欢迎安全理事会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以探讨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的重要议题。

我们认为，适时的是，首先重申，将我们汇聚在一起的本组织，其创始人在联合国诞生之时即设定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这一目标。创立本组织的《宪章》要求我们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并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正是《联合国宪章》的首要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以防止和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

情势。同样，《宪章》的另一个目的是，发展国家之间在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与自决原则基础之上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以增强普遍和平。我们认为，本组织的和平使命自其成立以来始终得到其会员国的赞同。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和平却并未实现。

我们认为，总而言之，战争的经验教训不仅仅是一连串的丧失：数百万人的生命、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遭受的一系列蹂躏之苦。渴望和平并且创设机构和建立机制力求实现和平，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消除阴谋破坏和平的各种原因。

这类对和平的危害中包括霸权和帝国主义统治及其利益、侵略行径、争夺自然资源之争、持续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战略和做法、当前排他的不公正国际秩序、不平等交换、歧视、仇外、干预主义和侵犯各国人民自决权利的行为。

正如迄今已对古巴实行了50多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那样，只要一国单方面将治外法权的措施强加给另一国，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为消除贫困、失业、饥饿、不平等现象和造成这一切的种种原因而开展声援、合作、国际援助和联合行动是预防冲突所必需的。没有和平与稳定，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存在和平与稳定。一国人民若受到饥馑、营养不良、缺乏卫生设施和饮用水、文盲、婴儿死亡率居高、预期寿命短和可预防疾病所造成死亡的严重威胁，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

只有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以及国际法，国际和平与安全才能得到维护。这些原则规定各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对任何其他国家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以及不干涉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政的事务。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应依照《联合国宪章》授予的权力履行该项职责。我们主张紧急和彻底改革这个机关，使其成为履行其任务授权的民主和有效的论坛。安全理事

会应促进和平解决办法并反对诉诸战争。这些解决办法绝不应挑起武装对抗，更不能支持政权更迭理论，因为在实践中，这与本组织的和平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关切安全理事会越来越倾向于重新诠释《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并行使不属于它的职能，僭越《宪章》赋予本组织其他主要机关特别是大会的职责。我们重申大会作为联合国最民主和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机关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和权威。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要有效力，就必须完全遵照各方同意、不偏不倚以及仅为自卫目的使用武力的原则实施这些行动。我们支持关于在和平进程各层面和各行为者之间进行统筹协调的远景规划。建设和平委员会及其外地办事处的标准在联合国系统的决策，特别是在涉及安全理事会所审议的和平与安全事项以及与委员会所审议的与某些国家有关的事项上，应当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们同意今天的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无疑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我们坚信，只要不彻底销毁危及人类生存的核武器，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继续受到威胁。古巴将继续开展本国努力，并且作为不结盟运动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其他国家集团的成员，积极促成实现彻底销毁和禁止核武器。

我借此机会回顾，9月26日，我们将首次庆祝国际核裁军日，该国际日是根据大会决定而设立的。这将是我們继续努力彻底销毁此类武器的一个重要时刻。

请允许我强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第二次峰会今天在哈瓦那举行，以巩固本区域人民的一体化意愿。拉加共同体成员致力于和平的一个证明是，拉加共同体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刚刚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为和平区；在这个和平区，将完全依照国际法，通过对话

和谈判或其他形式解决办法来和平解决各国之间的分歧。

我国代表团在这个论坛上重申古巴人民对和平的坚定承诺。在这方面，古巴革命的历史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曾经说过，人民争取自身主权和独立的斗争就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古巴争取和平的方式是反对人剥削人和捍卫本国主权。

最后，我将引用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名言，他在为人民谋取光明未来时曾经宣称：“未来即和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扎伊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约旦把这一重要议题提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并为我们今天的辩论会提出这一重要主题。

鉴于这一主题涵盖广泛各种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来探讨该主题涉及的一般和具体问题。首先，我们需要采用一般性办法审议战争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能够建立和维护永久和平。其次，我们需要重点审查安全理事会迄今如何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一般来说，只有消除滋生战争、冲突、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条件，在各级确保法治以及提高负责加强和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的效力，才能长远维护和加强和平。为此，应考虑不同局势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并且应由所有相关行为者在各级采取包容各方的办法和协调一致的政策，以应对这些局势。虽然各国负有解决全部问题的首要责任，但区域和国际组织在消除贫困，促进人权、教育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贡献也至关重要，并且将有助于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所有少数民族裔和族裔群体都作为一个统一的伊朗民族和平生活

在一起的国家。他们的权利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及其政府的充分承认。我们坚信，尊重其他宗教和族裔群体是在国内外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

关于区域问题，伊朗一直在促进本地区和平、宽容和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并且是与包括阿富汗乃至伊拉克等各邻国一道发挥这种作用。我们30多年来在伊朗接纳约300万阿富汗难民并且无论其宗教或族裔如何都满足其教育和生活需要，这是伊朗致力于促进和平、安全和宽容的良好例证。

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与本次会议有关的一句话，即：“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在此基础上，相关组织为促进和平、宽容和共处文化以及防止暴力和极端思维蔓延做出的贡献有助于推动和平事业。我们当前在中东部分地区目睹的犯罪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其根源是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心态破坏了各国之间的平稳和友好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应肯定大会采取的及时行动，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题为“构建一个反对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世界”的第68/127号决议，其基础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向大会提出的一个构想。

毫无疑问，大会应发挥重要作用，以促进和平和解决可能破坏和平的任何问题或危机的所有方面。我在此要强调的一个方面是大会在解决整个裁军问题上的作用，并提请注意大会在2013年9月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核裁军问题高级别会议方面采取的重要步骤（见A/68/PV.11）。

关于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迄今如何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我要强调指出，情况相当令人沮丧。稍看一下安理会过去68年的工作业绩，就能清楚地看到安理会辜负广大会员国期望的很多事例。在许多情况下，安理会未能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在许多事例中，政治上的考虑导致安

理会处于停顿状态，最终结果是频繁使用否决权。因此，战争蔓延开来，冲突旷日持久，侵略者和违法者为所欲为，愈加有恃无恐。同样因为上述原因，许多宝贵的生命丧失，深重的苦难蔓延开来。安理会未能解决当时的伊拉克政权悍然入侵伊朗这一问题导致长达8年的血腥战争和该政权肆无忌惮地使用化学武器，这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巴勒斯坦危机，这场危机在后世的眼前发生，持续时间长达60多年。安理会在这一情况下的失败意味着以色列政权继续占领其他国家的土地，这种局势是这场危机和中东许多其他棘手局势的核心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最基本的自决权遭到剥夺，安理会尚未作出任何努力恢复这项权利。更有甚者，尽管举世谴责，以色列政权的非法定居点建设有增无减，而安理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安理会主要负责维护和平与安全，并且可以因其过去68年的所作所为和不作为受到公正的批评，但我相信，我们需要认真看待它的组建方式及其履行职能的方式。近20年前，所有会员国对改革安理会的进程得以启动感到欢欣鼓舞，而现在，我们都对该进程面临的僵局感到气馁。

由于安理会是往昔的遗留机构，而且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安理会工作记录，我认为只有一个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新结构的透明、民主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安理会才能不辜负我们联合国人民寄予它的期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慕克吉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约旦代表团组织本次辩论会讨论“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问题并为本次辩论会散发经修订的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我们感兴趣地听取了其他代表团迄今就此问题发表的看法。

我们今天辩论会的主题与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直接相关。应当回顾，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获得一致同意之际，本组织的重点是防止“战祸”，这是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的直接提及。

今年，在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我国代表团要回顾一个事实，即，数以万计的印度士兵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后胜利献出了生命。印度致力于寻求消除战祸的持久办法，并且是1919年组建的国际联盟和1945年创建的联合国的创始国。

在我们看来，为本次辩论会编写的概念说明涉及五大问题。关于涉及国际和国内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印度的立场是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必须继续专注于国际冲突局势。作为过去60年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单一部队派遣国，我国迄今在64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43个行动中部署逾17万兵员。我们的经验表明，联合国有关会员国之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是处理会员国之间冲突的最持久方法。这也适用于2013年3月第2098（2013）号决议通过的赋予部分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和人员的强有力任务授权，以及2013年12月第2132（2013）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应对南苏丹国内冲突的对策。这两次行动中的一个得到国际上支持的政治进程将支撑由积极参与执行安全理事会任务授权的逾6 000名印度士兵所做的努力，包括保护平民的努力。

关于深化前战斗人员之间和解的第二个问题，审视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纪录也许有所助益。正如我前面的一些发言者提及的那样，对我们今天的辩论会最具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联盟的演变情况。这一情况是，过去相互交战的国家的政府走到一起，根据2010年12月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在历史上曾分崩离析、落入交战各方手中的一个大陆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现实。世界其他地区有着类似的实例，在这些地区，从前相互发生冲突的个别国家自愿和集体联合起来制定建设

性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如今，这种基于对话的建设性合作进程是支撑联合国系统的最大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反向工程历史学，尽管从理念上看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但我们认为，这一任务最好由知名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交给联合国这个政府间架构。我们每天都发现，会员国政府对与历史叙说有关的更多重要事实秘而不宣，不对公众披露，而且情况继续如此。历史记录的解密进程受制于政府的规则和程序，不是自动的。即使解密文件也往往经过大量编纂。因此，反向工程历史叙说有赖一种理想状况，也就是完全和不经编辑地披露事实，或许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正因为这一重要方面，我国代表团建议大家谨防要求联合国重新审查历史记录的任何提议。

关于第四个问题，也就是可持续和平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我们同意通过全面和公平的办法来处理会员国之间的关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变得更有可持续性。联合国有一个广泛的议程，讨论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其中包括发展的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层面。可持续发展在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概念说明中有一项提议，要求授权一支小型联合国历史顾问小组去协助建立国家档案或历史委员会。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许我们着手制订如何推进这一想法的最佳场合是大会第六委员会。我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拟议设立的任何联合国历史部门最终必须开展的工作，都必须基于一个以国际法核心原则和解读文件为基础的办法。我们认为，因此这一理念应交给我们第六委员会的同事来处理，他们通过他们的法律敏锐性和庄重态度，将最有能力以完善客观的方式处理这一理念。

最后，我要回到一开始谈的问题上，也就是安全理事会在可持续基础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确实预防战祸方面的作用问题。我们认为，就联合国而言，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预防冲突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不是了解历史进程，而是认识到，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全球治理平台，即安全理事会已不再反映当代现实。安全理事会需要全面改革其成员组成，扩大常任和非常任两个类别的成员。这对安理会的公信力和国际社会对这个机构的持续信心来说至关重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代表发言。

哈尼夫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倡议召开本次重要和有深远影响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讨论“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这一主题。我国代表团也赞赏你准备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发人深省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我也要感谢杰弗里·费尔特曼副秘书长所做的通报。

我要首先指出，马来西亚致力于做支持和平国际努力中的积极和有力伙伴。我们幸运地在1957年通过和平过渡取得独立，使我们对通过《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手段来和平解决冲突坚信不疑。在我们自己独立不到三年后，从遥远的刚果丛林，到联合国和北约旗帜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寒冬，再到我们的近邻东帝汶，马来西亚维和人员自豪地受托参与了这些维和行动以及许多其它多边维和行动。

从区域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始终有兴趣通过全面办法应对区域安全威胁，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背景下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一直积极促进和平会谈和建设性接触，最终实现了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例如，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于2012年10月15日达成的历史性框架协议。四天前，双方在吉隆坡举行了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签署了该协定的最后附件部分，为该地区实现永久

和平铺平了道路。马来西亚努力促进这些重要谈判，得到了秘书长、美国、欧洲联盟以及国际接触小组成员的认可和赞扬。

马来西亚还于2013年11月11日至12日，在普特拉贾亚主办了首届亚洲和平与和解委员会会议。正如马来西亚总理拿督斯里穆罕默德·纳吉布·宾·敦·哈吉·阿卜杜尔·拉扎克在该论坛的主旨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当无所畏惧地利用劝说的力量，以便抵制极端分子发出的有误导性的号召”。马来西亚最高领导层对温和主义作出承诺，突出表明我们坚信，迫切需要共同的表述来解决冲突中看法各不相同的问题。

主席先生，关于你有关冲突反向工程分析的提议，马来西亚重申，我们长期以来认为，必须解决此类冲突的根源问题，无论它们是不发达、贫困、政治争端，还是维护国家、社会文化以及族裔宗教特征。基于我们的经验，我们因此同意，商定的或共同的表述可以减弱造成冲突的理由，特别是宣扬极端主义或排他主义看法者推动的哪些理由。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在起诉对此类冲突负有责任的人时，必须继续以国际法原则为指导。

关于授权一支联合国历史顾问小组去搜集或保护与共同历史表述有关的文件这一具体建议，我国代表团要提出以下看法，以供参考。

我们认为，此类团队在实地的参与原则上应取决于东道国是否提出请求或者是否同意。马来西亚已经说过，国家建设方案和政府改革不能由外部实体来强加，相反，此类努力必须具有包容性，有强有力的国家自主权，并且具有引领变革的合法授权。但是，如果东道国本身是冲突的交战一方，这自然构成挑战，因为，东道国坚持自己对事件的表述符合它的利益。

此外，在试图采取这一步骤时，我们在界定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能力时应加以小心。如果历史顾问小组的目标有政治动机，而不是作为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机构开展工作，联合国的利益有可能遭到损

害。此外，我国代表团担心，这一进程有可能缺少透明度。

尽管如此，整理出共同的对冲突的历史表述这一重要工作应当继续。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历史正义与和解协会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机构大大得益于主席先生你本人的参与。这个机构的出版物——《聚焦放大：1948年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忆和纪念》——描绘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青年对1948年“大灾难”照片的看法极其不同。这份出版物表明，必须促进对这一后果直至今天都能感觉得到的事件的认识，并且形成共同的历史。

我们认识到，实现永久和平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我们还注意到，目前或许没有充分的定量数据来评估没有把和解性表述需求作为优先事项的风险。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防止冲突的死灰复燃是处理冲突后局势的最困难的一个方面。在联合国系统内，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从资金缺口到缺乏机构性支助等一系列挑战。尽管如此，也许在联合国系统内部能够找到永久和平的潜力，并且我们认为，能够通过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找到这种潜力。

马来西亚继续认为，尤其鉴于维持和平同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增加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互动，获得了巨大好处。在维持和平期间建立国家机构，将对向建设和平阶段成功地过渡，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不同本国政府和当地利益攸关方进行密切和有效的合作，以确保建立可持续的机构性架构，有关国家就有可能恢复动乱。也许正是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够发挥更大作用，除其他外，使冲突各方达成共同的历史性谅解。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更好的连接性和互动，以加强在制定建设和平切实政策方面的进一步工作。我国代表团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它是受权协调和综合冲突后建设和平措施的方法、帮助各国避免恢

复冲突的政府间咨询机构。因此，应当加强和增进联合国的主要机构，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建设和平事项上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的作用。

最后，马来西亚重申其立场，沉默的大多数应当发表意见，以便盖过极端的仇恨、恐惧和无知的声音。一个共同的历史叙说，是温和派防止极端分子主导一场冲突中的政治对话的几种方法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继续支持能够在维护永久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现有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先生，为此目的，我谨向你保证，马来西亚继续支持在冲突后局势中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以及重建国家的举措。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纳米比亚代表发言。

纳安达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再次就贵国担任2014年1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谨进一步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审议世界各地每天犯下的滔天罪行，它们对我们国际社会多年来建立的社会民主秩序构成了威胁，这次辩论谋求通过了解战争来吸取教训，以求实现持久和可持续的和平。

我也谨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就联合国促进可持续和平的作用，特别是冲突后局势中的经验教训和存在的挑战，所作的翔实的通报。

纳米比亚国家是经过痛苦的解放斗争之后在1990年成立的，我国人民在解放斗争期间遭到无数次屠杀。因此，我们的历史中充满了有系统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获得了独立。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被认为是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成功故事之一。《纳米比亚宪法》第九十六条要求我国及其人民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原因，纳米比亚参加了安理会授权的世界各地的各种维持和平特派团。

正如已经发言的许多代表团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普遍认识到，联合国不仅在刚解决冲突之后，而且也在制定和执行冲突后长期倡议时，可发挥主要作用。其中包括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从而加强司法制度，以及在我国的情况中，还有培训公务员在过渡时期和冲突后时期提供服务。因此，除了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之外，必须制定民主、发展和加强法治的道路。

我们认为，应当更加关注联合国在冲突后和解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欢迎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等机构，它们能够大大帮助解决因行为体的多样性所造成的全国和解方面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没有一个适用于在国家一级实现和解的单一模式。因此，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进行全国和解将适得其反。由于特定局势的本国动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区域动态，在某个局势中有效的做法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局势。例如，在纳米比亚，我们在独立时通过了一项全国和解政策，对双方实行全面大赦。这项政策对我们很有助益，使我国享有和平、稳定和民主。

体认到当代的说法，即没有正义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和解的重点已转向受害者和惩罚性司法。我们也许还不得不同意，在毫不妥协地追求更高的司法标准时，微妙的和平也许是难以持久的。这恰恰就是我们在南部非洲地区以及还有非洲大陆许多其他地区的经验。我们的挑战就是让前战斗人员重返主流社会，同时为受害者带来一种正义感并捍卫法治原则，但避免引起破坏稳定的反弹，尤其是在政治稳定岌岌可危的局势中。因此，我们的经验是，必须作出妥协，并且必须在恢复性司法同惩罚性司法以及实行大赦之间达成平衡。

妇女在预防冲突和冲突后和平建设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纳米比亚完全支持让妇女参加安全系统，例如武装部队、警察以及维持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团，以支持承认这一重要作用的各项联合国决议。我们仍然相信，为了实现全面和可持续的和平，应当作出一切努力，确保妇女的参加及在

和平谈判中和执行各项冲突后的战略和方案期间作出贡献。

此外，我们欢迎大会通过《武器贸易条约》，这是明确包含武器转让方面的性别标准的第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即如果这种转让的武器可能被用来对妇女与儿童犯下暴力行径。

最后，我谨确认安理会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的机构性伙伴关系。例如在非洲，我们对违宪更改政府采取了零容忍政策。政变领导人被孤立起来，他们的国家立即被非洲联盟中止成员资格。

同样，非洲提供了以不符合宪法的方式变更政府这一行为的明确定义，其中包括操作选举法。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联合国致力于采取同样的原则。在次区域层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涉及马达加斯加时严格遵守了这一原则。

尽管捍卫了反对以不符合宪法的方式变更政府这一行为的政策，但在军队哗变成为被事实证明不可持续的所谓包容性政府的一部分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以不符合宪法的方式变更政府的行为。纳米比亚认为，如果让这一情况继续下去，那么非洲联盟对以不符合宪法的方式变更政府这一行为的零容忍政策就会受到损害。应当抑制这一倾向，并且应当探索更可持续的举措。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越南代表发言。

黎怀忠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和约旦代表团在担任2014年1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赞扬你倡议就“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这一专题举行今天的辩论会。这一专题涉及联合国集体工作的总体宗旨。

战争与和平在历史上始终是人类的首要关切，而在今天，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其他冲突的灾难性后果，情况尤其如此。正是战争造成的毁灭将

国际社会聚集在一起，作出前所未有的集体努力，以便如《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那样“免后世再遭……战祸”并促进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事实证明，联合国自近七十年前成立以来，在防止可能会灾难性地全部摧毁人类文明的另一次世界大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一直在世界各地辛勤工作，以缓解冲突、找到其解决办法和处理其后果。然而，冲突，不论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家内部的冲突，仍在给数百万条生命以及太多国家的发展造成浩劫。因此，至关重要是，我们应反思在某些地方是什么产生了此类可悲后果，在其他地方是什么防止了此类可悲后果，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为所有人建立持久和平。我国代表团要谈谈若干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历史表明，战争和冲突往往源自过时的强权政治理论、进行统治和强加于人的野心以及在解决国际争端——包括与领土和管辖要求有关的争端——方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行为。

第二，历史还表明，好战势力最终会遇到挫折，不论它们最初可能集聚多大的力量。各国对其独立、主权以及其它宝贵、合法权利的向往是巨大力量的来源。

然而，第三，战争和冲突一旦爆发，就给人类造成巨大痛苦，并给直接参与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生活的许多方面带来严重后果，在今天高度联系的世界尤其如此。不幸的是，其中若干战争和冲突与历史遗留问题、误会、误解以及意外事件有关联。

今天，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有更多和更好的手段来预防冲突和战争。我们必须建立、加强和充分利用和平机构，包括发展国际法、国际和区域组织与机制，以便为对话、建立信任与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便利。

我们必须谴责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并促进和平解决争端与和平文化。我们认为，这些是联合国较之于国际联盟的最明显进

步，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主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协助战争和冲突结束后国家进行重建和实现和解、处理冲突根源和确保持久和平。

由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应当不断促进巩固和平和预防战争及冲突的专题和措施。这要求安全理事会作出始终一贯的努力，以便找到和平解决持续不断的国际争端和冲突的办法，并要求坚定不移地寻求有利于促进和平的措施。在这方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别责任。

越南曾经被迫经历战争以捍卫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亲身了解战争和冲突的后果。因此，越南对追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深有同感。正如我国总理阮晋勇先生阁下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面前讲话时所强调的那样（见A/68/PV.16），现在亟需通过具体和建设性的行为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立并加强战略信任。只有在这种充满战略信任的环境中，每个国家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世界才会享有更好的安全环境，战争的经验教训才会得到充分借鉴。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穆萨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约旦哈希姆王国担任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有效履行主席职能。我们还感谢约旦代表团就这样一个重要议题组织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

主席所编写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提出一个颇具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有人刻意虚构历史，特别是历史上造成最严重创伤的事件，或者将过去用作武器，以便灌输敌对和仇恨，煽动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因此，一代又一代人生来就陷于深刻的仇恨和不容忍意识中。但历史的作用或说教授历史的方式也可促进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文化，接受差异，培养共处能力。

在若干局势中，所作重要努力有助于减少紧张，并确保和平与和解进程向前推进。同时，应当作出更多努力，以应对重大威胁和挑战。这些威胁和挑战继续影响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因素，损害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稳定，并助长藐视和蔑视人权的行为。

应当更好地理解，那些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损害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以及藐视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国家，只有立即停止它们的非法行为并秉持诚意谈判永久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前景，才能阻止强制执行性质的反制措施。非法情况因为政治情势而继续，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情况因此变得合法或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必须强调法治在预防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后减轻冲突的影响，以及解决冲突，从而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方面的作用。现有种种挑战和寻求可持续和平的努力中有一个内在的要素，那就是务必要追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责任，不论其是个人或冲突方。

实践证明，对犯下的罪行不加惩治或者不予承认，会阻挠期待已久的和平与和解的实现，而且容易引发新的冲突和犯下新的罪行。查明冲突期间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的真相并采取体制行动以防止这种违法行为再度发生，是真正解决冲突的必要前提。

必须采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处理与冲突有关的违法行为，除其他外，包括设立司法机制和授权国际调查委员会或实况调查团彻底查明有争议的情况。必须建立和记录真相，切实揭露事实，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方面工作必须排除选择性和有政治动机的做法。

显然，不能达成有违国际法，特别各种强制性规范，如禁止使用武力和必须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强制性规范的和平解决方案。重要的是，不能利用解决冲突的框架以巩固先前存在的非法和基

于既成事实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强行实施或鼓励采用这种解决方案，将无法为持久和平与长期稳定提供必要的基础。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西格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众所周知有一种说法，即“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如若如此，可以合理推断，战后恢复秩序的首要任务理应是恢复真相。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意见四分五裂、充满不同历史表述的冲突后环境下，何以构成真相？暴力和暴行留下的悲惨后果不仅是造成不可估量的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也践踏人类良知，诚如《世界人权宣言》序言所述。如不采取行动克服冲突遗患，会对后代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我们负有道德责任，必须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制定战略落实过渡司法，正视历史，以便踏上通往真相的道路。

国际社会在制定规范方面已经取得可观进展，可确保受害者有权了解真相，诉诸司法，获得赔偿，并且杜绝再犯。这四个要素相结合，提高了追究肇事者责任和解决受害者需求工作的力度。尤其是杜绝再犯，如通过机构改革杜绝再犯，为实现共存与和解铺平了道路。经验表明，和解是一项长期努力，需要做大量工作，包括记忆。换言之，确保可持续和平需要纠正过去的怨恨。瑞士肯定并支持各国政府作出努力，勇敢地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并设法制定本国战略，解决历史问题。我们也赞扬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杜绝再犯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关于叙利亚和目前仍在进行的其他所有冲突，寻求持久和平必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防止进一步暴行，必须重新建立制度，使人人均承担其责任，实行问责。因此，关于真相和历史记忆问题，我们坚决支持设立实况调查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我们还要指出，一年前根据瑞士倡议，近60个国家

正式请求安理会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随着暴行蔓延，真相、司法及赔偿和机构改革已经变得更加重要。这方面措施对于任何持久和平都至关重要。

按照安理会主席国约旦提出的关于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可采取措施的切实建议，我谨提及瑞士已经采取的一些努力。几年前，瑞士发起了一个项目，目的在于保护和保存有关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档案。该项目应邀向有关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协助他们保护和建立有助于查明事实和保护历史记忆的档案和数据库。例如，通过双边协议，瑞士现在存有危地马拉国家警察档案的备用拷贝。瑞士也采取具体举措，传播实况调查和调查委员会的优良做法。去年11月，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会上高级专员首次介绍其指导方针。

最后，瑞士谨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致力于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促进必要预防措施的承诺。若要确保持久和平与安全，采用预防武装冲突的战略胜于应对暴力冲突。

最后，我谨脱稿提出一点个人意见。主席先生，当我读到你所建议的今天讨论的标题时，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他是在看到一家客栈招牌时产生写一个关于“永久和平”的小册子的想法的，这个招牌上简单地写着“永远安息”四个字。我发现有趣的是，这家客栈招牌显示，这里原来是一个墓地，表明我们只有在人生结束后才能找到永久和平。我真心希望，今天这场辩论将有助于确保世人不仅在去世之后，而且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永久和平。我很高兴，这次辩论将作出这般重要的贡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朗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召集这次有关这

一关键主题的极其重要的会议。我还要强调，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上世纪世界和平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曾说，“让我们努力找到团结而不是分裂的因素”。这一简洁有力的句子为我们探求永久和平与安全这一联合国的核心工作提供了指导。通过七十年对这一目标的努力追寻，通过种种试验和失败，我们已经认识到，永久和平难以实现，但却不是无法实现。

永久和平必须有谨慎周密地奠定而成的坚实基础。和平不仅是签署条约。和平不能强加于人。和平只能来自于有关各方的相互谅解，来自于他们对团结因素的认可。

这只是出发点，是持久和平的前提。这就是我们从莫桑比克经验中学到的。莫桑比克成功而依然有效的和平协议于1992年10月在罗马签署。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把这一和平进程称为“意大利模式”——在冲突各方之间耐心地进行和解，由一个行为体联盟负责设计安排。这个行为体联盟包括意大利政府、意大利反对党、一个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天主教会，当然还有那次危机中莫桑比克的所有行为体。

一旦签署了协议，达成了停火，为了和平能持久，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尊重人权是最重要的，为社会和经济发展设置条件也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是本组织当前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星期，意大利常驻代表团荣幸地在总部共同主办了一次活动，纪念马丁·路德·金日。这次活动以不断加大的不平等所构成的威胁为主题。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次活动中警告我们当心经济不平等的危险，这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在我们思考如何取得永久平时，这一问题必须成为思考的关键部分，也必须是我们国家间合作的基本要素。太富的人和太穷的人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这是世界不稳定的来源之一。我们要牢记

这一点，并雄心勃勃地追寻永久和平，探求国际发展的新议程。

联合国通过维持和平行动部进行着卓越而艰难的、而且经常被人误解的工作。意大利完全支持这一工作。本组织经常因为世界上的冲突遭到指责，但任何一个俱乐部的作用都不可能超越其成员的集体力量。联合国只能设法处理其会员国制造的麻烦。如果本组织缺乏必要的工具和构架，就会特别难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意大利支持期待已久的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原因。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改革要有效，就必须遵从一套有约束力的原则，也就是包容性、代表性和问责制。改革必须提高安理会的灵活性，增加安理会与一般会员国的互动。一般会员国应该把安理会视为可靠的而不是排外的俱乐部。

归根到底，联合国是要实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一目标反映在我们工作的每一个方面，必须成为我们的准则和夙愿，体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中。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莫桑比克经验。我们从中学到的，对当今世界更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是：和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平不仅应该得到保护，还必须成长，成为人权、经济发展、稳定生活、民主体制、安全和法治的保障。就像过去一样，我们现在必须找出团结的因素。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范·乌斯特罗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感谢主席先生组织了这次重要的辩论。荷兰赞同先前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1992年，当我从工作地点大马士革到贝鲁特访问，亲眼看到了战争的可怕后果。我看到一个城市被摧毁，我看到人民生活遭到破坏。当时，我认识到了战争带来的关键教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战争，寻求和平是共同的道义责任。

现在我将谈谈预防、问责制与和解问题。

就预防而言，加强国际法律秩序至关重要。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法律秩序降低了冲突的机率，对和平解决冲突至关重要。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意思，并提供了具体的选择。令人鼓舞的是，这些和平解决机制使用得越来越频繁。我举两个例子。

荷兰坚决支持联合国在调解领域发挥全球行为体的作用，包括为政治事务部提供大量资金，杰夫·费尔特曼今天上午重点提到了这一点。

就冲突的司法解决而言，坐落于和平宫的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是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和平的全球性标志。我们去年庆祝和平宫一百周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海牙已经被称为世界法律之都。

预防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冲突的早期预警。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权利在先”行动计划中联合国的倡议，这个行动计划与保护的责任这一重要概念密切相连，我们全力予以支持。联合国已经清楚表明和平、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违反人权现象是潜在冲突的早期预警信号，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相应行动。我们认为（我要重复新西兰同事的说法）：安理会成员国与非安理会成员国之间应该有更好的互动，这方面还有改善的余地。

我在此附和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的说法，冲突发生时，联合国必须确保能做出报告，我们要有人能胜任实地的人权工作和政治方面的工作。

主席先生，正如你在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中提到的，联合国做出准确的报告对于追究责任与和解至关重要。我还想重申，追究责任是长期和解与和平的条件。大规模暴行和国际犯罪行为绝不应该不受惩罚，不管肇事者是谁。正如我国蒂莫斯部长在庆祝国际刑事法院十周年时所清楚表明，预防、保护和起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起诉还具有至关重要的预防效果。

主席先生，如你所言，冲突的表述对和解和消除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在冲突之时和冲突之后保存客观的数据和证明至关重要。荷兰通过主办叙利亚司法和问责中心并为其供资，在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正在这么做。

保存国际法庭的记录同样重要，这可以作为参照点，认识到过去错误行为的根源和未来和解的出发点。荷兰国家档案馆存放着纽伦堡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文件。

正如纳米比亚的同事所说，在冲突的所有阶段，无论是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都需要特别关注妇女在其中的地位。妇女对于防止冲突、在冲突中起保护作用、以及冲突后的和解都至关重要。因此，最近几个月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妇女署密切合作，邀请一批叙利亚妇女访问日内瓦和纽约。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接待了她们。

最后我谨提醒所有人，持久和平的工具是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有效使用这些工具。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巴鲁赫·斯宾诺莎睿智的话语的指引。他说，“和平不是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而是一种美德，一种心灵的状态，一种仁慈、信任和正义的禀性。”

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带来和平、正义和发展的世界。成为这一事业的伙伴方是荷兰王国的夙愿。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鲁日齐卡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欢迎及时倡议将本次专题辩论会用来专门讨论这样一个敏感、复杂、常常是痛苦但却是极为重要的议题。

请允许我首先谈谈一些事实和问题。几项估测表明，在人类有记载的3400年历史中，只有250年是和平的——这些还算是乐观的估测。20世纪是有记载的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世纪。战争导致的或与

战争有关的死亡总数据估为1.87亿人，相当于1913年世界人口的10%还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年和二战结束70年后，我们地球如今更安全了吗？

我们单在2013年用于人道主义救济的资金就超过134亿美元，预计今年也将拨出大约同等数额的资金。我们难道没有为我们在冲突后地区建设可持续社会和和平的工作中所采取的不一致做法付出代价吗？

战争就像雪崩，一旦达到全速，一路下来无物可挡，留下的只有毁灭、死亡和苦难。但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不是关注导致雪崩的雪花，而是努力学会如何加以预防和驯服，并在其留下的废墟上建设更美好、更持久的和平。

要想寻找未来的答案，我们就应当拿出直视历史的勇气。这或许是最困难的事情——如何处理历史的不公，同时不要在现在和将来造成新的不公。我们必须拿出勇气，正视战争的残暴性及其后果。我们不能逃避这些问题。

有人说时间会解决历史上的一切不公正行为。但同样，治疗伤口或许比较快，但治愈却需要处理人们记忆和心中的伤口，而这一点则要难得多。和解可能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而且可能始终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如果不追究个人的责任，就不会实现和解。

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战争与和平》表明，历史的动力归根结底不是领袖的戏剧性举动和姿态，而是不太重要的人物采取的大量微小行动所形成的复杂合力。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谈谈三点看法。第一，和解是强大而非软弱的标志。法国与德国的和解——欧洲国家认识到战争不再可以是推行政策的工具——带来了更长久、更持续和平的视角，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范龙佩说过，欧洲人不希望世界任何地区的其他人任何人非要经历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

的创伤，才能够得出和平共处是最佳选择的结论。当然，没有欧洲联盟，欧洲可能也会实现和平——可能是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但到来的和平不会是同样的质量——持久的和平，而非冷冰冰的停火。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区域合作和睦邻关系是稳定的基石。欧洲合作项目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并不一定是一种全球模式，但它有效运作了50多年。这表明只有实现区域稳定与合作，只有邻国希望并能够在不带偏见的情况下共处及合作，只有它们能够齐心协力维护共同利益并一起应对挑战，国家安全才能够得以持续。没有这些基础，进展就不可能得以持续。

第三，我要谈谈使人们得以享有尊严和自由的个人安全问题。当人们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在生活中宽容相待、能够接受教育并开展经济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不愿意挑起冲突，因为这可能会使其失去所有这些自由。

要在冲突后地区建设可持续的未来与和平，我们就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制定全面做法。斯洛伐克几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安全部门改革的需要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经历过战争的冲突后国家。安全部门改革的概念相当复杂，并不局限于安全领域在冲突后实现稳定这一传统认识。它也是一项应由国家自主、主导的政治工作。基础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包容和公正，将确保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安全部门改革应当突破狭隘的简单化定义，体现联合国数十年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所获取的经验和教训。

主要目标是确立安全问题所涉及的四个层面，即公民、法律、社会和经济层面。我们如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大大降低重陷冲突的风险。

每个人都生而自由，拥有自己的尊严，并应当享有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所以，我们不仅应当使正在打仗的人放下武器，而且应当通过确保稳

定、安全、教育和可持续和平，使其有望过上体面的生活。

如果不在联合国这样做，我们还能够在哪里这样做？

最后，的确，我们必须汲取历史教训，我们必须了解冲突根源，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分歧。我们要想应对21世纪的挑战，证明我们的文明能够善待自身和我们的地球——我们唯一的地球——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发言。

卡马乌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召开这个重要的辩论会。看到你主持本次会议，我十分高兴。本次辩论会对于安全理事会具有重要意义，安理会本身就是世界大战的产物。

主席先生，你邀请会员国思考战争的深层次原因并寻求建立永久和平。在以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和环境匮乏以及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紧张为特点的不断变化的国际体系下，这个辩论会尤为及时。这些挑战表明有可能出现更加复杂的跨国冲突，要求我们转变模式，放弃传统的缓和冲突的模式和预防战争的工具。

联合国成立70年来，本组织一大部分预算仍用于维持和平行动。尽管存在着很多更加迫切的人类发展需要，但局部战争还是造成了这种情况。回顾现代史，我们看到从跨大西洋贩卖奴隶的黑暗年代起，战争就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不散的幽灵和特征。跨大西洋贩卖奴隶本身导致了一场内战，并因为殖民主义的关系，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唯一的区别在于各种战争的近因、性质和烈度。但一条共同的主线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发生冲突，是因为结构性不平等和社会分裂，其中一些具有历史、宗教、文化、社会政治或经济性质，包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是对于过去冲突的记忆。

在外交官、民间社会行为体和政治家勉力调解和解决冲突并开展建设和平工作的同时，学者们也努力在制定关于战争起因和预防战争问题的更完善以及或许是更有用的理论方面取得进展。然而，人类社会冲突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原因依然存在。今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所使用的现代化手段，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使得人人——无论是富国的公民，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都可以清楚看到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现象和侵权行为。这常常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紧张局面。

国际体系及其机构的特点表现为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有时使冲突旷日持久或导致冲突，而非促进一种可孕育和平的公正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状况。仅举数例，从安全理事会到世界贸易组织到布雷顿森林机构，其政策和结构无不偏向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及它们支持的利益。由于国际体系中的不平衡状况，这种国家内和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大幅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07年年度报告中确认，全球化进程管理不善与世界上存在严重不平等，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然而，在改革方面却没有太多作为，世界不断陷入一个又一个经济危机，战争的阴影无时不在。

在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中，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多边体系中一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伸张正义必须成为寻求永久和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暴力和战争复发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内和国际上长期存在有罪不罚现象，并且缺少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但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要充分发挥其推进持久和平的潜能，就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在解决国家和国民内部以及其彼此之间冲突的范畴内，惩戒性司法的执行和恢复性司法的执行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第二，必须深入思考世界各地司法和文化体系与做法的多种多样性。不能偏向某些体系与做法，

同时却忽视或规避另一些体系与做法，也不得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第三，必须公正、透明和公平地使世界各国和人民作为受益者和行为体参与其中。

一个姑息有罪不罚现象的世界将永远实现不了持久和平，而一个操纵司法和司法机构，促成偏袒大国进而损害永久和平的结果的世界也同样不会有持久和平。

非洲仍是许多全球热点的所在地，驻留着众多处理这些问题的维和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大陆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包括机构薄弱和治理不善。大湖区和非洲之角区域是当前该大陆密集战火的中心地带，那里有着丰富的矿物和自然资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发生了一些最棘手的、可追溯至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的战争。我真诚希望，今天的辩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冲突的根源和战争、机构薄弱状况以及丰富矿产和自然资源这三者之间的关联。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肯尼亚的经验，我认为，特别是那些努力在冲突后巩固和平的国家可从中吸取教训。2013年3月，肯尼亚举行了和平、公正和自由的选举，令许多曾预测2007年暴力会重演的权威人士大为不解。2008年至2013年，肯尼亚政府在肯尼亚人民、民间社会、媒体以及国际伙伴的支持下，着手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宪政和机构改革，导致于2010年颁布了一部新的变革性《宪法》。实行改革的机构包括司法部门、选举委员会和全国警务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肯尼亚真相、司法与和解委员会和民族团结与融合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以帮助治愈国家创伤，强化社会结构。

肯尼亚的例子表明，凭借充足资源和国际支持，在改革早期着力实施巩固机构、加强法治和打击仇恨言论等非胁迫性措施，如何能够帮助防止暴行发生。次区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协助各国巩固和平及实现经济恢复方面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区域机构是国际体系寻求永久和平方面的立足点。这

就说明了非洲许多国家所支持的建设和平工作中这样一个信条：各种举措必须由国家主导，立足相关区域，并得到国际上的支持。

如果不侧重于导致冲突的内在威胁，对战争起因和寻求永久和平的反思将是不完整的。正如我先前提过的那样，冷战以来，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关切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各国依然关切传统意义上的威胁，如它国的军事敌对，今天，我们安全所面临各种威胁的彼此关联性强得多。跨国安全威胁对政治稳定构成的威胁超过了国家一级的传统军事威胁。近来，跨国安全威胁给国家和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此外，在寻求永久和平的过程中，国际社会还应侧重于促进冲突后社会实现稳定，推进重建与发展，同时应对那些常常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甚明显的跨国挑战。安全和不安全的格局错综复杂，旨在加强安全的分析及政策必须立足于各国的国内外现状。在分析跨国安全威胁方面，首要挑战是确定其中哪些是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最严重威胁。

最后，我愿表示，为更好地寻求永久和平，我们认识到，今天的威胁彼此关联，必须在全球一级联合加以处理。必须从改革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那些负责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那些为促进公正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同时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而成立的国际机构开始，这些改革早有必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克韦拉什韦利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主席国约旦哈希姆王国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和编写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它使我们对联合国在有效和解及巩固和平方面的经验有所了解。

今天，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联合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还应更多反思不足，因为它们是需要吸取的真正的教训。每一场特定战争都有其自身的特

点，没有一刀切的解决办法。尽管如此，它们确实具有一些共性，我们需加以识别、分析并在我们的做法中加以采纳。

为此，我要首先向安理会讲述我国格鲁吉亚境内冲突方面的经验。2008年，我国遭到入侵，导致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一波又一波地出现，人数总计达40多万，那场大规模战争之后，我国领土有20%遭到占领。2008年8月经欧洲联盟调解达成的停火协定至今仍未得到执行，国际监察员也未能获许进入被占领的领土，因此，那里因战争而分裂的社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和自由。

自2013年1月以来，俄罗斯占领军开始在我国茨欣瓦利地区沿占领线大规模设置铁丝网和护栏。截至目前，茨欣瓦利占领线沿线的铁丝网总长度已达50公里，铺设进程目前仍在继续。最近，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举行之际，俄罗斯联邦违反国际法以及2008年8月停火协定的规定，扩大了所谓的安全区，朝着作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边界的普苏河以南的格鲁吉亚主权领土又推进了11公里。通过宣扬所谓的阿布哈兹独立地位，奥运会被进一步政治化，俄罗斯交通主管部门向500部“阿布哈兹”车辆发放了许可证，由此暗示这个被占领的格鲁吉亚地区的独立地位。

我不想进一步详谈有关先前提到的问题的一系列事件，请允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从我们的经验中汲取到的一些经验教训。首先，维和人员保持不偏不倚是解决像我们这样的冲突的关键。就格鲁吉亚的情况而言，15年来，维和职能由一个不仅在使冲突长期持续方面有既得利益，而且事实上也是冲突一方的国家来履行。最后，这导致了荒谬的事态发展，当时，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后，联合国在最需要它的存在时弃受冲突影响地区而不顾。2009年春季，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对延长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的任务期限投了否决权，尽管事实上东道国格鲁吉亚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要求延长任期。这样，在2009年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危险先例——一个有15年历史的特派团由于仅仅一个安全理事会

成员的否决而被终止。今天，几年过去之后，我们看到存在着一种空白，没有任何人被允许去监督侵犯人权行为。我们认为，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我们所有人开始更广泛地讨论对受冲突影响地区行使否决权是否适当这个问题，以便在今后避免出现像格鲁吉亚这样的情况。

第二，请允许我强调有效谈判形式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广大国际社会在用了十多年时间和经过一场全面战争后才参与进来，建立可借助诚实调解达成协议的真正国际谈判形式。今天，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正在参与由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欧洲联盟协调的日内瓦国际会谈。如果早就存在这样一个机制，战争本来可以避免。继续进行这些谈判，并维持各运作机制，对创造一个有利于长期解决冲突的环境来说至关重要。

第三，我要强调指出，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及时参与至关重要。应当在所有各级制订一系列相关工具，以便在预防冲突和危机管理预警机制被触发时，作出应对。及时利用和实行此类机制，能大大促进和平进程。

上述意见是国际社会从我们这个情况中可以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充分认识到，长期冲突解决办法是一个全面进程，需要各方拿出政治意愿并作出坚定努力。格鲁吉亚仍然致力于这一目标。显然，我们都需要加倍努力，以便支持在我们力求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安全时能指导我们的最佳做法。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欢迎约旦关于授权组建一个联合国历史顾问小组的倡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梅本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选择这一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基本方面的议题。这个议题还激发了我们的知识和学术好奇心。

目前叙利亚、南苏丹以及中非共和国的局势清楚表明，民族和解对实现永久和平至关重要。正如上述局势所表明的那样，各个国家的实地情况不尽相同，需要深刻了解各个局势的具体特点，以便我们能在个案基础上进行审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

当今世界的现实表明，和解并非易事。因此，我认为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不切实际。在处理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时，我们需要所有会员国集思广议，而只有15个成员的安全理事会或许不是最佳场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能够为建设一个鼓励和解的环境做的务实和具体工作应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参与。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始终走在一个爱好和平国家的道路上。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日本给许多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破坏和苦难。日本政府直面这些历史事实，在国内和国外都表示了深深的悔意和对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真诚哀悼，并且表示了发自内心的道歉。本届内阁坚持过去历届政府列述的全部立场。

和平、民主和人权是日本人民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继续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将永远不会改变这一道路。2013年12月的内阁决定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了这一点。因此，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涉及日本和邻国的具体问题在最近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上被提了出来。日本认为，此类行动无助于缓和紧张事态，也无助于加强我们区域的稳定。尽管日本怀疑安全理事会是否是处理这些具体问题的最恰当论坛，但请允许我澄清我们对某些代表团今天提出的三个问题的立场。

首先，关于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约250万人的灵位，这些人为了他们的国家献出了生命，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国内动荡和自1853年以来的其它战争，与他们的军衔、社会地位和国籍无

关。安倍首相在第一次参拜神社时发表了题为“对持久和平的承诺”的讲话，他指出，他参拜的目的是再次保证日本永远不再发动战争。这绝不是祭奠甲级战犯或赞美军国主义。

第二，想到那些经历过无法估量的痛苦和折磨的慰安妇，我们深感悲痛。日本已在各种场合向所有这些妇女表达诚挚的歉意和悔恨。我们在1990年代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向前慰安妇表示赎罪。目前，日本的立场是，这个问题不应政治化或成为一个外交问题。在整个历史上，在过去的许多战争期间，妇女的尊严和基本人权经常遭到侵犯。日本政府最为重视妇女的尊严和基本人权，保证竭尽全力确保在第21世纪不再发生这种侵权行为。

第三，日本最近仅仅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修改了对初中和高中学习课程的解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也认为理所当然要向自己的儿童教授本国的领土。

日本通过具体行动表明了其对战争的忏悔。日本希望同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大韩民国，建立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安倍首相表示，他希望在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同中国和大韩民国的友谊，他还大力欢迎同中国和大韩民国领导人开展直接对话。

作为一个捍卫自由、民主、尊重基本权利及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国家，日本积极支持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家的民主与全国和解的努力。这种行动之一就是日本对缅甸的民主化、和解与经济发展的支持。另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斯里兰卡，日本在那里积极参与全国和解和建立持久和平。

另一个项目就是在2006年7月发起的叫作“和平与繁荣走廊”的倡议。这项倡议的目的是通过与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开展合作，促进约旦河谷的经济发展，从而帮助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经济。此外，在最近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期间，日本宣布计划提供总共1.2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改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

这些是日本最近为支持民主化和全国和解而采取的具体行动。日本将继续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作为积极促进和平的国家，在国际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在我发言的最后，请允许我引述南非共和国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话。马迪巴表示，和解指的是与你的敌人一起工作。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当为这种和解铺平道路。日本随时准备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一道，为这种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沙尔科维齐兹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同其他代表团一道祝贺约旦担任安理会1月份主席，并感谢它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不过，我还要提出以下评论。

现在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认为自冷战结束之后，冲突的性质已经改变；但是，让我们暂时抛开战略和政治分析，而明确指出一点——战争，无论发起战争的原因为何，它始终带来死亡、痛苦、恐惧以及对人类能否永远正真消除罪恶的怀疑。这就是平民的观点和战争的主要教训——我们外交官以及对我们各国决策进程具有影响的人物绝不当忘记这个教训。

20世纪对我国并不仁慈。波兰遭受了世界大战和两个极权政权——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确实是非常悲惨和痛苦的。我们丧失了数百万公民和我们的自由。随后的几代波兰人经历了贫困和衰退，并被剥夺了人权和公民自由。

我们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才终于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25年前，中欧和东欧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过渡从我国开始。执政党同反对派之间的圆桌会谈导致举行了选举，使我们能够组建第一个民主

政府。这触发了整个区域的变革，包括柏林墙的倒塌。波兰证明，能够通过非暴力的政治手段实现这种戏剧化和巨大的变革。

1989年的民主发展也推动了我们一些邻国的和解进程。我们认为，从前的敌人能够成为朋友，并且能够克服分歧。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热情，许多代人前仆后继，但我们成功了。波兰和德国通过细小的步骤和深入的对话，在过去几十年里设法建立了信任与安全。我们也同俄罗斯进行了历史性的对话。我们建立了对话与谅解中心，以及波兰-俄罗斯困难事项小组。

尽管经受了沉痛的教训，波兰从未失去其欧洲身份特征。我们的未来和发展机会显然同欧洲一体化相连。最后，国家之间的和解、边界开放和经济一体化，使我们能够在本大陆我们地区建立永久的和平。

目前，在民主变革取得成功25年之后和加入欧洲联盟机构10年之后，波兰正在同其他国家分享它的经验——不仅在我们地区，而且也在北非、中东和东南亚。我们了解到，只有民主和自由才能克服战争的悲惨后遗症，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民主价值观是不能进口或强加的。在启动变革的引擎时，国家自主性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随时准备本着团结和伙伴精神，协助民主转变。

审视叙利亚、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局势，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邻国之间可以实现和平与和解，为什么不能始终在国内这样做？我们大家目睹了这些战争和冲突。我们每天读到有关暴行的报导，看到令人震惊的画面，并听到受害者的故事。

如果这些冲突继续下去，未来数十年中东和非洲会是什么样子？子孙后代对我们会有什么想法？对于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描绘这一图景并不那么难。我们在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场所为尊严、自由和人权而进行的战斗是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应

当将我们的言词转化为行动，并找到勇气对战争说“不”，同时寻求正确方法，以建立永久和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李东日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就约旦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我还欢迎你的倡议，这一倡议非常适时且切合现实。我们坚信，在你的得力领导下，本次辩论会将会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所作的发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70年，那次战争给人类造成了不堪言状的痛苦和不幸。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类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并实现所有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尽管自那时以来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但我们看不到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有任何重大突破。相反，我们正在目睹种种挑战。世界重大热点以及已经过时的冷战时代的军事联盟继续加强。有人仍在组建军事联盟，并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从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更大威胁。有人继续以所谓的自由、民主、不扩散和反恐怖主义为借口，公开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并企图进行政权更迭和武装入侵。我们可以列举所有此类借口。

现实表明，国际和平与安全正日益成为世界首要问题。特别是，全球注意力集中于联合国在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使命中值得信任和负责任的态度和作用。在这方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要强调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认识到，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应当予以严格遵守，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国际法没有任何方面允许或容忍一个大国侵犯一个小国的利益和主权。《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应予遵守的基本原则。

不应当再容忍一个具体会员国在联合国滥用其特权地位的行为。不应当再容忍这个国家通过显示其实力和攻击其他会员国来藐视《联合国宪章》和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行为。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第二个主要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持认为，联合国应当适当关注并尽全力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危害人类罪行这一未决问题。至于日本过去针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犯下的罪行，就野蛮性和残暴性而言，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它涉及的不仅是亚洲国家，而是全人类。在日本过去所犯罪行中，主要未决罪行是性奴役，特别是日本皇军士兵对20万朝鲜妇女实施的性奴役。在世界各地，这正成为日益广泛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践踏朝鲜妇女和整个朝鲜民族尊严的罪行表示愤慨并予以谴责。

现实是，日本现在执意否认并掩盖它过去所犯罪行。最近，它竟然犯下进一步的不当行为，在受害者及其国家受伤的心灵上再刺一刀。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安倍先生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参拜是完全不合时宜的犯罪，意在促使日本人民恢复他们的军国主义野心，并煽动他们再次犯下危害人类罪行，从而诱使日本全国和全民走向自我彻底毁灭。

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这一参拜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愤慨和谴责。与日本有着密切联盟关系的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一项关于朝鲜妇女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妇女遭受性奴役问题的决议。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日本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安倍先生不应该再对国际社会进行政治赌博。他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而应访问德国。那样，他至少可以看到用出色办法解决过去罪行的最佳榜样。这样做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日本摆脱其所特有的低劣道德，从而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的唯一途径。

当今世界没有日本军国主义的立足之地。对朝鲜人民来说，在军事占领期间，日本屠杀了100万朝鲜人，而且正如我过去在安理会上指出，他们强迫20万朝鲜妇女充当性奴隶，估计此类性奴隶总数为30万，并美其名曰把她们称之为所谓慰安妇。此外，他们还绑架或征召840万朝鲜人，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他们关进强迫劳动营。

不论多久，尽管数十年已过，但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犯下招惹我们祖先愤怒的罪行，人民定会得到赔偿。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今天的讨论涉及长期和解因而最终预防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完全属于不仅是本机构，而且是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职权范围。尤其是人权理事会做过相关工作，通过关于了解真相的权利的决议。实际上，人权委员会建立了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杜绝再犯的任务。

毫无疑问，如何应对历史，这对于我们如何塑造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俗话说，不接受历史教训的人注定将重蹈覆辙。但我们面前的问题更加复杂。我们如何确保首先要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历史，即一个能为参与冲突的所有各方接受共同表述？我们一再遇到建立起这样一种共同表述的困难。

主席先生，你在今天上午发言中提到的二十世纪划时代灾难性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今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已经导致产生大量的研究、文章、书籍和分析，而且大家都已得出结论，即经过整整100年并对此专题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脑力之后，我们对这个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依然缺乏一种共同的表述。100年无疑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们在一些言论和事态中看到一些冲突，几百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其中还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重

要的影响，这些言论和事态会导致爆发敌对行动或无法解决冲突。

和解当然是一个必要因素，以确保和平协议不仅导致仅仅没有武装冲突，或主席先生，用你的话说，导致永久和平。和平协议始终应当包含机制，使冲突各方能够开展必要的和解努力，必要时还应提供外来协助。这种机制应该成为任何建设和平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努力通常需要长期承诺，而且始终需要时间。建立共同表述可能是一项错综复杂、痛苦和耗时的工作。促进这种表述并确保它经过考虑得到接受，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

历史是人写的，因此是个人解释和评判的产物。所以，当然可以说，没有所谓的“真相”，而真相仅仅是大家同意的对历史事件和事实的解释，和赋予这些事件和事实意义的方式。因此，只有冲突对立双方都接受的历史表述，才能达到促进和解及创造和确保永久和平的目的。相互冲突的历史表述可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而且事实上是冲突复发的重要因素。

建立这种共同表述的要素之一是，在犯下国际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的冲突局势中，必须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确保不允许这种罪行有罪不罚，我们达到两个目标。首先，如果不追究这种罪行的最大责任人的责任，参与冲突的人，包括受害者或参与者，将无法获得了结。因此已经形成国际共识，即不能赦免那些最严重罪行。其次，如果不查明事实真相，经过这种事件创伤的群体将无法继续前行。所以，对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受害者而言，既要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追究那些罪行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也要如实陈述事件真相，虽然这样做极其痛苦。

安全理事会已经开始慢慢且有所犹豫地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而仅仅是一种有限的作用。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和安理会根据刑院的创始条约即《罗马规约》可发挥的作用，为安理会提供机会，使其能够始终如一并有效地参与确保追责问罪

的努力。但在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情况下，安理会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最突出的例子也许就是，叙利亚冲突已经进行近三年，但安理会拒绝就在叙利亚境内犯下的罪行的责任问题进行一次有意义的讨论。虽然有许多国家正式要求安理会行使职权，将该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但安理会的反应既不是这样去做，也不是讨论其他究责办法。

如果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关键，那么在许多情况下，仅仅这样做还不够。特别是，它不会自动导致产生一个为冲突各方所接受的历史表述。冲突中的对立各方共同努力以建立事实，确保陈述事件和创造这种表述，也许是牢固地结束冲突、创造永久和平更为重要的部分。

通常，这方面努力采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形式。事实上，有一些仅靠这种委员会的工作就非常成功地实现社会团结的事例，其中最突出的也许是南非。这也是联合国能够作出有意义贡献的一个领域，而且过去曾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东帝汶等国多次这样做。联合国可以提供协助，途径是提供其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但成功的关键因素始终是当事各方发挥自主权，即不仅愿意参加这种努力，而且愿意促进共同表述，教育后代，并确保这种表述获得接受。

我们需要从战争中共同汲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教训。自发表《宪章》以来它被多次重申，以前也得到过多次表述。那就是，战争是罪恶，是祸害，会造成难以置信的苦难，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罪过和没有责任的人。联合国在制止冲突和建立和平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我们距离防止武装冲突这个目标本身仍和任何时候一样遥远。这方面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宣布战争非法。虽然《宪章》实现了该目标，但它没有确定违反该法则的个人的刑事责任。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侵略罪的管辖权，填补

这一漏洞。各国都可以批准关于该问题的坎帕拉修正案，为该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发言。

托列略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贵国代表团组织本次重要的辩论会，也请允许我直奔主题。

对于战争，我们能够说出的话语有哪些是人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没有说过的？因此，我不认为还剩下很多话语可以说，我也不认为我能够就战争所说的话，在座其他堪称专家的发言者还没有说过。

因此，接下来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我要恭敬地说，对于战争，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不只是空谈。我们必须寻找最终和立即的解决办法，永远制止战争，从而根除战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将人类称为“智人”？智慧体现在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对于权力的贪婪和其它自私原因而要消灭自己吗？是制造伴随战争而来的数不清的其它苦难吗？

当然，我们肯定知道，因为我们缺乏智慧，会造成这一切苦难。但我想知道，我们是否确实认识到有史以来战争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事实不言自明，事实证明我们人类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对自己做什么，否则我们就不会发动战争。

接下来请允许我重点谈谈以下事实，那就是“有意识”——也就是身体上的警觉——与“有良知”——也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自己的行为负有道义责任——存在着巨大区别，即便不是说，人出于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置于生命进化表上的最底层。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科学家说的。

在此基础上，在有人指出我或许是在高谈阔论而且言不对题之前，请再次允许我强调，除了开展有时过于谨慎的、属于外交范畴的谈判之外——这的确是外交的应有之义，但光是谈判还不够——还必须寻找实际解决办法。我们不应忘记，即便在我

们为了谈论或举行讨论，也无论是因为其它什么好的理由或是出于好心而开会的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民众继续在开展外交的名义下死去。因此，我或许可以就此谈一些浅见，抛砖引玉。这或许可以激发对于我们人性的一些思考，人性常因外交之名而被遗忘，而外交似乎支持的是物质成就，而非人的精神成长和社会财富。

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和平始于个人，但遗憾的是，事实表明在面对分歧的时候，人在本性上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激烈的行动，而不是选择和平解决办法。

因此，我们现在要非常坦诚地扪心自问：“人们和各国政府是真心希望结束战争、贫困和各种苦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在各处滔滔不绝的话语付诸行动呢？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不良的事情所导致的、对我们社会制度造成损害的种种投机和剥削行为继续存在呢？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科学和知识来挽救和维护生命，而是通过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助长战争呢？

简而言之，事实表明这完全是一场权力、投机和利益的游戏。因此我要问，在此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做？在我结束发言的时候，我要重申，除非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政治上选择根本的人性，从更整体的角度看待生命，而不只是选择谋求利益的政治，否则冲突和战争就将继续肆虐世界。人类的真正本性——它是精神性质的——必须战胜偏重物质的想法，因为金钱考量不应支配人的全部生活。这体现了一条毋庸置疑的真理，它表明了我们人类治理系统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失。这些系统所采取的做法受到投机性立法的摆布，其基础是逆来顺受的风气，而不是立足于平衡分配世界资源，以及本着尊重态度进行意见交锋，而非逆来顺受。

这种不平衡分配和逆来顺受的心态从长远看，最终会造成敌对和冲突，而不是促进和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这些才应当是战争的教训。

最后，我要说——我这样说代表了像我这样的很多其他人——我们并不梦想拥有名车豪宅或是富裕的尘世生活，尽管在我们建立了和平、富裕的全球社会制度后，再渴望拥有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错。我们的梦想是此时此刻就制止战争以及和谐共处。因此，和平不应仍只是一场文化活动或一次外交辩论会，它要求我们作为有意识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发言。

莫雷诺·萨帕塔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欢迎约旦常驻代表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提出这项倡议。该问题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极为重要。

《联合国宪章》是规定绝对禁止用战争来解决国家间争端的第一项国际法律文书。目前该规定未能得到遵守，这种情况是威胁到世界各国人民并损害各国独立和主权的一种祸害。

主要大国所采取的单方面军事行动，以及野心包括治外扩张的那些政府所采取的举措，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叙利亚、中东和巴勒斯坦的情况就是世界正在蒙受的灾难的典型例子。

预防性战争概念和保护责任的使用超出了国际法框架，给国家间的和平共存造成不利影响。玻利瓦尔政府始终倡导在处理冲突时开展包容、民主的对话并实现可持续团结，同时不损害对于国家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

纵观历史，战争最可耻的起因之一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为维持帝国而疯狂追求资源导致对各国人民及其资源的掠夺。同样，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导致的贫因为国内和区域冲突提供了沃土。

联合国在以和平手段维护国际和平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它未能惩

罚使用武力的行径，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就是证明。在这方面，由于安全理事会某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安理会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在没有穷尽所有外交机制的情况下，安理会多次仓促施加制裁，由此加剧了争端，导致受制裁国家的激进化。

平民是真正受到战争影响的人。在这方面，任何行为都不如使恐怖分子不可言喻的行径合法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更大的危害。许多极端分子把医院、学校、宗教场所和外交设施作为攻击的目标，导致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丧生。这种恐怖行径企图用新的政府来取代主权政府，这既不会带来和平，更不可能带来持久稳定。

应该指出的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定把恐怖主义视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然而，对于反恐斗争却使用了双重标准，企图以违反联合国本质与原则的辩词来区分好的和坏的恐怖主义。

今天，世界上存在发动战争的各种不同办法。一些基本理论包括“第三波战争”“第四代战争”“信息战”和“不对称战争”等。显然，这一系列说法既不详尽，也无确定性。

公开宣战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给民众造成破坏性影响。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秘密战争，这种战争不太明显，可能不为人知。它们仍是致命的，导致合法政府的稳定遭到破坏，主权遭到削弱，民众受到威胁。

例如，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就可被视为一种秘密战争。这种侵略性的境外行径违反了国际法。此外，破坏经济、非法武器贩运、使用无人驾驶飞机、媒体战以及大规模间谍活动等都是在发动秘密战争的新手段。

战争不会给人教诲，只会带来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应通过旨在解决国际冲突的外交办法、调解以及对话，来寻求制止世界上的战争，并努力确保世界各国人民享有生命权。

最后，我们注意到当前正在哈瓦那召开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二次首脑会议这一令人鼓舞的事件。会上，33位要人向世人发出信息，宣布拉美和加勒比区域是一个遵守国际法规范和《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和平区。

会上发表的宣言还承诺始终和平解决争端，永远反对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它表明，国家负有不直接或间接干涉它国内政、遵守主权、权利平等以及人民自决原则的责任。

同样，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还借此宣言承诺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文化，这将有助于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共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代表发言。

洛加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主席先生，还请允许我感谢你在1月份全力以赴、契而不舍地开展了成功的工作。

我赞同今天早些时候以欧洲联盟名义所做的发言。

我和其他人一道，赞扬主席国倡议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分享对和平持久性的关切，同时，在有人要求或需要得到支持时，必须通过加强可支持和解进程的能力等方式，进一步推进和解。通过旨在发展调解进程的努力，联合国在加强这些能力方面，已经取得大量成果。

作为一个中欧和地中海国家及欧洲联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在过去100年中曾经历过三场痛苦的战争，我们也认为，和解意味着找到一种共同生活的办法，从而对未来抱有共同愿景，重塑关系，并与过去的行为和敌人达成妥协。这是一个深入合作与变革的全社会的长期过程。这是一个承认和铭记过去并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它应通过确认合作的裨益而同步进行，但不能强加于人。我们即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值得铭记的

是，直到再次爆发世界大战，欧洲领导人才做出勇敢的决定，把和解进程与欧洲一体化挂起钩来。

从这个角度，我愿强调三点重要意见，它们与本次辩论会主席邀请函（S/2014/30，附件）中提到的问题有关。第一，为避免所谓的表面和平，斯洛文尼亚牢记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发生的难以言状的可怕战争，努力推动布尔多进程，包括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环节以实现一体化。有关国家高级别要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也可有助于取得对各方积极的结果。

第二，过去六十年来，欧洲联盟成为一个积极的范例。我们强烈建议针对需要和解与重建的各个区域，开展更多有效的区域合作。邻国通常最先关心建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环境。

最后一点是，成功的和解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它需要有民主治理、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法治。它要求根据互补性原则，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等渠道把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它还需要通过教育青年和民间社会及其参与，来倡导和平共存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需强调，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就必须加强预防冲突、预警和调解方面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斯洛文尼亚将于3月11日在斯洛文尼亚具有象征意义之地布尔多举办地中海区域调解倡议框架内有关弘扬地中海区域调解和预防文化的讲习班。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黑山代表发言。

什切潘诺维奇先生（黑山）（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月份主席并发挥主席职能。我感谢你组织本次重要的辩论会。也请允许我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所作的通报。

黑山完全赞成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但是，我要以本国名义补充谈几句。

在黑山悠久和令我们自豪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战争，仅二十世纪就有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巴尔干战争。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尽管没有直接把战争带到黑山领土上，但黑山也出现了影响整个地区的类似战争的冲突。正如我们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遗憾的是，黑山对战争并不陌生。但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黑山只为自由而战，从未有过任何领土或其它野心和权利主张，尽管事实上，从历史背景来看，战争，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战争推定争取自由的斗争意味着改变边界线。

黑山是一个小国，经历了不同战争带来的如此之多苦难，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事关生死存亡的苦难，我们得以从这些经验中汲取了许多经验教训，因此把和平解决、和平关系以及和平共存作为我们现代国家战略政策和方向的基础。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如何强调黑山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都不为过，那就是，解决分歧以及化解紧张和冲突局势的最佳和真正可持续的办法是通过和平手段，奉行对话精神，并且致力于外交和政治努力和工具。

从这种意义来说，主要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冲突各方必须表明，为求更大利益，它们愿意接受痛苦的妥协方案。尽管前南斯拉夫一些国家为独立付出了流血代价，但黑山得以在2006年以完全和平的方式重获独立。当时，黑山领导人作出了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包括接受在欧洲联盟调解下确定的55%多数的门槛，这是首次建立和使用此类门槛。加上其它方面一些因素，例如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保持耐心并等待举行全民公投的适当时机和及有利环境的智慧和心态，并且与我们的对方公开和透明地打交道，最终结果是，塞尔维亚与黑山和平地实现分离，尽管当时有可能出现暴力。

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我要强调联合国及早察觉和预警机制的重要性。我们肯定应加强关注预防性措施，以避免危机发展升级，并且减轻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作为调解之友小组的成员，我秉持这一目标，主张像《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

那样，真正把调解作为联合国的一项核心职能。调解这样一个成本低、收效好的预防和和平解决冲突的工具总体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它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联合国系统以及联合国全体会员理应予以更多关注和投入更多资源。

保护的责任以及进一步把这一理念付诸实施也仍必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在问责制时代，犯下危害人类罪的犯罪者不应不受惩处。各国必须表明对法治、尊重人权和自由、民主以及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强有力承诺。

黑山重获国家地位的道路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循序渐进的进程。走向政治解决的道路往往漫长、令人筋疲力尽，如果涉及到危机和暴力局势就更是如此。有时候，最困难的一步是让对峙各方坐到谈判桌前。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正如我们在非洲的许多情况中看到的那样，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促进开始对话和奠定和解基调方面可以发挥积极和宝贵的作用。如果区域和次区域办法没有取得成效，联合国就应介入并发挥主导作用，正如我们在叙利亚危机上的做法一样，为此，我们赞扬秘书长亲自参与并作出不懈努力，发挥领导作用，并利用他的信誉，尽全力支持组织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的经验，之后联合国接近七十年的存在，即便考虑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看到的种种不足之处，都表明此类世界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对确保全球和平与安全、发展以及尊重人权和自由具有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确保联合国能够保持其作为全球治理中心机制的适当位置，本组织已经开始采用现代化的、经过改革的形式，承认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以及全世界不断演变发展的多方面情况和环境。

一旦各方坐到一起，就需要有韧性、信念并认真致力于“取舍”进程，这一进程平衡得当，没有明显的赢家或输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望取得的成果有可持续性，并且避免重新陷入危机。

在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的整个外交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需要有相关国家和来自周边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其它利益攸关方，以及能够对实地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力的全球行为体的建设性和积极参与，以期帮助制订尽可能妥善的解决办法。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黑山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事项基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区域合作，以及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这几个支柱。我们的作用是务实的，没有隐藏的目的，我们与邻国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黑山被视作本地区促进稳定的一个因素，促进和解努力，并且推动总体区域合作。

黑山的所有活动是欧洲和欧洲—大西洋架构不可替代的工作以及走在各自入盟道路上国家所作努力的补充，其方向是实现该地区永久和平和繁荣这一目标。这种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态度侧重于有利于所有人的紧密合作，并且本着对话和妥协精神努力克服分歧，同时确保其人民享有良好的生活水平，这是取得成功的秘诀。

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在欧洲联盟的调解下，于2013年4月就关系正常化签定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这项协定是一个积极信号，对两国人民以及饱经动荡的整个地区将有很大助益，因为我们希望，这代表着从有害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向和平与繁荣共存的转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发言。

米库列斯库夫人（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及时的辩论会，并热烈祝贺你发挥了意料之中的出色领导作用。罗马尼亚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请允许我从我国的角度，就这个议题作简要补充发言。

本次辩论会是思考从战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建设永久和平的手段，我作为一个罗马尼亚人，

首先想到的激励人的例子是我们最声名卓著的外交官——尼古拉·蒂图列斯库。除了在我们今天和今年所纪念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为他的国家发挥重大作用之外，他在1921年创建国际联盟时发挥了领导作用，后来在1930年和1931年成为它唯一两度当选的主席。

我们想到蒂图列斯库，首先是因为他始终通过维护和平来维持稳定的边界，提倡大小邻国之间良好关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平等，提倡集体安全和预防侵略。在1930年代初，蒂图列斯库认识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崛起给他自己的国家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带来危险，于是在区域一体化领域中开展了大量活动，同其他国家签署了友好和不侵略条约，主要目的是防止旧时冲突重新爆发。即便在今天，这些文件亦可被视为巴尔干国家和民族之间合作的里程碑。

蒂图列斯库指出的某些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先决条件今天仍然有效。他说，首先，战争的胜利者必须忘记他们的仇恨，要知道所有人都因为战争而受苦。然后，各国人民需要融合在一起，相互见面并相互诉说他们的共同利益。尽管主要提到的是区域合作，但这是前瞻性思维和强烈要求采纳后来成为创建联合国的基本价值观的一个明显例子。

蒂图列斯库认为，后来罗马尼亚也始终认为，建立可持续和平的进程必须以共同的安全感为基础；以实现稳定为目标，同时建立各国间的相互信任 and 了解；要仔细分析意见分歧并充分给予解决。可接受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只能是政治性和法律性手段；人类团结的精神必须战胜军事实力。

蒂图列斯库强烈认为，今天安理会在座的各位也这样认为，战争绝不能成为解决冲突的办法。他认为，在追求永久和平的努力中要实现几个目标，这些目标在今天同1930年代一样重要，其中包括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防止偏见的共同斗争、和平教育，以及以协调行动消除冲突的经济根源。在提到引起并扩大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今天依然存

在同样的根源——时，他的主张是，世界不需要修改条约，而要改变本身的思维方式。即使在今天，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回到现代，罗马尼亚努力遵循这位杰出外交家开辟的道路。例如，我国的外交不断提倡区域合作的好处，尤其是在邻国之间构筑信任和务实合作的桥梁。因此，我们积极参加本区域的多边合作形式，例如目前由罗马尼亚担任主席的东南欧合作进程。

罗马尼亚深信区域合作的巨大潜力，在安全理事会的上一任期中作出重大贡献，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在稳定和冲突后重建进程中同区域组织合作的决议。因此，第1631(2005)号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专门涉及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第一份此类文件。我们仍然真正认为，这种合作是建立持久和平的关键之一。

在一个因不平等、不容忍、冲突和恐怖而伤痕累累的世界上，罗马尼亚将始终站在本组织一边，支持它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的坚持不懈和值得钦佩的努力，我们将始终从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的智慧中找到灵感，他说，外交家是和平战士，他们的意愿只有一句话：“继续努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多诺霍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热烈赞扬安理会主席国约旦主动提出，与和解相关的问题应当成为今天公开辩论的重点。

我赞同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我们今天纪念的这个世纪中，众多形式的战争祸害在世界许多地区随处可见。如何消除这一祸害和建立持久和平，是本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联合国可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受冲突破坏的社会进行重建和恢复。通过其建设和平活动，它可以帮助把脆弱的和平改变为更加根深蒂固和持久的和

平。它可以为永久和平奠定基础，而别的组织很少能够这样做。

这项努力的核心，就是联合国能够支持冲突后分裂社会的社区之间实现和解。它能够帮助社区治愈冲突的创伤，并且走向和平共处，无论这个过程多么缓慢和犹疑不决。当然，多年战争和痛苦给各个层面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克服。其后遗症是极度的不信任。冲突社区之间的问题涉及极其敏感的身份认同和效忠对象。即便在暴力结束之后，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愈合过程，对立的社区才能达到实现共同未来所需要的彼此信任程度。

在爱尔兰岛上，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在爱尔兰和英国政府以及北爱尔兰各社区政治代表参加的谈判进程中，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商定了一个全面的政治框架。这项成就，即所谓的《耶稣受难日协定》，改变了北爱尔兰内部、北部和南部之间以及爱尔兰同联合王国之间的关系。它给北爱尔兰带来了持久的政治稳定，以及爱尔兰两地之间空前程度的合作与交往。

但是，在基层一级，要实现北爱尔兰两个主要传统之间的持久和解方面还存在重大挑战。各方都为此进程作出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尽管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分裂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悬挂各自社区的旗帜，或是应该如何处理有争议的游行。一个受人尊敬的美国第三方最近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促成两个社区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这些年来，爱尔兰和英国政府密切配合，制定了切实步骤，可能有助于爱尔兰的不同传统处理过去的问题并克服遗留的怨愤和误解。我在这里对英国政府采取的重要举措表示敬意，例如卡梅伦首相就“血腥星期日”的事件所作的道歉，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刚才在本次会议中提到这一事件。社区一级也在进行大量重要工作，以便促进和解、增加相互尊重并接受差异。

在国际一级，联合国通过它拥有的处理冲突后果的一系列广泛的工具，推动同样的目标。其中包括支持过渡期司法和法制、政治对话与调解、披露真相进程、赔偿、机构改革，以及妇女在恢复和重建冲突后社会中的作用。在这类局势中，联合国有能力带来巨大的益处，通过它支持的具体行动化解地方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从而减轻并加快全国和解的基本工作。

不管是在国家或社区一级，和解工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形式。此外，采取具体步骤能够产生多方面的好处。例如，创建一个冲突后司法系统，一方面能够达到追究在冲突阶段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的目的，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公民个人恢复信任，并使他们同新国家达成和解。

以实现和解为核心的建设和平工作如果能够双向展开，则成效可能最大，因为通过这样一个进程，一个社会可以从分裂的过去走向共同的未来。尽管和解进程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展开，而且要顺应每一个过渡或冲突的特性或态势，但仍需要作出更协调的努力，以便收集和分享来自不同冲突环境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还需要作出努力，以便将和解的各个层面，包括发展、建设和平、人权、安全、法治和治理，纳入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这些不同的支柱将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活动并非一贯受到应有的关注。联合国在各种名目下为促进冲突后社会的和解而采取的行动都值得我们全力支持。本组织正在为建立主席国约旦散发的概念文件(S/2014/30, 附件)所述的“更为真实、不可逆转的和平”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它有巨大潜力来发展这一贡献。爱尔兰期待着与其他有兴趣的代表团一道进一步反思这一主题。在这方面，鉴于北爱尔兰不同传统之间的持久和解继续面临挑战，我们愿意分享我们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愿意借鉴来自全球各地的最佳做法的其他实例。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尔维亚代表发言。

米拉诺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塞尔维亚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先前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作如下发言。

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坚信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和个人必须齐心协力，以便应对这些挑战，达成妥协，实现和解，并确保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谋求维护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起的体系时，无人会为极端主义付出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及其各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为独立、自由和人类理念而进行的斗争中，塞尔维亚遭受了巨大损失——有120万塞尔维亚人死亡，这几乎是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有俄罗斯和法国遭受的痛苦比我国多。然而，就人数而言，塞尔维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付出的代价高于任何其他国家。

任何一意孤行想篡改历史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当时与协约国并肩战斗并实现了和平，从而为建立基于各项基本原则和各国之间关系以及基于更加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公正世界开辟前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多边主义和实现世界和平的第一次尝试。南斯拉夫王国在国际联盟中居于重要位置。

根据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世界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浪潮基础之上创立了联合国。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根据各国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的协议建立和维护稳定和平与集体安全作为其目标。数十年来，联合国一直利用它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来帮助建立国际安全体系。若非联合国会员国齐心协力，共同确定优先事项，若无联合国关于各国平等这一指导原则，联合国本不可能应对摆在它面前的种种挑战并捍卫国际和平。

《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是建立和平、尊重平等和尊重差异的最佳基础。在今天这个错综复

杂的世界，捍卫和平与实现正义并非简单之事。在这方面，尤其是就维护国际秩序而言，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遵守其各项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不仅有在世界许多地方将交战各方隔离开来的长期历史，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在促进和解、建立法治并为长期稳定奠定基础方面也取得了成功。

任何社会除非投资于消除贫穷和不平等，否则无法指望取得进展。我们只有继续投资于教育、卫生、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环境，甚至在资源稀缺时也这样做，才能实现全球稳定。

塞尔维亚致力于奉行多边主义，这是它的外交政策支柱之一。它注重自己在联合国、欧洲联盟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多边和区域组织中的作用。我们深信，多边论坛是发展民主、稳定局势和实现持久和平的适当框架。

最近几十年里，我们恢复在联合国旗帜下为维和行动作贡献。以前，南斯拉夫曾经是派军队参加诸如联合国西奈应急部队等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首批国家之一。塞尔维亚目前参加了九项维和行动，七项在联合国内，两项在欧洲联盟内。我们随时准备在2014年加大我们对此类行动的参与力度。

联合国作为诚实调解者的作用已经获得各国普遍信任。塞尔维亚也有与联合国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特派团合作的积极经历。

塞尔维亚认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15年塞尔维亚将根据与瑞士的联合两年期工作计划主持该组织的工作——在国际安全体系中以及在帮助建设民主与持久和平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和位置。塞尔维亚曾经连任两届主席，这一事实表明，它高度受信任，高度开放，愿意合作处理今日欧洲境内最重要安全问题。

区域合作是当代多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它对东南欧特别重要，它是塞尔维亚的优先

事项之一。我们致力于加强合作，因为我们认为东南欧的稳定是我国实现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

我们相信，巴尔干地区注定会加入根植于共同欧洲未来的持久和平计划。应当提醒安全理事会，欧洲联盟是通过消除长期存在的藩篱和纷争并将数百年来散发出的正能量联合起来而创立的。塞尔维亚深信将繁荣带给整个巴尔干地区是可能的，因而与其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一道加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它坚信这一进程至关重要。塞尔维亚与欧洲联盟之间第一次政府间会议将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开始谈判，因而是塞尔维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证明。

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成员，塞尔维亚在国际和区域活动中坚持《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我们认为，在多边框架内开展活动有助于加强区域能力以及应对持久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穆明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担任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约旦就“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这一议题组织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

联合国的成立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怖作出的反应，也是追求永久和平努力的一种表示。在我们如何实现一个将战争推到边缘并投资于谋求和平的国际体系展开辩论的时候，这一努力仍在进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日子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战争不可避免，因为生命不能超越其原有的侵略性。弗洛伊德的观点正确与否，人们可以辩论，但战争一直是并且继续是人类状况一个无处不在的特征。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经过战争或暴力形成的，而且许多国家在它们的历史进程中都打过防御性和进攻性战争。

战争的频率和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还没有减少。事实上，1900年以后的100年毫无疑问是现代历史上最血腥的100年，其暴力程度绝对远远超过此前任何时代。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灾难。为防止这种灾难复发，成立了联合国。这是避免战争的祸害和确保持久和平努力中的一个分水岭。

确实，自从联合国成立之后，国际关系中并没有出现暴力不断增加的特点。自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发生类似广岛和长崎事件。一度是国际冲突中心与大火炉的欧洲体系，现在已经稳定下来，而且一片和平。1991年冷战的结束，也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我们努力寻找办法确保可持续和平的同时，在几乎所有联合国活动领域都出现了新问题，不断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智慧、审慎态度和我们的承诺。

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违反《宪章》禁令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仍继续在平民百姓的心理中埋下怀疑的种子，使他们怀疑本组织的实际效力。世界虽然避免了重大战争，但国际体系外围的众多暴力和种种有组织的冲突——内战、灭绝种族、政府镇压、第三方战争、权力斗争和恐怖袭击——继续在全球南方许多地区破坏稳定。

正如秘书长经常指出的那样，此类持续暴力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军备投资过度，和平资金不足。武器的过度积累和易于获取导致出现紧张状况，鼓励军备竞赛，强化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世界资源有限，在军备开支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每年用于制造、维持和改进武器的上千亿美元及人力和技术资源可被用来应对克服贫困和饥饿的挑战，促进人的尊严。

确实必须找到办法，扭转把稀缺资源浪费在非生产用途上的做法，并利用由此节省下来的宝贵资源拯救无数人的生命，解决紧迫的发展需要，确保

按时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据估计，为所有人提供教育总共需要160亿美元，但不幸国际社会可为此提供的资金还不到20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仅2012年，各国的国防开支就超过17 340亿美元。因此，问题不在于缺乏资源，而是优先次序和决心。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人类？如果我们不履行责任，后代可能不会原谅我们。

发动战争显然有多种原因，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仇恨、意识形态、宗教、不容忍、非法占领领土、领土争端、不公正、侵略和争夺稀缺资源，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有必要制定具体战略并再度作出承诺，以解决这些问题。孟加拉国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的最大部队派遣国之一，我们认为，一切暴力和战争均产生于不宽容心态、仇恨心态和误解，产生于侵略心态。

因此，若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就需要树立和促进和平文化。我们需要提倡宽容的心态以及关爱和尊重他人的心态，而不分种族、肤色、族裔或宗教。创造一种尊重和接受他人差异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心态，对于减少暴力和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将有巨大的帮助。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要解决许多长期冲突，如以巴问题，该问题仍然是世界许多地区暴力和不稳定的催化剂。

过去几十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贸易相互依存及其他形式和平交往不断增多。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固然大体上给人类带来了惠益，但它也在重新界定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和安全方面的环境。随着对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化和相互交织，我们必须学会使多边主义行之有效，以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要解决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问题，就应当以调解和谈判来引导解决冲突。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这样一点，即：武力不受欢迎，用武力解决国家间分歧始终明显无利可图。同样重要的是，要承认经济发展应该是世界各

国政府的中心目标与合法性要素。实现经济繁荣，增强弱势者权能，树立和平文化和培养“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心态，将极大地促进各国之间的可持续和平、安全与稳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邦瑟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赞扬你打破常规，召开本次辩论会，提出司法、和解与历史记忆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今天辩论会的时机非常好。过去20年里，我们目睹在中欧和东欧以及西半球，民主得到巩固，给这两个地区带来巨大的好处。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到中东各地人民表达他们要求更广泛自由和正义，要求其政治领导人进一步接受问责并提高透明度的愿望。

（以法语发言）

加拿大认为，这些经历说明，必须承认人类的集体尊严。若要和平共处，我们必须承认，不能为尊严设置条件或将其分割，我们不能保护某些人权和自由，而选择不尊重其他的人权和自由。这一认识是民主社会繁荣的根本基础，反映这些社会决心反对压迫和歧视，处理好各种分歧。这一认识也促使它们承诺尊重每一个人的良心自由、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些价值是加拿大外交政策原则的核心所在。该政策致力于和平、繁荣和自由。采用这种方针需要作出若干承诺。

（以英语发言）

尊重人的尊严意味着需要有采取行动的决心。加拿大致力于预防和制止灭绝种族、族裔清洗、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为。事实上，每个国家都负有保护最弱势者，挑战侵略者，保护人权和促进人的尊严的庄严职责，包括在国内和国外。如果社会鼓励尊重多样性，保护宗教少数群体，反对歧视，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以民主方式解决政治分歧及

寻求和解，那么发生暴行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善治、法治和人权确实很重要。

人类漫长的历史已经表明，宗教自由和民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在推翻民主的地方，信仰自由的精神往往也荡然无存。在保护宗教自由的社会，保护其他各项基本自由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些社会通常较稳定、较繁荣。它们是公正的社会。

我们决不能忘记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人们，这一点至关重要。承诺致力于和平，也需要承诺保护和赋予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妇女的参与和领导密不可分。在半数人口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和平。在妇女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和平。只要使妇女能够获得资源、工具和机构，她们就可以成为冲突后和解和复原工作的驱动力；反之，她们就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致力于促进和平和尊严之时，需要增强所有公民的能力。只有加强妇女权利，国家才能更安全，进而更繁荣。

尊重人的尊严要求我们承诺汲取历史教训。2013年，加拿大担任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主席。该联盟31个成员国承诺执行各种国家和国际政策和方案，来支持关于大屠杀的教育、纪念和研究活动。加拿大政府认为此类工作对于帮助防止今后的灭绝种族行为至关重要。

加拿大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约旦强调的问题，即应当保护和提供各国国家文件档案，以便在冲突后环境下处理和解问题。这些档案可在追究犯有最严重罪行者的责任方面发挥作用。

加拿大注意到，教科文组织有一些保护和保存国家档案的方案。其1992年设立的“世界记忆”方案源于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保护和查阅文献，以确保重要文件不会在战争或社会动荡期间丢失或毁坏。今天讨论的一个成果或许会是，国际社会重新关注这项工作。

最后，尊重人的尊严要求致力于预防。联合国系统及其政府间机构有着一起努力预防、遏制和管理冲突的长期历史。加拿大支持加强联合国的这方面能力，以便从作出反应转向实行预防。预防冲突与有效应对一样重要。必须更有效地调动政治、人道主义、安全和发展资源和工具，来加强国家预防冲突的能力。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维护人的尊严，保护无辜者的生命和权利。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

纳扎里安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们要感谢你和整个约旦代表团在新年伊始所做的出色工作。主席先生，如你允许，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新成员致以亚美尼亚的衷心祝贺。

本次辩论会的主题是本组织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联合国宪章》序言载有该问题，因此应当更系统地将其纳入本组织的工作，以便在全世界预防冲突和建设更稳定的社会。我们坚信，冲突的解决办法应当公正、全面地处理冲突根源，以防它们今后再次抬头。我们承认各种冲突的历史、法律和政治背景有所不同，但我们应当铭记最近解决冲突的范例所提供的正面经验。

主席先生，我们完全赞同本次辩论会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所体现的你对联合国在促进各国人民基于对历史问题的共同表述和记忆，实现更深刻的和解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所进行的梳理。该工作常常不只是要求通过主席声明和决议，访问受害者纪念馆和在那里献花，或是签署协议或议定书以及握手。和解要想持久，就可能需要清算过去，承认并接受所犯罪行的责任。

在我们从本国悲剧——亚美尼亚灭绝种族事件——所汲取的诸多教训中，我们不幸地了解到，和解进程可能会拖延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亚美尼亚灭绝种族事件是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实施的现代

史上首个灭绝种族事件，表明了人类在没有国际安全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体系的情况下，可以自甘堕落到何种地步。消除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暴行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对于恢复正义和正常生活至关重要，这并非新近提出的说法。对于极端民族主义或思潮所驱动犯罪和冲突来说，尤为如此。1939年，就在纳粹入侵波兰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说，

“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实现确定的边界，而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今天还有谁仍会说起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情呢？”

我们也从历史中得知，战争祸害和灭绝种族罪会在世界各地以可怕的频率呈现周期性的重复，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以及社会、政治和区域动荡。每个社会都应当处理其过去的罪行。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机构、世界各国议会、人权活动分子、政治和宗教领袖、历史学家、教师和学生以及其它群体和个人，在确立真实、共同的历史表述方面也可以发挥明确的作用。我们在听取安理会成员和先前其他发言者的发言时注意到，本次辩论会上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寻求真相的原则和工具问题。

然而，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要想建设成功的、实现和解的社会，有关国家通常需要开展大范围的伸张正义的工作，其中包括赔偿受害人及其后代，以便重建民族尊严和特性。

还必须一致反对歪曲历史、否认历史罪行和否定历史的做法。必须肃清历史上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留下的余毒，必须采取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做法。

关于经验教训，我们确信，预防冲突以及制定适当的预警机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我们也有义务不断发出强有力的信息，要求反对暴力、缓和危机局面和履行先前承诺。在这方面，亚美尼亚仍决心只通过谈判、促进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在承认动荡的南高加索地区人民的权利及

其自决权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关系，继续不断寻求实现持久和平。

几十年来，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一直参与处理冲突后局势。在这些局势中，必须处理建立信任的问题，才能消除民众的敌意和不信任，而这些民众必须学会作为邻居重新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今天的辩论会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的这个适时之举。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Magbengu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今天发言时首先表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公开辩论会，并表示这个议程项目——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于联合国的成立宗旨至关重要。主席先生，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祝贺你在担任主席期间提议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供安全理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讨论该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强调预防、管理危机和解决危机这三个方面。1945年，在旧金山会议后，联合国人民承诺欲免后世于战祸。在人的一生中，这种战祸两次给人类造成无尽的苦难。从那时起，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就应摒弃战争和使用武力的做法。这个想法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第33条确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神圣原则，它禁止一切使用武力的做法，认为这与联合国的目标不符，而第2条第4段则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显然，《宪章》的前提是确立一项有效的预防原则，寻求把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力定为违反国际法的做法，这与现已过时的国际联盟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以及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所采取的初始步骤相反，那些初始步骤仅仅限制了诉诸战争的权利，但却承认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真像1945年《宪章》草拟者所设想的那样遵守《宪章》精神的话，今天的辩论会本可能

容易得多。不幸的是，国际实践并未始终忠实地遵循这一原则。那些自认为自己最强大者的暴力不再遵守法律规范，更不必说限制。我们看到全球出现常常披着自卫伪装的混乱、无政府和暴力泛滥。然而，当一方超出自卫和安全理事会已核准行动的框架时，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都变成非法及对和平的威胁，无论它是一种破坏和平的行为还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规定采取的一种侵略行为。那些分析《宪章》的人在这种混乱中看到，诉诸战争权以正义战争的形式卷土重来。他们批评一些政府的态度，因为它们盗用这种权利，在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行动的不属于合法自卫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使用武力。

今天，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当今我们的世界上存在《联合国宪章》草拟者根本想不到的一些挑战，如毒品和人口贩运者建立的恐怖主义和犯罪网络、偷猎和贩运濒危物种者，这些挑战助长了腐败循环和非法使用自然资源、海盗行为以及海上贩运。

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还需要改进其架构，以便采取果断行动，不仅预防冲突和制止冲突带来的战争，而且确保此类冲突在建立和平之后不再复发。

在这方面，经验表明，联合国常常难以成功维护和建设和平。这解释了为什么冲突会在平静期之后偶有复发。我国对战争的处理是一个不应忘记的典型案列。继2006年和2011年举行民主选举后，世人完全有理由希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实现持久和平。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和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地减少平民的安全危险并促进安全责任向政府移交，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前反叛人员与常规军队的混合、交融及整合等行动很快导致北基伍再次出现武器和暴力文化。已在2012年4月初放弃刚果军队而加入M-23的前反叛运动全国保卫人民大会的前作战员在一个邻

国、实际上也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即卢旺达的支持下，成功地掉转武器而对准常规军队。

我们知道，联合国并非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事实上，这正是今天讨论的价值所在，其目的是思考新的战略，以改进冲突地区的局势。我们大家当然都明白，卢旺达代表今天上午攻击联合国的发言不过是托词。他攻击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是意料之中的。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没有上当。

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是我们的邻国卢旺达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这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捣乱国家在大湖区玩的把戏。国际社会已经习惯于此。他们使用了一个又一个借口。1998年8月2日，卢旺达军队跨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界，袭击和包围了东部各省，特别是北基伍、南基伍、东方省、赤道省和下刚果省，当时的借口是确保卢旺达自身的安全。他们可能是在寻找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长期逃犯，这些人好像遍布各处，甚至在树上和地下。卢旺达代表似乎忘了，2000年5月和6月，卢旺达和乌干达两国军队侵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刚果采矿镇基桑加尼发生了两次冲突，以争夺对该区域钻石宝藏的控制。

无论如何，鉴于新的挑战，安全理事会必须推陈出新，制定新的战略，正如最近成立干预大队并赋予其保障刚果民主共和国平民安全的更有力授权那样。

最后，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轻小武器扩散、跨国有组织犯罪、海盗行为、毒品和人口贩运都是正在出现的挑战。要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调整安全理事会的结构。因此，确实迫切需要使安理会更加民主、有效和透明，并确保席位平等分配，以反映出联合国会员国数目从1946年的50个增至2011年的192个的事实。

本组织的会员国必须单独和集体确保坚定奉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捍卫集体安全体系，以确保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战祸。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切维克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土耳其赞同先前以欧洲联盟观察员名义所作的发言，但请允许我以本国名义补充谈几句。

首先，我愿感谢主席国约旦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对联合国和会员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有许多代表发言，这清楚表明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我也要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所作的通报。确实，避免战争和历史紧张状况，维护和平以及实现和解是联合国工作的基本目标，因此，我们欢迎有这个机会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

今天，建设和平努力主要涉及建立一个有利于建设持久和平的政治、经济、安全以及体制环境。但是，确保有利的社会环境也是关键所在，因为心理和社会因素常常直接影响到从政治到安全等其它领域的努力。冲突各方或许对历史有各不相同的陈述，甚至是污染社会、政治以及安全环境的选择性记忆，这阻碍和解，并导致重新陷入冲突。在这一背景下，除其它领域的发展外，我们必须力求形成共同的历史表述，以使当地民众有一个更美好的、没有冲突和战争的未来。

国际社会、联合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帮助创造条件，使得能够通过它们掌握的各种工具，包括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小组以及法庭等各种机制，实现和解。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始终铭记下列要素。

第一，没有哪两个冲突是一样的。对和解努力的要求将因冲突，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而各异。在某些情况下，真相委员会可以促进和解，而在其它情况下，法庭则可以取得成功。

第二，冲突各方在和解进程中掌握主导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和解不能强加，而且只有得到各方的同意，才能持续。当地民众对和解进程负

有主要责任。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必须支持地方和解努力，但是，它们不应试图去替代这些努力。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是一个重要行为体，它具有合法性、能力以及经验，通过提供作为和解进程基础必备的技术支助机制和协定来予以协助。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当为此类机制提供必要的政治、财政以及后勤支助，它们在寻求持久和平的进程中能够帮助实现和解。

第三，应当为冲突各方创造条件，使它们能够形成一种共同的客观历史共识。通过科学手段，例如各方可以组建中立客观的历史委员会，甚至在第三方的参与下确立历史事实，这对奠定和解的共同基础会非常有益。

在这一背景下，主席国约旦的概念说明（S/2014/30，附件）所载各项提议是值得称道的。建立联合国历史咨询小组，以便协助地方当局保护文件和档案，会是有益的。此外，联合国酌情帮助建设地方能力，以便建立国家档案或国家历史委员会也可以带来裨益。这将有助于帮助得到必要的科学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建立共同、客观的历史共识道路上的后几个阶段而言，将是至关重要的。此外，第三方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档案中或许有重要数据。联合国可以敦促第三方无条件提供相关机制，这些机制有必要信息，以便对历史进行不带偏见、客观以及科学的陈述，由此协助和解进程。

第四，尽管确定历史事实或许是重要的，但和解应注重未来。至关重要是应创造促进理解、容忍和合作的氛围，以便实现真正的和解。和解不应局限于回顾过去，或被用来唤起过去的敌意。制订积极而有前瞻性的议程，将更有益于创造一个和平的未来，使各社区能够重新开始。

第五，和解并不意味着有罪不罚。为实现真正的和解，必须对最严重罪行、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以及战争罪负有责任的人进行究责。

第六，必须始终记住的是，和解总体上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进程。我们不应一看到障碍就放弃努力。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再次对南非已故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表示敬意，他坚持不懈努力寻求实现民族和解，并且取得了成功。

在我们讨论和努力加强我们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处理冲突后各种因素时，我们不应停止加紧我们的预防冲突努力。我们还应加强我们所掌握的包括调解在内的各种预防和解决冲突手段。

我想回应一下亚美尼亚大使谈到的有关1915年事件的情况。

众所周知，灭绝种族行为是一个已得到明确界定的国际法理念，需要高标准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因此，不应轻率使用这个概念，为错误的历史表述推波助澜。此外，有关1915年事件的灭绝种族罪指控从未得到法律和事实的支持，而且对于这些事件的性质既无政治共识，也无法律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必须认识到，记忆本身并不构成现实。正如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对他们那段痛苦的共同历史存在争议一样，不同民族的记忆常常相互矛盾。我们认为，试图向其他人强加对过去的一种罪责和片面看法，并且要求有选择地给予同情，进而从历史中生成敌意，这种做法并不是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的众多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的适当方式。

因此，必须从整体上看待历史，并且必须不偏不倚和科学地审视历史记录和档案，以便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由此形成共同的、公正的记忆。我认为，今天这场公开辩论会的重点是在对历史形成有助于巩固持久和平的共同理解基础上，实现有意义的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帮助形成对动荡过去的商定的、共同的表述，而不是宣扬片面说法。

我们仍力求与亚美尼亚进行公开和真诚的对话。我们希望，亚美尼亚将抓住这个历史机会，用客观知识的说法代替主观臆断之词。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挪威代表发言。

朗厄兰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们正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显然，这场可怕战争之前的预防性策略失败了。当时不存在诸如安全理事会或区域组织之类任何形式的全球治理机构，以制止局势失去控制。作为联合国成员，我们都有责任帮助预防和解决冲突。许多年来，和平与解决冲突始终是挪威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每次冲突都有其自己的动态，不存在可用于预防和（或）解决这些问题的神奇公式。然而，根据经验，可以得出某些共同的教训。

冲突不会凭空发生。在多数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坠入一种危险的模式时会有明显的迹象。严重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是这方面的前兆。我们不缺早期预警，而是缺乏早期行动。为此原因，挪威支持秘书长的“权利在先”行动计划。挪威还一贯提倡，安全理事会应当更多地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

当事人必须准备进行会谈。如果当事人坚持战争的逻辑，那么，试图解决冲突将是徒劳的。对话对于增进信任或是深入了解对方的立场和思维，是至关重要的。必须陪伴当事方改变其观念。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可以做到。20多年来，毁灭性战争一直困扰着索马里，但它现在可能已经制定了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今天的挑战是改变叙利亚冲突中的思维方式。我们对于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感到高兴，但是，迅速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前景依然暗淡。今天对本组织而言，叙利亚是一个重大考验。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了解背景情况。和平调解人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就是动员交战方坐到谈判桌旁。广泛了解冲突根源是绝对必要的。妇女必须参

加谈判进程的所有阶段和层面。挪威赞赏秘书处已经制定了有效调解的指导方针并强调公正性。

我们有一个工具箱。除了调解之外，联合国预防冲突的工具箱中还有一系列可更经常使用的其他工具，例如秘书长的斡旋、特使、调查委员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仲裁、司法和解，以及诉诸区域机构和安排。

在签署停火或和平协议之后，真正的工作开始了。我们常常看到，脆弱的和平是无法持续的。这也许是因为当事方缺乏履行承诺的真正意愿，或是有关国家脱离了国际雷达屏幕。我们在2005年为克服这些挑战设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然而建设和平的架构仍然有改进的余地。在这方面，2015年的审查非常重要。此外，我们相信，和平、安全与稳定对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应当将其列入2015年后的议程。

只有公正的和平才会持久。为了实现持久和平，所有利益攸关者都必须参与，这对于确保基础广泛的自主性是至关重要的。全国和解是一项基本要求。为了找到真相、正义与和解，就不能在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方面存在有罪不罚现象。这突出表明了国际法庭、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委员会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始终应该设法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的能力。我们必须准备吸取历史的教训。必须对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把结果记录在册并进行系统化处理。当我们为了使我们的机构作出适当调整而共同努力了解今天的趋势之际，我们必须牢记，国际秩序并不是永久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如果联合国要成为能够确保长期的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21世纪的组织，我们会员国就必须适应这个现实。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马苏德·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赞扬你分发一份非常实质性的概念文件（S/2014/30，附件）。我们赞赏你这份文件，因为它请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后退一步，进行思考。你请我们解析这个议题，首先明白战争的结构和原因，找出在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并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力量来谋求和平与安全。我们不能用陈词滥调来回答你一针见血的问题。这表明了你的成功。

现在也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应当缅怀死者，缅怀那些为和平献出生命的人，或是成为战争的意外和不幸受害者的人。今天的会议应该要深化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而不是进行政治较量，或是祭出过去的分裂和仇恨的幽灵。

事后想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一位历史学家曾将其称为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但在事后，我们大家都有敏锐的洞察力。现在可以明显看到，各国在上个世纪都过于急切地放弃了外交。这不是一种指责，而是一个结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停止外交努力。

我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而且经常发生。战争带来杀戮、伤残、酷刑，并在其身后留下一片废墟。然而，战争成为一种必要的罪恶，因为各国不断地准备战争，以阻止侵略。中国哲学家孙子说，最伟大的胜利不需要战斗。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是“以其他方式延续的政策”。因此，战争是一种现实，并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应当为避免战争作好准备和进行装备。

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训？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不应在这个世纪重复上世纪的错误。不应感到自满。为了和平，我们决不应该放松警惕。

与上个世纪头几十年进行的比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上个世纪之初洋溢着希望，良性和有害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唯一的区别是，今天技术的好处或破坏力超过以前的几千倍。100年前，世界上没有超级电脑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我们今天有了，并

且它们正在变得日益尖端。上个世纪，各方在谴责战争卑鄙无耻的同时，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显然，在狭意上，这样一场广泛的全球性战争没有开战的理由。各国出于恐惧心理和潜在的敌意而卷入战争。

根本不存在永久和平这回事。如果能够实现这种状态，世界的战争贩子与和平主义者将会无所事事，联合国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这一永无止境的任务将告结束。战争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爆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保持警惕。联合国应不断保持警觉。应当设立一个制止潜在威胁的制度。联合国就是这一制度，但应当善加利用。

不应当将瞬时随机爆发的冲突与根深蒂固的国家间紧张和争端混为一谈。如今对统治和霸权的欲望会引起战争，正如这一欲望在一个世纪前引起战争那样。为避免战争，国际政治不应当以零和思维为指南，而应当以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法利益和权利为指南。我们应当为所有人而不是特定少数人的安全而努力。

我们大家都知道，战争对所有人都具有破坏性，使所有人都付出高昂代价，并削弱所有人的能力。冲突一旦爆发，不应当让它们年复一年久拖不决。应当立即开展外交活动，以确保实现并建设和平。过去一个世纪，我们了解到，对族裔和宗教团体的成见和误解导致了战争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本世纪不应当重复这一错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世界提取出了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各项原则，例如自决权。

联合国没有因其为和平所作的努力而得到应有的肯定。如果没有联合国，很可能已爆发了第三次或第四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缔造、维持、维护和建设和平。它大力投资于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救灾，以及保护环境。过去七十年里，联合国在处理国家内部冲突方面取得的成功比在处理国家之间冲突方面取得的成功要多。由于现实政治的要求，对安全理事会来说更具

挑战性的激烈争端已被搁置。联合国被迫利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强制执行性授权来处理偶然发生或旷日持久的冲突，但没有适当利用《宪章》第六章来和平解决争端和开展预防性外交。

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使用其工具箱中的一整套外交手段：谈判、调查、调解、劝和、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机构和安排，以及最后但并非最重要的是，秘书长的斡旋。利用这些手段的介入即使不是优先使用，也比根本不介入要好。

我们必须力求在和解与刑事司法之间建立恰到好处的平衡。这样做不仅对于遭受冲突蹂躏的社会和国家的愈合创伤进程，而且对于防止冲突复发和建设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不应当忽视冲突和战争根源。事实是，现在花在冲突上的钱比花在处理冲突动因方法上的钱多。贫穷、饥饿、争夺自然资源、气候变化、治理不善以及缺乏法治，都将人们推向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理论和实践更倾向于管理冲突而不是预防和解决冲突。因此，应当作出更多努力，以便处理未决问题以及为敌对行动火上浇油的社会经济因素。在我们区域，我们为所有人谋求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我们正在探索各种途径，以便解决冲突、实现和解和进行经济合作。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反对损害和平与和谐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和非对称战争等黑暗势力。

最后，我们必须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今天在本会议厅内，人们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改革应当反映所有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野心。改革不应当仿效过去的模式，而应当使我们为不断变化的未来做好准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若干代表团要求再次发言。我要请各代表团限于再作一次发言。我首先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潘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格鲁吉亚代表今天所作的发言令人非常遗憾。对我国进行此类抨击令人怀疑格鲁吉亚目前领导层的团结及其实现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如果我们希望如若干代表团今天所说的那样实现稳定的和平，我们就必须承认高加索地区的新地缘政治现实以及出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必须让这两个国家平等参与对话，以确保该区域的稳定和繁荣。

吴浚（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对日本代表今天下午发言时提出的三个问题作出回应。

第一，靖国神社是一个不仅供奉着普通士兵，而且还供奉着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以及在战争期间和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对区域各国人民犯下最难以想象暴行的许多日本皇军和军事警察人员的设施。正如日本代表所提到的那样，日本政治领导人最近参拜了靖国神社，尽管该区域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发出了要求不要这样做的强烈呼吁。日本代表竟然说日本首相这样做是为了缔造和平。这种说法何等荒谬！

参拜罪恶战犯不会给人民因这些受尊敬罪犯令人发指行径而遭受如此多痛苦的区域带来任何和平。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企图美化日本过去而已。日本政府所作的解释只会被外人视为不够明智。如果日本真想为世界和平作出实际贡献，那么最重要的是，日本应当正视历史，并建立信任，其做法是表示深刻反省，并向区域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道歉。

第二个问题涉及慰安妇。慰安妇实际上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皇军强行实施的性奴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对日本所作的发言只能再次表示极度失望。尽管1996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库马拉斯的报告（E/CN.4/1996/53）和1998年特别报告员麦克杜格尔的报告（E/CN.4/Sub.2/1998/13）大力强调日本对慰安妇负有法律责任，但日本从未接

受这一法律责任。相反，日本不曾间断地试图将这一问题重新界定为慈善和人道主义问题。

不，这是危害人类罪的问题，要求司法正义和追究责任，而不是慈善。正如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发指罪行的受害者仍然活着。此外，令人痛惜的是，有些日本领导人甚至一直在说，此类性奴役罪行不仅日本犯过，其他国家也犯过。他们问为什么只有日本应当感到愧疚、耻辱乃至负有责任。让我重申，与日本的愿望相反，这个问题不会消失，直到日本政府承认其法律责任，并采取受害者可以接受的措施。

最后，关于修改教科书问题，我们今天反思了世界大战的可怕祸害和我们通过这些可怕经历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从今天讨论中汲取的核心教训首先是，需要有诚实面对历史的勇气；其次，需要在此基础上作出努力，以实现和解，即为了今后的和平，与历史及受害者和解。应该通过教育把这些经验教训传给后代，使他们不再重复前辈所犯的错误。

今天下午，日本代表为日本政府最近决定修改一本日本学生所用的教科书，将日本对邻国提出的非法领土要求列入其中进行辩解。我们对世界大战的反思清楚地表明，敌对思想和行动最终导致冲突和紧张。日本向年轻一代灌输不准确的历史信息的举动，只能在后代中制造永久分歧，导致发生悲剧。

最后，我必须提一个问题，即日本近期通过所谓积极主动战略，到底想对和平作出何种贡献？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再次感谢你召集今天的辩论会，特别是，我们赞赏你今天早上的发言。

卢旺达再次发言，是要回复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谨在此指出，今天上午，卢旺达在安理会今天讨论和平与寻求永久和平问题的背景下

发言。主席先生，你在发言中回顾，1961年就有了联合国部队驻扎刚果民主共和国，即联合国刚果行动。早在1961年，联合国部队已经被派往那里，但53年后，该国仍然存在危机和冲突。

我们的发言是在关于寻求永久和平问题的辩论背景下作出的。我们的批评是针对联合国的，批评联合国无法支持刚果人找到永久和平。但后来我们听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发言中可悲地指责卢旺达干了种种坏事，是万恶之源，并指责我国支持“3·23运动”，但却又提不出任何证据。我们看到已经散发的各种报告，其中没有提出丝毫证据。

必须正确了解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一些问题。1961年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总理的是卢旺达吗？不是。当初引发加丹加分离运动的是卢旺达吗？不是。造成在刚果人民因饥饿而死亡情况下却拥有法国城堡和瑞士银行账户的亿万富翁独裁者塞塞·塞科·蒙博托上台并为他提供支持的是卢旺达吗？不是，不是卢旺达。1994年，在联攻派民兵于我国境内实施灭绝种族行为之后却欢迎并支持他们的是卢旺达吗？不是。是谁在刚果境内不把难民与其他人分开？不是卢旺达，而是当时的刚果政权。联合国当时没有能力隔离联攻派民兵并解除其武装。他们今天已经变成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力量），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为非作歹。1994年逃离卢旺达的就是这伙人。

因此，我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感到有点惊讶，理由既简单又充分，因为该国武装部队现在正在与卢民主力量合作，这伙人曾在卢旺达实施灭绝种族行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杀害刚果人，甚至在1990年代和随后十年多次袭击卢旺达。

因此，我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了再次指责卢旺达而提及“3·23运动”，这令人遗憾，因为该运动已经停止一切活动，而却有其他的运动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从事活动，造成破坏和灾难。

卢旺达曾设法在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框架内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争取与“3·23运动”达成和

平协议。去年2月，我们签署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正是为了设法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治理不善，缺乏国家权威和安全，资源分配不公。卢旺达仍然致力于走这一道路，我们将在双边或多边范围内继续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但希望刚果朋友帮助我们帮助他们，我们希望他们采取积极的态度，使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克韦拉什韦利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让我在今天下午第二次发言。我谨发言回复俄罗斯联邦代表刚才的发言。

今天的辩论会即将结束，我并不愿意讨论一个将使我们远离今天辩论会主题的问题。不幸的是，俄罗斯不为有意义的讨论作贡献，反而再次企图对已经许多次在各种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相关文件中得到反映的事实作出误导性解释。我仅提供我国的经历，作为一个案例研究，以提供经验教训，以便国际社会能够从我们经受的困难和悲剧中得出适当的经验教训，指导今后工作。我们认为，这才应该是我们辩论和反思的内容。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梅本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如前所述，日本怀疑安全理事会是否是处理个别历史问题的最合适论坛。不过，我必须再次发言，回复刚才的一些发言，以及另外一个代表团在我先前发言之后所作的发言。

我已经在今天下午的第一次发言中彻底阐明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因此，我谨提请安理会和今天所有与会者注意这一事实。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李东日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对再次发言表示歉意。我们刚刚听到的发言完全是无稽之谈。先前，日本代表的发言也是毫无道理的。关于这些发言，我要强调三点。

第一，日本代表谈到日本是爱好和平的。我不知道这个议事厅里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看看日本政客和代表政客来到这里的外交官，他们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套，把日本说成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在国内，这些政客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军事占领和殖民时期的政策乃是解放亚洲人民的战争。安倍首相自己提出了修改其先人所实施的侵略的定义问题。怎么能说日本爱好和平呢？

第二，日本代表团谈到慰安妇。我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甚至无需谈论该问题，因为它已经得到澄清。不过，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抹杀历史。正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先前的发言中提到的那样，这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或各国历史上，世界上没有国家以慰安妇之名征召性奴隶，供侵略军士兵淫乐。日本人是犯下该罪行的唯一的民族。

关于靖国神社，它供奉有被定罪的、受到国际法惩罚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修改教科书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对后代进行历史教育的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正竭尽全力地对本国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这是他们的先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告诉和警告他们是一回事，但他们应当汲取在军国主义失败后发生在其先人身上的教训——他们要是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走，会再次遭受失败。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中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刘结一先生（中国）：《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个庄严

的大厅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的象征，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和维护。

今天安理会会议的主题是“战争、其经验教训以及寻求永久和平”。要汲取战争教训、维护持久和平，就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

事实胜于雄辩。日本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在靖国神社、慰安妇和教科书等问题上企图作出辩解。刚才也是这样，但实际上只能是欲盖弥彰、越抹越黑。

靖国神社是个什么地方，日方心里最清楚。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象征。直至今日，日本仍在公开宣扬日本军事主义对外侵略是正当的，仍在公开宣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自卫，仍在公开宣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非法的，仍将14名二战甲级战犯及1 000多名其他战犯供奉为神灵。日本代表在下午的发言中，将这些人称为所谓的为国牺牲者。这再次证明了日方仍在坚持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安倍作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挑战，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挑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大规模强征慰安妇，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日本政府迄未就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及赔偿，理应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

修改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企图篡改历史、歪曲事实。日本政府应该做的是，切实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有关规定，停止一切侵犯和损害邻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日本代表的辩解使我们必须问几个问题。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除了日本领导人之外，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去参拜二战的甲级和乙级战犯？日本为什么要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难道参拜战犯、美化侵略战争是宣示和平？《联合国宪章》开宗明

义，联合国的成立就是要使后世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靖国神社供奉的二战战犯就是造成这些战祸的罪犯。难道参拜这些战犯是维护遵守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难道修改教科书、企图掩盖歪曲历史真相是为了教育后代重蹈侵略战争的覆辙？这些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如果日本领导人真想与侵略战争、与侵略战争的历史和二战战犯决裂，日方应该知道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辩解。

安倍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自己关闭了同中方对话的大门。他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设法为自己辩解，而是切实改弦更张，彻底摒弃与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背道而驰的错误历史观，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取信于国际社会。世人拭目以待。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亚美尼亚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纳扎里安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建设性地关注了讨论，鉴于彼此看法常有分歧的国家的参加，我们尤其赞赏这种讨论。但是，我们不得不对土耳其继续采取否认政策和保持一贯腔调表示遗憾。请允许我简要谈谈土耳其大使对亚美尼亚灭绝种族罪的错误理解。

我想，在会议厅与会的各代表团吃惊地听到对亚美尼亚灭绝种族罪的歪曲解释，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夺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统治期间在奥托曼帝国生活的150万亚美尼亚儿童和男女的生命。请允许我特别提醒一下土耳其的代表。

对整个国家的系统和预谋屠杀始于1915年4月24日，一直持续到1923年。它被定义为灭绝种族罪，并被称为亚美尼亚灭绝种族罪。它始于一个命中注定的日子，奥托曼土耳其人把300位亚美尼亚社区领导人——包括作家、哲学家和专业人士——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将其处死。同一天，5 000名最贫穷的亚美尼亚人在城市的街道上遭到屠杀。然后，残忍的杀戮扩散到安纳托利亚的整个亚美尼亚社区。他们被

递解出境，遭到杀害。他们被带往沙漠处死。大屠杀受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政府驻土耳其代表的谴责。这一罪行得到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及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内的多个会员国和国际组织的确认。

我们对这个议题格外敏感，因为奥托曼帝国实行的灭绝种族政策导致亚美尼亚人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灭绝与屠杀，虽然国际社会为回顾和确认罪行做出了努力，但是土耳其一直不予承认。我只想对土耳其代表说，是明白的时候了一召开本次专题辩论会正因为此一应当认识到，要想加入文明世界，就应避免否定主义和否认历史事实以掩盖以往的不公，特别是掩盖制造的大规模暴行。

最后，我国认为，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灭绝种族罪的承认将拆除我们两国之间的心理壁垒。2015年将是这一罪行的百年纪念，我们呼吁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继续采取适当步骤和行动，使这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得到承认以防止在世界其它地方再次发生这种可怕暴行。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土耳其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沙欣奥尔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诚挚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但是，今天会议的主题表明，其目的不是翻过去国家间冲突的旧帐，而是寻求为了世界的未来在国家间达成妥协。我们是抱着这种理解来参加本次会议的。我们不想讨论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件。

然而，我们似乎对过去有着不同的理解。很自然，其它代表团对过去的事件有着不同解释。亚美尼亚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就属于这一类。显然，我们对这些事件有着不同解释。我们没有说，1915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知道这些事件，但是，它们不符合1948年《灭绝种族罪公约》中规定的灭绝种族罪的定义。

我们在审视国际法庭判决案例时可以看到，灭绝种族罪是一种犯罪。它有明确定义，需要提供符合严格标准的证据。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际刑事法院做出判决称，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灭绝种族罪，但是国际刑院无法确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它地方发生了这种罪行。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国际刑院无法找到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它地方发生此类事件的足够证据。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目睹了这些事件。尽管我们有电视和各种通信技术，但是，国际刑院仍无法证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它地方发生了灭绝种族罪。

现在，某个代表团在没有国际法院的任何判决的情况下提出1915年事件等同于灭绝种族罪的事情。怎么能指望我们接受这种偏见？我们不应沉湎于过去。我们应展望未来。我们认为，这样做才能克服过去的困难，共同展望未来，达成妥协并和平共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再次回顾，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未来捆绑在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件上。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6时20分散会。